



目 录

- 五英雄传略…………… 张尔杰 (1)
- 孤灯子影话春秋
——漫谈察素齐历史之变迁…… 白 贞 (31)
- 归绥县漫述…………… 王 道 (71)
- 我在绥远陆军步兵二营的经历见闻
……………王安仁口述 刘映元整理 (115)
- 群众文化工作的点滴忆述…………… 荣世杰 (130)
- 土默特地区十三家庄头简述…………… 腊 宝 (145)
- 土默特蒙古姓氏琐议…………… 于永发 (154)
- 土默特地区的商会和保商团…………… 彭 勇 (179)
- 朝阳蒙古族土默特部概况…………… 谢连祥 (185)

五英雄传略

张尔杰

五英雄者，安祥、李雨山、云亭、刘会文、满泰是也。这一光荣称号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哪个政权授予的，而是广大人民群众赞誉的。

人是时代的产物。可在同一时代里，有英雄，也有侏儒，足见人又主宰着时代。五英雄在在生之年，因能“顺应世界之潮流，合乎人情之所需”（孙中山语），而为中华民族的振兴鞠躬尽瘁，所以“生命之花常开”。因此，为了记述他们的英雄事迹，还必须先从他们所处的时代说起。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各帝国主义妄图达到瓜分的目的，都在鹰瞵虎视地紧盯着中国这块土地。腐朽透顶的清朝政府，一味的赔款割地，因循苟且，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多次起兵反抗。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亡国灭种之祸已经迫在眉睫，有良心的中国人认为，救亡图存的前提就是必先推翻清政府。

1905年八月，孙中山为了凝聚革命力量，在日本东京组成“中国革命同盟会”（以下统称革命党），形成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部分士绅的反清联合统一战线，即在全国各地设立支

部，进一步开展革命活动。当时，绥远地区的革命工作，是归山西支部领导的，五英雄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抉择人生道路的。

绥远就是现在内蒙古的西部区，是一个以蒙族为主体，汉族为多数，兼与回满各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清末设归绥道（兵备道），受山西省管辖，并另设副都统管理蒙旗事务。辛亥革命前夕，全境土地虽然已经大部开垦，但还是人烟稀少，荒凉冷漠，是清政府统治较薄弱的边远地区。山西支部想在这里组建一支武装力量，相机举义，以与内地的革命相呼应。于是先后派弓富魁、王虎臣、邓绍禹、徐文翰、杨金牛、李德懋、毛智和、杨云阶、王建屏、王建基、王定圻、李正乐、李景泉、龚秉钧等二十来人，分头潜入丰镇、归化城、萨拉齐、包头、托克托各地搞地下活动。他们用卖卜、教书、传授武术、跑小商贩等各种伪装身份，秘密发展党员^①，鼓动革命。安祥、李雨山、云亨、刘会文、满泰诸人，就是在这些人的启发下参加革命党的。

1910年，王定圻从太原优级师范（相当于师范专科）毕业，山西支部派他为“西北方总指挥”回到绥远。先任绥远视学官，后为归绥中学校长，他利用学校这块阵地，吸收了不少优秀学生，把他们培养成革命党的骨干。与此同时，他还创办了《绥远日报》（后改为《一报》），自任社长，作为机关喉舌，大肆“鼓动风潮，创造时势”（孙中山语）。

然而全国革命形势的飞快发展，却比人们预期的更为迅猛，当绥远的革命党人还没有准备妥帖的时候，武昌起义已经爆发。这时候，弓富魁、王建屏、李德懋、王定圻等人，正好都到了山西（可能是调去开会的），绥远的革命党人群龙无首，缺乏统一的指挥，只有各自主动地投入战斗，以推动这场伟大革命的胜利发展。其中，王虎臣、王定圻、经权、云亨、安祥、满泰、郭鸿霖几人，表现得最为突出。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震惊了全世界，国内各省纷纷响应，先后独立。当时，孙中山曾肯定了“所谓独立者，对于满清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外蒙、西藏意亦同此”②的性质。与绥远毗连的山西，于十月二十九日（阴历九月初八）起义，打死巡抚陆钟琦，众推阎锡山为都督，大同于阴历十月十三日，被弓富魁等人组织的“忻代宁公团”光复，外蒙也于十二月一日独立，并推第八世活佛哲布尊丹巴为“大蒙古”皇帝，年号共戴。绥远境内的丰镇厅，于十月二十三日为王虎臣、张占魁（即小状元）领导的革命军攻克③，驻归化城的八旗巡防营哨官曹富章、张琳等人，也于十月十九日率部响应，火烧了北茶坊的羊王庙后，从大青山驰向包头。被寄治在包头的五原厅同知樊恩庆，于十一月初五夜晚，把郭鸿霖和他们十来个人，都诱杀于“马号大院”。云亨、王肯堂二人侥幸脱险④。

在这场大动荡、大组合的风云变幻之际，安祥、云亨、经权、满泰等人，同情群众疾苦，看得远，想得大，能以民族前途和革命大业为重，毅然投身于这场伟大的变革之中。

二

阎锡山以“秦晋蜀北伐先锋大都督”衔，在王肯堂的响导下，率领民军经准格尔旗、达拉特旗境，于宣统三年阴历十一月二十四日踏冰过黄河，翌日进驻包头镇，李德懋随军到包，王定圻回到归化。这时，以萨拉齐厅咨议局议员身份为掩护的满泰，探知坤岫即派新城满洲营备队的炮兵和谭永发的部队，要赶到萨拉齐城防堵，就连夜跑到包头向阎锡山报信。先期已到阎锡山身边的安祥、云亨、刘会文、李雨山等人，也向阎进言，建议争取时间，火速进兵。阎锡山欲借重蒙族人的民族关系，企图不战而下绥远城，就用孙中山和黄兴的名义，委云亨为绥远城将军，经

权为归化都统，安祥为归绥道尹。即于阴历十二月初二日，民军东进。翌日，军抵萨拉齐城以西五里的吴旗村。以萨拉齐厅咨议局议员身份作掩护的经权，冒险出城，向阎锡山介绍了守敌布防情况，并建议了作战策略。而后民军便与守城的满洲兵和谭永发部互战一天，破城而入，布告安民，秋毫无犯，开狱释囚，编成敢死队，叫张万顺（胖搥子）担任了队长。云亨、经权、安祥联名致书土旗仕官和发义、福坦，劝他们弃暗投明。但因这些人深受传统思想的支配，对革命前途有疑虑，严词拒绝。阎即任命曾在第六镇当过管带的王家矩为前敌指挥官（俗称王统带），从萨拉齐城出发，进窥绥远城。十二月初六日（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六日），被土旗陆军营阻击于刀什尔村西（现陶思浩村）。阎锡山为了鼓舞斗志，把在萨拉齐刻好的将军、都统、道尹三颗木质大印，央请云亨的父亲二仓送到前线，颁发给云亨、经权、安祥三人，表示给经权行权和父责其子，义无反顾的意思。还因二仓是萨厅咨议局议员，兼有一层代表民意机关的作用。

土旗陆军，计步兵（第）二营五百二十五人，营长发义，骑兵营二百七十人，营长福坦，装备都很精良，是固守绥远城，抗拒民军的一张王牌军队。他们在阴历十二月初六日奉令出发，以急行军走了一百五十里，初七日就到达了刀什尔村。翌日接火，进行了一场恶战，前敌指挥官王家矩，被发义挑选了二十人的“神枪手”，集中火力打死，阎锡山害怕损兵折将，输了老本，所以不愿继续再打，即令所部经过善岱、祝乐庆等村，于十二月初十日（一九二二年一月廿八日）撤进托克托城。托厅通判包荣富率领地方绅商出城迎接，绥远的革命党人也有不少人随军到达。

四、五千民军在托城休整期间，阎锡山为了拉拢关系，曾举行过一次颇大的金兰结义，除了以后成为他的一些高级将领如赵戴文、孔庚、张树帜、赵聘三外，还有云亨、经权、满春、安祥

诸人。安祥时年十九岁，无疑是众人的小老弟。这时候，回到归化城或现呼和浩特市的王统带，获悉清军第一镇统领李奎元即将进兵托城的消息后，他化装成马贩子奔向托城去报信，路遇清军间谍三人盘查，格斗中被打掉一指，脱险面告阎锡山。阎遂于十二月二十二日率部离开托城，回军山西。天明拂晓二十三日李军入城，劣绅白玉汝向李奎元告密，就以搜捕“乱党”为名，把阎懋、刘兆瑞、李永清三家抢掠一空。土旗陆军营官兵，听说刀什尔战役打死的是王统带，不禁“歇后怕”起来。这时的阎锡山是革命的投机分子。

三

一九一二年元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曾追认王家矩为烈士⑤。二月十三日南北议和协议达成，孙中山让位，北洋军阀的最高首领袁世凯，利用辛亥革命的形势东山再起，由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于二月二十五日接任大总统。阎锡山也当上了山西都督。他从此就背叛了革命，终民国之世，翻云覆雨于各派军阀斗争之间。绥远的革命党人，也多数一度跟了阎锡山，旋因恨他卖身投靠了北洋军阀，又先后离开。除李德懋，张万顺（胖橛子）一直跟阎走到底，并都担任了师长和李士元追随反阎派的弓富魁当过旅长，以及李景泉任道尹，刘兆瑞等坐县知事而外，有的意志消沉，遁隐空门，有的流落江湖，到处寄食，有的在日本占领时期还当了汉奸。刘继汉（刘长毛子）和王育堂在连长任内，从山西奔职回到绥远。刘因贩毒案被关在托县监狱服刑，卢占魁于民国四年冬攻陷托城后把他释出。他劝卢占魁爱百姓，禁奸淫，收民心，成为卢占魁的辅弼。后在固阳境内与北洋军多伦镇守使萧良臣（萧汉杰）部作战被俘，给割草刀为三股。玉在侯宪章被杀后任萨拉齐县保卫团总，因在

民国十五年“过国民军”时，下手太重，掳枪近万，被包头警备司令石友三诱捕，冯玉祥亲手掬的他两记耳光杀掉了。只有王定圻、经权、安祥、李雨山、侯宪章、云亨、刘会文、满泰这些人，生命不止，战斗不息，从民国肇始之后，一直在革命党的领导下，踏着孙中山所指的道路，走向一个新的战斗历程。

民国元年（1912年）八月，孙中山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以下仍统称革命党）。同月，袁世凯派来已被免职的前清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为绥远城将军^⑦。二十镇改制为第二十师，提升该镇协统（旅长）潘矩楹为师长。张绍曾迟迟于十月间接印视事。

民国二年春，孙中山派党人童尧山到归绥，首先找见王定圻，经过密议，成立了革命党的绥远支部，王定圻和刘兆瑞即以支部正副主任干事的身份，继续领导绥远的革命工作。就在这一年，袁世凯背弃“临时约法”，实行独裁，“二次革命”被镇压下去，孙中山亡命日本。土默特旗和乌、伊两盟十三旗的民族上层人士，以及绥远的汉族士绅，在张绍曾支持下，联合发起与山西分治的建省运动。经权、都格尔扎布等人，以代表身份拿着李景泉缮写的万言书，到北京大总统府请愿。阎锡山为了保住绥远这块地盘，也央请住在太原的阎懋和云亨，以绥远代表的名义到北京，向大总统府提出反对分治的理由。袁世凯为了中央集权，就把绥远象热河、察哈尔一样划为特别行政区，不再是山西的一个道了。

与此同时，土旗骑兵营连长玉禄偕朱宝山连于民国二年三月间，把部队从武川驻地岔岔村拉到百灵庙，投向外蒙并到库伦（现乌兰巴图）进见了哲布尊丹巴，受封爵为赛德（大臣），发给俄造大联珠步枪四百支，马刀四百把。他参加了外蒙独立军进攻武川后厂汗此老的战役后，活动于武川、固阳境内。张绍曾和他的继任潘矩楹，屡次兴兵进击，双方苦战，难分胜败。迄民国三年十月，中俄达成“恰克图条约”，外蒙取消独立，经武尔恭

与旅蒙商大盛魁经理段履庄斡旋，玉禄放下民族起义的旗帜，率部回旗⑧，被潘矩楹收编为绥远骑兵游击队，任玉禄为司令，奠定了“老一团”的基础。

北洋军第二十师师长潘矩楹，字丹亭，山东济宁人。他于民国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甲寅年正月二十一日），继张绍曾署理绥远将军，对于团结在卢占魁麾下到绥远各大小股“独立队”调兵清剿，疲于奔命，致使卢占魁的“民族联军”越发壮大起来，燎原之火燃遍全区。到民国四年（1915年）春，袁世凯称帝迹象日见明朗，蔡锷潜回云南，于十二月二十三日起兵护国。此时，袁世凯已改称绥远将军为都统，一向受革命党影响指挥的卢占魁，密领“北方护国军总指挥”衔，自称“塞北都督招讨使飞虎大将军”，于阴历十一月二十六日（一九一六年元月十二日），攻克萨拉齐县城，五日后再陷托克托县城，进行了残酷的战略破坏，也就是习惯上所谓的“杀人放火”的那许多事实。因王定圻在事前函告童尧山促黄兴起兵讨袁，并保证“以两千（之）众为援”的信，被潘矩楹截获，潘即据此认定卢占魁的攻城破县是王定圻指使的，就把他逮捕了，并于阴历十二月初九日，杀害在归化城南的孤魂滩。王定圻字亚平，又号平章，是包头刘宝窑子村人，原籍山西，耕读传家，颇称小康。民国元年，阎锡山曾让他担任塞北关监督，坚辞不就，并自负地说：“官非道台（相当于后来的省主席）不坐，财非十万（两）不发”。他在当京议员时，因恨袁世凯武装胁迫，愤书“袁世凯”三字投票，表示反对，“二次革命”失败后，被袁世凯没收了议员证，逐回绥远。他牺牲后，尸骨被家人收葬于刘宝窑子村外，他的学生们曾在墓前给他树碑泐传云。

然而，反对帝制的倒袁运动，并不能由于杀掉了王定圻，就会在绥远偃旗息鼓。另一革命志士经权，也在这一时期前往上海与革命党取得联系，返回绥远与安祥、云亨、侯宪章（时任归绥中学体育教员）等人，密谋起兵倒袁，以完成王定圻的遗愿，于

是又去北京联系。当他于民国五年二月中旬銜革命党之命，再次返回归绥时，曾在途中结识了一位新朋友，是潘矩楹的故旧。所以在他坐着轿车子进入归化城，正准备在一家店铺投宿时，就被扣捕了，二次起兵倒袁的计划，跟着落空。但因侯宪章曾参与过起兵密议，故被认为是他向潘矩楹告密的。

潘矩楹亲自提审经权，经权披枷带锁直立公堂，左右喝令“下跪”，他反问“给谁跪？”潘指背后墙壁上悬挂的袁世凯头像说：“给皇帝跪！”经权冷笑道：“我正是反他、倒他，岂能给国贼下跪！”潘怒，令左右棒腿，经权大呼：“我腿可断，膝不可屈也，要我下跪，比登天还难！”潘矩楹一看经权是条硬汉，就想用软的办法柔服他，遂令押监。旋因袁世凯毙命，才被释出。不意系狱百日，受尽折磨，身患阴湿重病，行走也不方便。黎元洪政府的陆军部，虽曾委任他为少校差遣员，但因不愿和他们同流合污，就回到家中养病了，终以沉疴缠绵，壮志未酬，病逝于民国七年（1918年）。经权字子衡，土默特旗美岱召村（现属土右旗）人，生于一八八三年，家境清贫，持正不阿，见事多有独到之处。少时十年寒窗，饱读四书五经，曾在村中设馆课徒，由云亨介绍加入同盟会，以包办土默特旗马莲沟税卡作为革命联络站。土旗一位名叫胡图理的什么胡委员，看见税卡有利可图，就依仗权势，夺取了这个税卡，破坏了经权的革命工作，使他怒气难消，便在胡图理接收税卡的次日清晨，手提装有尿水的夜壶一把，趁胡图理还在熟睡之际走入屋内叫道：“胡委员，请你喝些黄酒！”边说边揪住头发按在被窝里，把尿水咕嘟咕嘟地灌进嘴里，然后提着夜壶扬长返家。由此也可以看出经权的性格和他对革命的负责精神。宣统二年被举为萨拉齐厅咨议局议员，他和满泰、武海等人，都以这一合法身份作掩护搞革命活动④。有关他在辛亥年的革命事迹，前文已有交待，不再重复。自随阎锡山回军山西后，即担任管带（营长），曾由孙中山的临时政府陆军部授

予陆军少校衔，旋被阎锡山解除兵权，调任为太原警察筹备处主任，因鄙视阎的人品，毅然弃职回家。行前曾以“阎锡山已经背叛孙中山，如果继续与他共事，必将招致后祸”的话，密劝云亨（时任都统副官处长）同走，云亨不信。阎锡山也向经权当面挽留，但他去意甚坚，遂即赠款送行。经权回到家乡，就把阎锡山所给的全部金钱，雇工修理了美岱召沟的道路。当时曾有人劝他：“这许多钱给儿孙们留下或买些土地多好？”经权笑答：“孙先生（孙中山）说是‘子孙不如我，要钱作什么，子孙比我强，要钱作什么’，儿孙自有儿孙福啊，留给他们反倒害了他们”云。

但写到这里，随笔要说的是：之所以也把王定圻、经权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活动，概略地穿插介绍在这篇文章里，是因为历史不仅有纵的来龙去脉，还有横的相互关联。为了鉴古人而启后人，不忍把先贤的正义行为湮没无传，当知英雄不是兀然超群的独秀者。

四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立刻分裂为冯国璋的直系、段祺瑞的皖系、张作霖的奉系和以后形成的阎锡山晋系。就在这些大系的支配下，各省、区、市、县也都出现了拥护各自的小派系。他们之间，今日连横，明日合纵，早为股肱，暮为仇讎，狗咬狗，鬼打鬼的私斗不休，只要谁有兵权，谁就可以胡作非为，唯独不让老百姓有权。于是就出现了“蜀人治蜀”，“湘人治湘”的论调。那么绥远区怎么办？晋泰根据几年来的斗争实践，也总结出一条“绥人治绥”的经验。他这一倡议，安祥、李雨山、侯宪章、云亨、刘会文等同一性的人无不赞同。因为在“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同志还曾指出：“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国家里，有

一块殖民地，就是绥远区”。

纵观满泰以后的事迹可以证明：民族团结，保境安民，反对内战，使绥远摆脱继续被军阀蹂躏的殖民地地位，就是他的“绥人治绥”的中心思想，而有别于那些高唱“活蜀”、“治湘”，意在拥兵割据的人们。因此，他的这一倡议，一直成了绥远历届最高统治者的一块心病，是最敏感最谨防的问题。但实现“绥人治绥”，必先夺取政权，夺取政权又必先握有武装，有了武装，还必须瞅准时机。好在他们认为时机终于到来了。

先是孙中山在一九一四年流亡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重举资产阶级革命旗帜；袁世凯于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死后，皖系首领段祺瑞，扶正没有助袁称帝的副总统黎元洪为大总统，并自任国务院总理，把持“朝政”。黎元洪不甘心当傀儡，发生“府院之争”，勉强凑合到次年。段祺瑞利用张勋复辟，逐走黎元洪。马厂誓师，打败辫子军。张勋于七月十二日逃入荷兰使馆，由直系首领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仍重掌北京政权，解散国会，全国哗然。

同月（七月），孙中山由日本到广州，号召国人护法。八月，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成立护法军政府，他被推选为陆海军大元帅，誓师北伐，声讨段祺瑞。这次会议，各省、区、市的国会议员都去参加了，因为是非常会议，有些非议员的知名人士也出席了。绥远区共去了七人，现在知道的有刘兆瑞、郑化国、于效仁、刘会文^⑩。他们在大会闭幕以后，匆匆返回绥远，积极进行串连、组织工作。

当时，满泰在武川县知事兼警备司令王朝烈手下任队长。安祥自本年度都统署明令各县、区组建地方团队起，就担任萨县五区（善岱）保卫团总。侯宪章也在这一年组建县保卫团时当了团总。这是他们能够直接指挥的三支基本力量。此外，云亨还能策动矿巡队的部分士兵参加。同时，不仅把萨县的其余四个区的武

袁联络好，还得到武川、固阳两县局地方团队的拥护，就连准格尔旗也赞成起兵护法，并承诺采取一致行动。特别是驻在后套（现巴盟）的绥远骑兵旅卢占魁部，因与革命党有历史渊源，再加上民族关系、地方观念，更是一说即合，慨然同意^①。从表面上看，好似万事俱备，一个席卷绥远区的武装起义已经成熟，将使北洋军阀对于绥远的统治，在四处冒烟、八方起火的情况下，没法招架。刘会文极度振奋，他对安祥说：“要作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了。

在这里有必要把云亨补述一下：他自辛亥革命后的几年当中，因受阎锡山的排挤打击，所走的历程是比较曲折的。他的字叫嘉惠，生于光绪十年（1884年），是土默特旗水洞沟门人。少年家贫，曾在村塾念完四书及部分经书。光绪二十八年入归绥中学堂甲班，光绪三十一年毕业。在上学期间，经王定圻介绍加入同盟会。宣统二年（1910年）考进北京殖边学堂。求学期间，曾奉组织派遣回到土默特旗，在包、萨一带鼓动革命，并在土默特高等学堂召开过一次讲演大会，他大胆地宣传革命道理。有关他在辛亥年的革命活动，前文都已备述。但他从托城随阎锡山到了山西以后，袁世凯已经派张锡奎继陆钟琦为山西都督，并说阎锡山是土匪，被阻于忻州，不得进驻太原。阎即央请云亨急去北京与袁交涉，袁世凯推说自己无权作主，只有南京政府才能决定都督，于是又跑到南京见了黄兴，去上海见了孙中山，说明事实原委。因此，孙中山电袁世凯表示：“如不承认阎锡山起义，将会导致南北和议破裂”。袁世凯权衡得失，才把张锡奎撤走，而任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但云亨回到山西后，阎因害怕他在革命党中的声誉，仅委以副官处长的职务，且因绥远区要求与山西省分治时，阎派他到北京向袁世凯陈述反分治不果的结局，又疑他是故意在暗里不努力的缘故。于是就把他调任为住上海的代表，云亨执意不去，改调他为包头镇守使会办，协助孔庚。不意当他到

这包头镇守使署就职时，孔庚已经接到调任大同镇守使的命令，于是又随孔庚折回大同就任，可是新任大同镇守使张树帜，已经在使署接印视事了，二人方才恍然大悟，就与乔子和、郝维一诸同志，联袂跑到陕西投奔了胡景翼和弓富魁，继续坚持倒袁运动。

不久，阎锡山专函云亨，促他返晋，说是“孔庚去职，与你无关，你我兄弟，情同一体，你当初就应该由大同来太原勸我，何必去陕西呢？”云亨见词意恳切，并不生疑，不料他到太原一下火车就被逮捕了，并立刻解赴北京。幸亏当把他押到北京时，袁世凯正好死去了，所以即又释放。云亨气愤不过，重返太原找阎锡山质问，阎竟亲到车站迎接，并说：“你的被扣，是袁世凯所为，我完全不能自主”。随后又送给旅费三百元，表示关怀，云亨掷还赠款，拂袖回乡，待机以动。故当刘会文等人从广州回来以后，就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了。同时山西反阎派的革命领袖续桐溪和弓富魁，也派党人乔子和来到绥远，指导护法工作。

统治着绥远的北洋军阀方面，由于北京政权的更替，在民国五年十月二十七日（丙辰年九月十一日），由皖系的蒋雁行接任了直系的潘矩楹而为都统。他鉴于前任对卢占魁的“独立队”兴师动众、越剿越多是失策，就让合教堂的神甫南怀义，后套的开拓者王同春，固阳的大地主刘极达子等人斡旋，收编卢占魁部为绥远骑兵旅，任卢为旅长，驻防后套。到六年六月四日（丁巳年四月十五日），蒋雁行去北京参加“督军团会议”，则由绥东剿匪司令、绥远混成旅旅长王培焕代理都统。王字灿章，河南淮阴县人，是一个富有野心的投机政客，他嫌“代理”不过瘾，急欲实握都统大印，就杀死蒋雁行的心腹——副官处长张凤朝，并密诱卢占魁和王朝烈率部叛变，倒蒋拥己为都统，事为卢、王所拒绝。迨是年七月初张勋入京复辟，王培焕通电拥护，被溥仪封了一个署理绥远都统。复辟于七月十二失败后，王培焕就携带魁

款，仓皇逃走了。因此，都统一职即由归绥道尹申保亨，于七月二十日代理。八月十日，直系蔡成勋由陆军第一师师长升任绥远都统，九月初到绥视事。

蔡成勋字虎臣，直隶天津人，是北洋集团的嫡系。他一到任，就请卢占魁来绥远都统署开会。卢占魁断然抗命。蔡成勋就抽调高在田、沈广文、李雨村、靳永泰等四个团和张春雨、李涧清、戴延续、胡立之等四个营，合计五个团以上的兵力去后套歼卢占魁，绥远的城防自然就空虚了。于是酝酿于倒袁运动，发难于护法战争的绥远区蒙汉联合武装大起义，就在这一时刻爆发了。遗憾的是，经叔先生已经被阴湿宿疾折磨得久卧病榻，抚髀太息，他已没有精力再和他的战友们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了！

起义部队为了响应孙中山的北伐，想趁虚袭取绥远城，逐走蔡成勋，达到“绥人治绥”的目的。他们在安祥、李雨山、云亨、刘会文、满泰领导下，于民国六年阴历九月二十至二十四日之间，也就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三日至六日之间，率领五区（善岱）保卫团和武川警备队、土旗矿巡队的少数战士，在善岱镇高举义旗，声讨段祺瑞破坏“临时约法”。

遗憾的是，就在安祥等人如约宣布起义时，武川、固阳两县局的地方团队爽约了，侯宪章因北洋军乌德润营驻在城里，不敢发难，萨县的其余四个区的保卫团也按兵不动，承诺过采取一致行动的准格尔旗，也作壁上观了。眼看袭取绥远城的计划就要落空，再加上后套的战况不利，影响了整个形势的逆转。

卢占魁的部队于阴历九月二十日晚，首先与高在田团在宴安和桥一线接火，跟着在乌不浪口和狼山口也都打响，双方攻防，战况激烈。卢占魁的“独立队”虽然枪法准确，弹不虚发，能阻止敌人不敢接近，但却经不住敌人火炮的远距离轰击，伤亡惨重，勉强支持到二十三日晚。卢占魁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下令突围，一队长三队长喜生老四、二队长率领，从西山咀过黄河，

挺进伊盟境内。一股由他亲自指挥，带领一团团长焯头老二张德义和二团团长江尔济老五武跃威两部，从大余太、高台梁驰向陶林、兴和到察哈尔草原。行前，把史柜场面放起一把冲天大火。作为统一突围的哨号。

在善岱方面，由于袭取绥远城的计划已经不能实现，就退而谋其次。于是打算把起义军拉到鄂尔多斯高原，作为根据地，坚持长期斗争。但进入伊盟必先经过准格尔旗境，复与准格尔旗联系，对方同意假道通过。没想到起义部队在准格尔旗境内某村打尖时，一名战士失手一枪打死了某仕官的胞弟，引起了准旗的误会，马上调兵设防，准备拦截。他们在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下，只好再谋其次。于是决定奔袭可可以力更镇（武川城）。但当起义军进入大青山时，蔡成勋已派驻防萨县城的马德润营跟踪追来，他们且战且走，被围于万家沟中的打窑滩儿（打鹰窑子）。

因为这不仅是一场个人生死的决斗，而且关系到护法战争的成败。起义军异常勇敢，顽强抵抗，打得惊天动地，泣鬼神、挫敌胆、攻防十分激烈。那位被《绥远通志稿》卷六十二《民变》里，写成“流氓无赖”的乔子和率先牺牲。李雨山身体颀伟、在穿的长袍上还套着一件黑色马褂子，目标显著，也在敌人的排枪集中射击下阵亡。刘会文张口大呼冲杀，一颗罪恶的子弹穿颊而过，虽然没有打碎牙齿，但已负伤倒地。安祥指挥所部，拼命抵抗，马德润隐身墙外高喊：“安团总！你是好样的，你出来，我保你红籽红瓤！”安祥拒不答话，却对满泰说：“我无面目见家乡父老了，你们突围吧！”他说完这句“不肯过江东”的话后，开枪自杀了。这时候，起义部队赖以藏身还击的窝铺大院，已被敌人四面放火燃烧，烈火熊熊，浓烟滚滚，在烟幕笼罩下，战士马骥搀扶、背负着刘会文，云亨、满泰都弃掉已经中弹的战马，分头突围而脱，全军覆没！现在只知道安祥的护兵云三（托县山盖人）和老帽儿红（土左旗只几梁乡铁门更村人）二人同时牺牲，其余都

成了无名英雄。

李雨山是萨拉齐县水涧沟门人，为云亨的童年好友，也是归绥中学堂的学生，加入同盟会后，相互间成了同乡、同学兼同志的关系，二人深交由此可见。有关他的生平事迹，知道得很少，只听说他的儿子李秀，在日本投降时是在十二战区长官部指挥下的“别动军”里供职的，全国解放前夕已经逃到台湾了。

安祥字子祯，是土默特旗善岱村人，生于光绪十九年（1892年），父亲克仁额，在辛亥革命时是萨拉齐厅咨议局议员，为人厚道，沉默寡言，安祥终年仅二十五岁。因为尸体被焚，无法辨认，家人告以所穿狗皮袜子一双，才按袜找足，以足认尸，收葬了他的遗骨。

——这次起义，虽然在仅仅四天时间内就被北洋军阀镇压下去了，但是，他们的正义行动却被父老们赞誉为绥远五英雄起义，世代相传，流芳至今。

五

“蔓出多蒂，花开三支”，现在继续叙述云亨、刘会文、满泰的境况。

云亨是一位心怀坦荡，肝胆相照的人，但经过阎锡山的反复欺骗作弄后，因受刺激太大，身患间歇性神经病。他是抱病领导这次革命的。他从敌人的炮火中冲出以后，亡命乌盟草原，又辗转潜伏在石拐沟煤窑，密谋再起。蔡成勋行文各旗、县缉拿他们，但在广大农牧民的包庇下，一个也不能归案，时间一长，官令自懈，风声也就不紧了，他回到家乡当起村塾先生。但因满腹心事，无处倾诉，愤懑之极，难免神态失常，清醒时还能教书，病来了疑窦丛生，常说有人在害他。虽与亲属走动，亦觉心里不安，甚至夜半出走，只身跑到邻村，声称有人追杀，家人见他病

重，送到石拐沟漠南公司静养。漠南公司是孔庚集股开办的，对云亨自然尽力关照，使病情渐有好转。远在太原的阎锡山心疑云亨有诈，从山西派一姓李的人到漠南公司探听，并劝他去太原治疗，被云亨大骂而退。云亨就和弓富魁、景梅九、续桐溪等反阎名士结合在一起，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迨民国十四年（1925年），胡景翼、孙岳等邀请云亨到北京，冯玉祥预定让他组建国民军第六军，但深知他并无一兵卒，决定随军到达河南后，由胡、孙二人帮他收编游散部队。次年，随胡景翼到达河南，击败奉军阚朝玺（字玉昆），进占洛阳。云亨在战后单身走出洛阳西门外观察战况，不幸被流弹击毙。另说是阎锡山派暴徒刺死的。

再说刘会文，名聚章，光绪十年（1884年）生于萨拉齐大岱村（现属土左旗），幼年曾在村塾读过四书五经，后毕业于归绥中学堂甲班，身材魁梧，浓眉、通鼻、大眼、高颧，相貌堂堂，且多须髯，飘拂过胸。民国四年，以萨拉齐县教育科长的身份，掩护他的革命工作，因见卢占魁纵横塞外，连陷萨、托县城，引起他的兴趣，就弃文就武，去上海求见了孙中山。孙向他垂询边事颇详，他建议在绥远区直接发动一次武装革命，为孙所拒绝，指示他“现时在绥远直接发动武装革命，时机尚不成熟”。他便负气离开上海，游荡于江、浙、湘、鄂、豫、皖、两广和直隶（今河北省）各省，结识革命党人，广交各地英雄，眼界大开，目及全国，越发坚定了反对北洋军阀的信念。他在这次起义中，身负重伤、全军覆没，经马骥抢救出重围后，辗转到了包头以东的沙尔沁马骥的家里养伤。由于马骥的舅父是位兽医，懂得药性，就在马骥母亲服侍下，用中草药洗、敷、服食，渐渐地治好了，但仍不敢露面。

时间很快地进入民国七年（1918年），陕西革命党人奉广州军政府之命，组织“陕西靖国军”，并推于佑任为总司令，张勋为副总司令。弓富魁派人到察哈尔草原找到卢占魁部，告知卢占

魁率兵南下，参加“靖国军”，共同讨伐段祺瑞。

卢占魁自从去年阴历九月二十三日晚，由乌不浪口和狼山口东进以来，率领他的“独立队”铁骑二千余众，声东击西，纵横于塞北草原，今有弓富魁函招，自然乐于相从，便又踏垒破堡，穿行于北洋军阀的据点间隙，经清水河县境渡黄河，进入鄂尔多斯高原，与先前由西山咀挺进伊盟的喜生老四二长条股会师。刘会文闻讯赶到，弓富魁已派卢占魁的老搭档赵有禄（即三大人），从榆林来与卢占魁会面，就在他的响导下南下陕西，被编为“陕西靖国军”第六路，任卢占魁为司令，弓富魁为总指挥，刘会文为参谋主任（一说是参谋长）。迄民国十三年“靖国军”解体前，刘会文已衔命回到绥远，策动地方武装再次发难，他利用同乡、同学、同志及帮会关系进行活动。这时的绥远都统，已经是在民国十年（1921年）接任了蔡成勋的马福祥了。

马福祥是谁在北京主政就拥护谁的北洋军阀集团中的支系。现在是冯国璋已死，曹錕成了直系的首领，并贿选为民国大总统。马福祥自从当上绥远都统后，就勾结地方劣绅，横征暴敛，残民自肥，激起广大人民的反抗，致使他的政权陷于“哥老会”的包围之中。故在民国十一年三月，“哥老会”众拥护萨拉齐县保卫团总侯宪章（名斌成）率部起义，把队伍拉到公喇嘛，准备进窥绥远城。旋因侯宪章轻信马福祥所许面谈相商的诺言，被诓到新城南门外杀害。起义部队跟着离散。刘会文也不能在绥远立足，亡命京津一带，穷愁潦倒。这时候，绥远旅京学生在陈国英（字俊卿）领导下，掀起反马运动。潘秀仁、陈之的等多人，在《绥远旅京学会月刊》上分别撰文，抨击马福祥苛政猛于虎，并向贿选大总统曹錕上书警告。马福祥担心刘会文住在北京，利用学生更把事情闹大，除赠送每一学生现洋一百元作为抚慰外，叫刘会文回到绥远，委他为绥远警备第三路（后改为第一路）司令。

刘会文的警备第一路，起初仅限步兵九棚（班），骑兵四棚（班），共约二百多人。当时，从卢占魁“独立队”分裂出来的苏雨生、刘喇嘛等股，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独立队”了，他们骚乱于归、萨、托、和、清及后套、伊盟地区，奸淫虏掠，民不聊生，十分猖獗。刘率所部剿匪安民，绥靖地方，起到很大作用，家乡父老交口称赞。民国十四、五年间，他曾调到后套驻防，经常配合玉禄、满泰的队伍，对流窜于后套、伊盟、固阳各地的匪股，给以严重的打击。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驻防五原的刘会文甫经东调，匪首大辫四子五百余人已将隆兴昌攻陷，刘部昼夜兼程，回师奋击，痛歼匪伙。之后，冯玉祥在九月十七日“五原誓师”，于佑任代表革命党授旗，刘会文应邀参加了大会。会后，刘部奉调归、萨境内，司令部设在察素齐的天恒粮店院里，冯玉祥派邓宝珊（解放后任甘肃省长）到司令部约刘会文率部西开陕甘，他以“我留在当地，比率部南下对革命有利”为词，谢绝约请。

同月，晋系第一师师长商震升任绥远都统，改制绥远警备第一路为警备第一旅，任刘会文为旅长，陈玉甲所部改编为第二旅。次年（十六年），晋奉交恶的结果，阎锡山被张作霖打败，奉系骑兵旅长郭希鹏从护理都统满泰手中接过绥远区都统大印，张作霖提升刘会文为绥远警备第一师中将师长，并指挥警备第二师陈玉甲部。

被张作霖任命为奉军第三十军军长，兼包头镇守使的满泰，与刘会文是多年的金兰兄弟和生死患难的同志。可满泰招抚的戴茂山（戴鱼儿），因嫌队长的官小又哗变了，刘会文却将他收编为第三团团长。民国十七年（1928年）阴历正月十五，武川县的乡俗闹元宵时，警备第一师一团乔泉清所属驻在该地的士兵，因看红火与当地民团战士发生口角，被解除了武装，马骥就在二月初二打开县城，进行刁抢。事后，刘会文拒绝了幕僚陈之的、苗

英等人的几次建议，对马骥不加追究，郭希鹏无能为力。武川东部士绅石良筠（字子璋），西部士绅梁永芳（字兰斋）到北京向张作霖控告，张即改派曾经当过热河区都统的汲金纯接替了郭希鹏。

张作霖清楚刘会文是革命党的人，派汲金纯来就是要杀他的。当时正是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四个集团军，联合向他讨伐的时候，张自然疑虑刘会文要有所举动。事实上于佑任已经派张遐民（解放前任绥远财政厅长，后逃往台湾）持函，促刘会文联合满泰、王英各军，起兵响应北伐，驱逐奉军在绥远的势力。但刘会文既不敢积极行动，又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说什么“立起一只鞋卜子，他（指汲）也得吓一跳！”汲金纯是以召开团长以上官员会议为名，在民国十八年阴历三月上旬，把他和陈玉甲以及两部的五位团长，诱捕于绥远都统署^②。甫及一周，就借口马骥刁抢武川案，以“纵兵殃民，蹂躏地方”的罪名，把刘会文杀害于新城西门外南畔，马骥也在同日，被奉军绥远警备司令刘振东派人押赴武川正法。

事后得知：刘被扣捕前，汲金纯曾以隐晦的口气试探过满泰，“如果绥远的队伍有叛乱，你的部队能不能对付的了？”满泰表示：“我有两挺水压机关枪（俄造连发机枪，当时的先进武器），凭这两挺就可以打他两个团”。迨刘被捕后，陈之的想请满泰缓颊，见面后说明来意，满泰默然。在民国十九年（1928年），萨拉齐县七十四村父老捐款，《绥远民国日报社》主编张元文书丹，给刘会文在大偏的墓前，勒石树碑，表扬他的生平事迹。据《绥远通志稿》卷六十二载：“按武川惨案发生，师长刘会文亦以统属无状，褫职讯办，后竟与马骥同抵法。会文自民国十二年成立警备队以来，训练士兵极严，剿匪多著勋绩，驻防各地，民皆爱戴。及改编为师，遂不无变通收匪，迁就编制之举，而卒以此被祸，绥人皆痛惜其名绩之不终也”。其实，卷六十二对于刘

会伙的死因和王玉霖（即王定新）、魏忠义的被杀，得以表面现象着笔，而隐讳了他的实质。倒是经近的人民群众认为三人的政治背景与魏忠义相同，故合称为“绥西三事”云。但直到刘会文被杀以后，真格是月残星陨，哲人凋零，五英雄只剩下满泰一人了！

满泰字子舒，土默特旗那尔坨逊村（现属包头市郊区）人，生于光绪十年（1884年），是半农半牧家庭的儿子，幼年他读四书五经，通晓古今成散兴亡的历数，并且在李德慈传授下，练就一身过硬的武术本领。他个性宽和，虑事深远，居常以柔制刚。这次起义失败，战马阵亡，他单身投奔五当召，找到叔父雅林努勒大喇嘛处避难。但因通缉甚严，雅林努勒大喇嘛又被传讯过，觉得久居恐将暴露，就在叔父的安排下，把他化装成小喇嘛，另派一名去过西藏的徒弟作向导，领他去布达拉宫躲藏。他先到了青海唐贡召（塔尔寺），又觉得西藏语言不通，没法生活，便辗转去了武汉，颠沛流离，窘况可知。听说王朝烈已在烟台当了市长，困愁之中，只好投奔了他，夜给一个小差事，糊口而已。经远士绅卜兆瑞、武尔功等人，得知满泰流浪在烟台，经向都统马福祥疏通，撤销了前任的通缉令，他才回到那尔坨逊村家中。这时候，玉禄的骑兵游击队已被马福祥扩编为绥远骑兵补充团（即以后的“老一团”），玉禄的族兄武尔功，建议玉禄“文人用张兰田^⑧，武人请满子舒，就能搞好团体”。玉禄遂向马福祥保举，准满泰担任了补充团的团附（即副团长，当时的团编制称团附）。

满泰成为玉禄的副手，协助团长治军剿匪，建树颇多，又因他经文纬武，善于团结全团官兵，威望日渐提高。到民国十四年（1925年），玉禄在伊盟剿匪战斗中牺牲^⑨，他继任了团长，激励全团官兵化悲痛为力量，再进伊盟为玉禄报仇雪恨，打得苏雨生、刘喇嘛等匪伙不能在伊盟立足，除将玉禄首级奉还外，都窜到榆林投降了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在包头警备司令石友山主祭

下，选择包头城南永合成地南滩的旷野上，给玉禄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包头的商民百姓都佩戴黑纱，沉痛地悼念了这位为保卫家乡付出生命的将军，满泰也完成了他易任后的第一个心愿。

从此，满泰以“老一团”为基础，在军阀混战、全国动乱的大气候催化下，利用各派系军阀之间的矛盾，剿匪安民，造福家乡，把“老一团”发展成旅而师，师而军，他自己还一度护理了绥远都统。然而当阎锡山腾开手的时候，马上急转直下，给他编了个军而旅，旅而团，团而散。因为“你绥远原来是我山西的一道”（阎锡山语），你还倡议过“绥人治绥”，我是不能忘记的。满泰寄人篱下，还想实现自己的愿望，借别人的水，想养自己的鱼，不管是以退为进，或逆来顺受，在阎锡山眼里探砂子的形势已经消失了！

民国十四年（1925年），从北洋直系分裂出来的冯玉祥先生，派李鸣钟接任绥远都统。满泰的“老一团”被扩编为绥远骑兵第二旅，满泰任旅长。次年，晋奉联合打败冯玉祥，国民军从南口败退下来，经绥远西去甘宁。晋军撵走李鸣钟，阎锡山派第一师师长商震为都统，扩编第二旅为晋绥军骑第二师（后改称第五师），升满泰为中将师长。由于团体的扩大而兵源缺乏，为了充实编额，不得不收抚当时所谓“龙虎五座山”的赵青山（赵半吊子），金山（小金子）、郭春山（郭秃子），和陈虎臣（陈得胜）等匪股为部属。这些人各率四、五百以至千二八百的人马，骚动于察绥地面，北洋军阀两难。他的产生是有其社会根源的，他们既是北洋军阀的反动势力，又是绥远人民的灾难渊藪，总兵力不少于绥远区主、客各军的和数。可见只有依靠土生土长的绥远蒙汉权威人士，对他们进行招抚收编，才能安民实军，一举两得。但薪饷、服装、给养都没有来源，各旅就地征食，人吃马喂就把地方吃塌了。人民不堪其苦，十室九空。因在民国十七年冬末，萨拉齐县城围的灰老鼠和黄耗子整队嘶咬，一

夜之间积尸半城壕^⑮，群众迷信是天遣的先兆，就编出“先死耗子后死兵，死了满泰死王英”的歌谣发泄怒气。其实满泰的人品和抱负，绝非王英所能望其项背。群众不明真像，就把他和王英等量齐观，满泰蒙受了求全之毁，历史唯物主义者，不应以一管盖大德。

民国十六年（1927年）六月，张作霖的奉军盘据华北各省，他由原来的“安国军”总司令改称“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坐镇北京，问鼎中原。蒋、冯、李、阎联合，兴兵北伐，商震奉调赴前线指挥作战，满泰护理了绥远都统印。为时虽仅三个月，但他利用这一机会，大封官爵，把绥远区参加过革命和其他知名绅士中的不少人，如郑化国、郭向伋等都聘为都统署的高级参议。这时，奉军一度占领绥远，满泰把都统印交给郭希鹏，他被张作霖委任为奉军第三十军军长兼包头镇守使，赫赫乎俨然封疆大吏，与“治绥”台阶相去几何？

然而花飞花谢，风雨无情，北伐军终于打败了“安国军”，张作霖于民国十七年六月二日通电停战，退出北京。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阎锡山当上北平卫戍总司令，成了晋、冀、察、绥四省及平津二市的统治者。但阎对满泰拒绝张作霖让出兵进攻山西的功绩并不领情^⑯，即派李培基当了绥远区的都统。

民国十七年（1928）六月，李培基来绥视事，阎锡山撤销了包头镇守使署，把三十军缩编为旅，拨归晋绥军骑二师郭凤山节制，李根车任旅长，满泰被解除了兵权。

满泰被解除了兵权后，阎锡山调他当了土默特旗人首任土旗总管，不过已由原来的中央特派，改为由省政府荐任。自民国二年撤都统改行总管制，月给薪饷及办公费各为现洋五百元，历任总管都是外地人，自然乐得享受。满泰接任视事后，就主动提出他的薪饷及办公费，每月各减二百五十元，从此形成了定制。可见他虽觉得“治绥”无望，还退而想“治旗”吧。

民国十九年（1930年），阎、冯联合倒蒋，发动中原大战。蒋介石派人密来归绥，携巨款馈赠满泰，要他号召旧部，在后方牵制阎、冯，支援正面战场，满泰拒收赠款，并对来人说：“我是不参加任何内战的，因此不能响应号召，请你转告蒋先生。”事后有人怪他死心眼儿，对他说：“作不作，如何作，都在你，收下赠款何妨呢？”满泰笑答：“背信弃义的事我不会作”。

也是这一年的秋冬之交，杨跃峰（杨飞虎）也就是杨猴小，和史文华（史老么），按照住在河西的二老财（王英的姐姐王友琴）之邀，从察哈尔接上王英回后套（现巴盟），. 侦知绥远城防空虚，就想破城抢掠，吓得住在归化城的文武官员和绅士商人等，惶惶不安，束手无策。当时满泰仅有几名随身卫兵，却致书王英让他识些火色：“速去后套，否则我就领兵进击”。王英素知满泰说到作到，只好绕城而过。后来就流传下“满泰一封信，吓走王英”的佳话。

民国二十年，王靖国兼绥远警备司令期间的某一天，有三个歹徒拿着手枪，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把摆在归绥旧城牛桥北路、广隆马店巷口的洋钱摊子（作银元与纸币互兑的摊点）抢了，失主不敢报案。但事为《绥远日报》采访员获悉，就把属于四分局局长裴荟辖区内发生的这起抢案公诸报端，王靖国看见后，认为有人故意给他脸上抹黑，勒令省会公安局长卜兆瑞限期破案，卜又严飭裴荟如限缉凶。于是经过侦察，很快就三名罪犯逮捕了。

原来满泰的乘龙快婿是毕克齐蒙古大财主李福田的次子李增华。革命先驱王定圻的过继儿是王佐治。这两位不知天高地厚的荒唐伙伴，依靠家资和父辈在绥远的特殊地位，与萨拉齐当过土匪而后贩卖大烟的侯昆山厮混，狂赌滥嫖，尽情挥霍。有一天，李增华向老岳父的护兵借了一支手枪，由侯昆山壮胆，王佐治望风，把一家钱摊的票子和现洋都拿走了。但三人作案以后，仍在

城里吃喝玩乐，认为公安局长卜兆瑞是王定圻的老同志，分局局长裴基是父亲的好学生，又都是包头的老乡，王靖国且系老岳父满泰的朋友，纵然案情暴露，凭恃这些关系网作保护伞，也就无所谓了。

李福田听说次子增华惹下大祸，一下拿出三五万现洋托人“走后门”，向王靖国求命。同时领着二姨妇找上裴家门求满泰。没想到满总管非但不能准如所请，反而在《绥远日报》上登出一副启事，声明“小女不幸，所适非人”，突出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立场。他这样一表态，弄得王靖国很被动，虽然与他交情深厚，也不好手下留情。于是把李增华和侯昆山都判处死刑，拉到美人桥枪毙了。侯昆山在刑车上大骂满泰“为了乌纱帽，忍令闺女当寡妇”。至于王佐治，由于省党部委员潘秀仁、赵允义和士绅张钦等人联名呼吁，念在王定圻仅此一脉孤遗，又且认罪态度较好，就把他宽大释放了。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前，阎锡山从大连潜回太原。蒋介石迫于这种形势的变化，任命阎锡山为晋绥绥靖主任，重掌晋绥两省军政大权。次年，阎委满泰为中将蒙边司令，后又加委傅作义的绥北、王靖国的绥西两个护路司令部的副司令，再加上他的土旗总管，可谓官衔不小，官职不少。实际上蒙边司令、两个护路司令部的副司令都是名义职务，阎锡山只不过是利用满总管在绥远蒙汉人民中的威望，把他摆设起来让人看的。

然而，壮志不已的满泰，终于抑郁不起，病逝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七月。

六

在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时期，绥远地区蒙汉人民中的有识之士，为了推翻清朝政府、反对北洋军阀的腐朽黑暗统治，曾掀

起过多次揭竿而起的武装暴动，其中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莫过于五英雄起义。因为这次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是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主持下，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发生在土默特地区的蒙汉团结对敌、共同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的典型范例。然而这次起义，被北洋军阀扣了一顶“叛变”的大帽子，很快地镇压下去了。延及国民党执政以后，绥远的历届省府，对他们的正义行动，虽然未敢公然否定，但也没有正式给予肯定。但是在民间的广大人民群众中，一直口碑流传，歌颂赞扬他们的英雄事迹。正如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有不少为官史所不载的好人好事，被群众顶礼膜拜、戏剧性地保存下来一样。

我写的这篇传略，除自己采访到的资料而外，尽可能地查阅了一些有关书籍，依据民间传说，力图核实其真。但也难免有舛错和失误。特别使我遗憾的是：李雨山烈士的生平事迹，所述甚少。这就并请热心于抢救史阙的朋友们，给以补正了。

注释：①笔者根据目前搜集到的一些史料中查出，绥远区在辛亥革命前后参加同盟会的共约四十五六人，计丰镇有米尧（警务长）、郭福昌（厅署师爷）、田子功（队长）、张子光（知识分子）、徐登第（秀才）、赵钱子（秀才）、张占魁（小状元）、刘振文、何全孝、史华甫等人；归化城有范震（樊乘钧的内兄），驻城新军巡防队曹富荣（哨官）、张琳（哨官）、刘武泰（哨官）、康佐臣（哨长）、刘莘农（书记官），以及刘少瑜、张万禄、吴金山、吴鸿昌等人；包、萨有云亭、安祥、经权、满泰、王肯堂、李雨山、郭鸿霖、王鸿文、李士尧、李士修、李茂林、刘会文、武海、侯宪章、卜兆瑞、裴善、刘斌汉（长毛子）、张万顺（胖挠子）、郭效周、毛仲祥、曹诚斋、董×等人；托克托有阎懋、刘兆瑞、李永清、石兰茂等人。但上述人数，并不一定完全。

②见《孙中山选集》上卷82页。

③起义军入城后，纪律甚好，秋毫无犯，只是要求商行供给白银三万五千两（此款在丰镇厅改县后，新任范县梁发给公债券，抵交上解款），作为部队薪饷，钟商代表欣然接受，并于三日跨如数交付。四日后，清军陈希文的毅军一个营，和头旗马队一旗（连），共约六百余人的兵力进行反攻，起义军望路退出丰镇。王虎臣率一营在得胜口与头旗马队遭遇，激战被俘后遇害；张占魁带一营撤到永善庄附近；武万义领一营退至隆盛庄境内，后来卢占魁就是以这一营为基础起家的。头旗马队和步旗二队进入丰镇城，无恶不作，例如故意撕开裤裆让妇女缝补，以调戏奸污；木匣子里放上活麻雀去当铺典当珍宝，铺伙开匣验宝，麻雀飞走，就说把活宝给放跑了，以此诬赖勒索，他们明抢暗夺，数日不止，乱杀二十多人。后人不察，以讹传讹，就说成是小状元刁丰镇，一直影响到今天。后来武万义被阎锡山收编为丰镇县警务长，张占魁收编为抚顺马队，驻防代县，都被杀害了。到民国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北洋陆军总长段祺瑞，为了抚慰革命党人的不平，软化革命党人的斗志，曾追认王虎臣为烈士，追赠陆军少将级銜。

④曹富章等把部队拉到包头附近的黄草洼，七位带兵官都自称都督，总兵力约二百余人。与党人郭鸿霖等取得联系后，郭等拟在包头创造一个独立局面，郭与李士修、李茂林、王肯堂以包头镇学董和咨议局议员身份拜会樊恩庆，另由杨云阶策反清军驻包官带王紫绶、游若霖及驻大余太官带郝树屏举兵响应。老奸巨猾的樊恩庆慨然赞同，设宴欢迎，暗里却埋伏杀机，准备一网打尽。郭鸿霖等缺乏警惕，都只身赴宴，遂被杀害，所部亦被解决。因地址在包头镇公行的马号厅子里，故称“马号大院事件”。李士修、郭效周为了给死难同志讨还血债，曾两次对樊恩庆行刺，都失败了，成为千古恨事。

⑤见《孙中山全集·第一集》。

⑥如王建屏在民国二年任萨拉齐知事后，回山西当省议员，因与续桐溪、景梅九、弓富魁等联合反阎，被阎锡山逐出山西，民国十一年在陕西终南山出家为僧，自号力宏法师，抗战前曾来归绥（现呼市）主持过一次投戒大会。郑效周和裴苍，则在日寇占领时期当了汉奸，郑任“水运公会”会长。

⑦张绍曾字敬舆，直隶大成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辛亥革命爆发时，任清军第二十镇（师）统制（师长），因与吴禄贞、兰天蔚合谋起义，进兵丰台，推翻清廷，事泄后，吴被刺，兰潜逃，他被削职。袁世凯当了民国大总统后，认为张绍曾思想同情革命，但用之则可羸靡，弃之必将推向对方，所以就给了他这个并不十分乐意的绥远将军。

⑧哲布尊丹巴侍棍内蒙，土旗佐领图森额、刚仁额、塔庆阿、大召喇嘛额力吉、杨家堡人达赖等五人，潜赴库伦联系，返回土旗后，策动玉禄投向外蒙。嗣后，有土旗陆军营派赴库伦的吉述太十二人，在返旗途中被北洋滂江守备队截获，除达绕一人逃脱外都被处死。接着，张绍曾在民国二年初冬，在归化城北的小教场解除了土旗陆军营的全部武装，被遣散的官兵，多数去投玉禄或参加了卢占魁的“独立队”。外蒙取消独立后，玉禄仍然气愤不已，要自搞独立，故云。

⑨宣统二年，清政府为了缓和国内舆论，被迫筹备君主立宪，各地设立民意机构咨议局。包、萨的土旗蒙族议员经权、满泰、武海、云亨和云亨的父亲二仓、安祥的父亲克仁额、汉族议员郭鸿霖、李士元、李茂林等联合在一起，并把王鸿文安排在咨议局当文牒，郑效周介绍到五原厅任掌案（秘书）。他们结成了代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步势力，和以张惠、张命中、董鸿飞等为首的保守议员相对抗。

⑩余间休息时，孙中山看见刘会文一个年轻人长着满脸又黑

又长的好胡须，就走过去询问他的籍贯、年龄和姓名，刘起立答问后，孙中山风趣地笑道：“你姓刘，所以就留刘胡子么。”从此，刘胡子就成了刘会文的雅称。非常会议闭幕后，他在动身返回绥远时，在广州买了一个圆形铜盘子作为纪念，一直保存下来，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他的次子刘鸿军同志托人要回，保存至今，原物犹在。

⑪五英雄起义为“官史”所不书，有关他们酝酿起义的活动，民间固然有些传说，但其中的某些机密活动，即便在盛时也未必为外人能知道，所以民间也没有传开了。笔者根据当时的历史，作了深入的、纵横的、反复慎重的考虑后，大胆地肯定了已被收编为骑兵团长的卢占魁，也介入了这次起义。试想：1、卢占魁所部，在当时的绥远区，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而且一直在革命党人弓富魁、王定圻的指使下进行活动，王定圻被杀后，活着的革命党人不会放弃了这支力量，何况党人何金孝、史华甫等人，始终没有离开卢占魁的部队，他们并不满足于长驻后套，自然要怂恿卢占魁革命。2、当时土旗的图森额是卢部军法处长，锦福是团附，还有其他一大帮人都跟着卢占魁，这个条件就吸引着云亨他们搞起义时，肯定要进行串连。卢占魁及其谋士们，当然自知并非北洋军阀的嫡系，不会一速倒在军阀怀里，而拒绝起义的要求。3、安祥牺牲时已穿上狗皮袜子，证明天气已冷，蔡成勋派兵围攻卢占魁是阴历九月二十日的事，这一时间决非巧合，故肯定五英雄起义时间，是在蔡军出动伊始，亦即正文上所说的阴历九月二十至二十四日之间。4、卢占魁部的喜生老四二长条撤进伊盟，卢本人率大部东进察哈尔草原，并非被打散，这与起义部队曾拟拉到鄂尔多斯高原，应该认为是有计划的一步。5、如果被利用，日本的黑龙会，满清的宗社党，统系的倪嗣冲，以及想坐都统的王培焜，都懂得利用卢占魁这部力量，卢占魁为了抬高身价，也与他们互相勾搭。五英雄并非傻瓜，自然要千

方百计地发动这部力量并得到同意后，才敢举行起义。因此，不论从历史渊源、民族关系、地域感情和政治、军事各个角度来观察，五英雄起义和卢占魁被刺的事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⑫在扣捕刘会文、陈玉甲、马骥的同时，还扣捕了刘的第一团长乔全清，三团团长戴茂山，陈的第一团长云升阁，二团团长黄根成。当晚，区别对待，刘、陈、马三人隔离囚禁，戴茂山因系土匪出身，送到妓院里住宿，意思是让他偷跑，但他没跑。乔、云、黄三人给派了一名副官，打了一宿麻将牌。次日，对乔、云、黄及戴茂山作了口头安慰，“不要顾虑，你们的师长不日就可回去，只是马骥一人的问题”。隔日，令乔全清、戴茂山归队，叫乔全清暂代刘会文为师长。云升阁、黄根成都让回到清水河防地掌握部队，稳定军心，但云、黄二人正要从归化城去清水河防地时，部队已全部哗变，都回到满泰的三千军了。从此，二人脱离军队生活，云升阁到后套当了几天税务局长，回包头当寓公了。黄根成改行行医，成了后套的名医。戴茂山又刮了野鬼，乔全清带领他的团投效张砺生，当了国民党中央骑二师的团长，抗日初期，任绥远民众自卫军第三路副指挥，在清水河作战牺牲。至于陈玉甲，因搬起张作霖的儿女亲家赵倜说情，被解送北京大帅府军法处监押，张作霖在民国十七年六月四日退出北京前夕把他释放，一位军法官对陈玉甲说：“妈拉巴子的饶你个活命吧，这是你先人们给你积下些德、你小子以后学些好”。他回到绥远。

⑬张兰田，名玉成，河北沧州人，刀笔吏出身，清末任清水河厅红笔师爷，长于案牍，后在满泰和荣祥当土旗总管时，历任秘书长多年。

⑭民国十四年，玉禄以清乡司令的职衔，率“老一团”进入伊盟剿匪，被苏雨生，刘喇嘛、金宝山等匪伙诱围于杨三虎圪卜。因他在出征时，嫌鞍马劳累，是坐着轿车指挥的，目标太显

著，驰骋又不便，卒被匪徒俘去，苏、刘、金、李、匪首，拟拥玉禄为他们的共主，力劝俯就，玉禄不从，遂吞金自杀，匪众益恨，割头而去。

⑮见美国记者斯诺所著《西行漫记》。

⑯张作霖召集满泰、王英、刘金文、陈玉甲到北京见面，张让满泰出兵河曲、偏关攻打山西，满泰以“宁道得罪，也不惹恼近邻”的话向他拒绝，张听后有一惊色，满泰说：“我今日不打晋，将来也不反奉，我给您守后方吧”。张作霖见满泰态度明朗，也不再强求了。

附记：曾参考《绥远通志稿》卷六十一、《内蒙古辛亥革命史》、《呼和浩特史料》第一、四、五辑、《包头蒙古族史料》、《乌兰察布文史资料》第一辑、《乌兰察布文史资料》第三辑诸书中的有关记述。

（张尔杰同志是政协土左旗委员会委员）

孤灯子影话春秋

——漫谈察素齐历史之变迁

(察素齐地方史话一)

白贞

察素齐，蒙古语为“造纸者”的意思。清末到民国的有关资料也写作“插苏”。

察素齐地处旗境的中偏西部，位于北纬 $40^{\circ}42'$ ，东经 $111^{\circ}07'$ ，坐落在大青山南麓二公里处，南北、东西各长5公里。

就其历史发展的轨迹而言，夏商时在冀州徼外，属鬼方；周时在并州徼外，属榆狄，战国中后期属赵国云中郡之中北部；秦时为云中郡之中北部，西汉时属朔州刺史部云中郡之中北部；后汉时属并州刺史部云中郡北舆县之西部；三国时，初属曹魏，后入鲜卑。两晋时属鲜卑。北魏时属朔州云中郡中北部；隋为榆林郡金河县之北部。唐属关内道丰州，隶属初为安北都护府，后改称单于都护府。五代十国时，初属后梁胜州北部，后属契丹。辽时为西京道云内州柔服县（县治在今三两乡附近）之东部；金属西京路云内州云川郡之东部；元时为河东山西道宣慰司大同路云内州之东

部。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以前，为明山西行都司大同府云川卫云内州辖，后属漠南蒙古土默特部；清属土默特（副）都统衙门和归绥兵备道辖，实行蒙汉分治。民国时期，为土默特总管衙门和归绥县共管。

察素齐之为村落，始于何时，尚未见到明确的文字记载。故老相传，大约始于清乾隆年间。

大凡每一城市乡邑的兴起，都是该地区政治、经济、交通、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究察素齐产生之历史，也同样受着上述诸因素的制约。

清王朝问鼎中原后，自顺治，历康、雍、乾三朝，其间共一百五十余年。这一时期，清王朝国势日盛，封建帝国的中央集权统治日益巩固，社会生产力获得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康熙以来，为开拓疆域，绥靖边陲，多次对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发兵征伐，以实现扩张领土，平息这一地区蒙古、维吾尔等民族的反抗和叛乱。而清王朝兵伐西北的进军路线，其中重要的一条，即由塞外经土默川平原、河套平原，入宁夏，经由河西走廊入新疆，或径直由土默川平原越过阴山山脉，直趋蒙古，翻越戈壁阿尔泰山（古称涿邪山、浚稽山）、杭爱山（秦汉时称燕然山、隋唐后称为都斤山）至阿尔泰山（金山）一线而进入新疆。但清军无论是西行抑或北逾，土默川平原为其必经之地，乃至获胜回军亦途经于此，故有康熙西征噶尔丹回军驻蹕呼和浩特、小召的史迹。而居于土默川平原中部腹地的察素齐地区，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自古即为重要通道，因而亦易形成村邑。

其次，察素齐地处呼和浩特和包头二市之间，扼呼、包之咽喉。呼和浩特为明代漠南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阿拉坦（俺答）汗所建，即使到乾隆中叶也已历时二百余年，为漠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土默特部自清崇德元年（1636年）附清始编旗，置都统，治所驻呼和浩特。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增设

归化城同知，隶山西朔平府，为土默特地区设府之始，以管理从关内出早种地、经商的汉人（尚未落籍，实为寄民）。雍正十三年（1735年）始建绥远城，至乾隆四年（1739年）绥远城竣工，清廷移右卫八旗军驻防于此，并置绥远将军，乾隆元年（1736年），清廷置绥远同知厅并和林格尔、清水河、托克托之协理通判厅。乾隆四年（1739年），又增设萨拉齐和善岱二协理通判厅。乾隆六年（1741年），增设归绥道，十一年（1746年）加兵备道。包头虽直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始设县，但自乾隆年间逐步发展为土默川平原西部的商贸重地，并日益以水旱码头闻名于西藏地区，至嘉庆十四年（1809年）设镇，隶于萨拉齐厅管辖。地处察素齐西面的萨拉齐和南面的善岱、托克托，曾先后于乾隆元年、四年设为协理通判厅。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清廷裁撤协理通判厅时，善岱厅并入萨拉齐厅，萨、托二厅均升为理事通判厅。由此可见，上述地区最迟在乾隆年间即已人烟辐辏，商贸繁荣。笔者的先祖于乾隆初年因经商由河北正定高头进入土默川，先居于善岱，于乾隆末年方与薛、金等六户回回自善岱迁居察素齐。由此亦可知，察素齐最迟在乾隆末年已发展成为一户颇具规模的村邑。这主要得之于察素齐地处归、萨、善及托克托三角地带的冲心，东西南北往来的土农工商均路经察素齐一地，甚则留居于此，因而相聚成邑。

再次，我们从察素齐所处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来看，也具有适宜稼穡，广辟良田，是以成为较大城镇的优良条件。察素齐背负大青山，俯瞰土默川，土地平坦，土质肥沃，是发展农牧业生产的理想之地。大青山自东北而西南，一脉逶迤而来，横亘于察素齐的北面，俨然为一道天然屏障。地势也自东向西缓下，站在大东梁上西望，察素齐犹在凹中，沿山又无深沟犬壑，四季少顺沟风的侵袭，因而常年气候较呼和浩特与包头为温暖。察素齐四面的土地，土质多样，既有灰褐土、草甸土，又有少量沼泽

土，适宜各类作物的生长，诸如麦、麻、谷、黍、菽、瓜、果、蔬、烟、葵，均可种植。地下水水质清醇甘美，水量丰沛，是人们生活居住的理想处所。

察素齐地肥水美，有史以来即有较优的水利灌溉条件。西北面的万家沟终年有清水，雨季尤富洪水，北魏时即有“塞水”之称，自乾隆年间开始，不仅淤积、肥沃着把什乡哲斯沙尔沁、古城、把什、西柜、南柜、云社堡，参将、缸房、五里坡、毛圈亥、三道桥等十数村的万亩良田，也淤灌着察素齐的土地。万家沟的清、洪水自把什村南经察素齐西门外白雨庙入察素齐西园子村，沿途灌溉着西园子、滴不浪街、奶奶庙、召庙巷以南的大片土地。水至南街（现名东西巷），一分为二：一支经“葡萄架底”直上“黄油圪踏”，一支经“南园子”直抵“温家圪旦”，沿途可溉沃数千亩良田。这一灌溉之利，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仍得其利，直是到七十年代中后期，因自滴不浪街以东（包括现在的长安街、友好街）河渠南面的土地被逐年占用建房，尤其是友好街以南一段已无地可浇，致使坝内的渠道渐淤塞湮废。但除此之外，其它土地仍然享受着万家沟清、洪水的溉沃。

另外，察素齐的北面有西沟和东沟。西沟稍有清水，主要为西沟门村的土地受益；东、西两沟的洪水量亦较富。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二百多年中，因受社会生产力低下和封建小农经济的限制，个体农户无力独自拦水淤地，也无力开渠引水浇地。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随着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发展，两沟的洪水使防洪坝以南的大片土地获得淤溉之利。同时，洪水向察素齐东南方向一泻而下，使那里的土地也获得淤灌。

不仅于此，察素齐北面的大青山中蕴藏着丰富的优质无烟煤，无论是万家沟、西沟、东沟，均可掘煤。这对当时矻矻追求衣食的人们来说，能够解决维持人类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之一的能源燃料，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还应该指出的是，从大青山掘

煤、运煤，除了供应本地区人们的燃料使用外，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近两个世纪中，所掘的煤更多的是运往呼和浩特销售，供城里人作燃料。这也是当时的察素齐人籍以谋生的重要手段之一。大青山不仅有煤，而且还长满茂密的林木。据故老相传，就是到光绪年间，前山的阳坡上还长有苍郁的松林，以致今天岁届耄耋的老人回首往事时都不禁感慨地说：“我们晚在住的房子的椽檩，都是咱们本山的。”这一历史到今天，也不过百余年。

现在，我们再从历史文献看，早从两汉以来，土默特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时期的称谓先后有云中川、敕勒川、白道川、丰州滩、土默川）即已出现过规模或大或小、时间或长或短、人口或多或少的农业生产。到明朝中叶达延汗统一漠南蒙古后，特别是其孙阿勒坦汗成为土默特部的封建领主后，开始在土默特地区发展板升农业。可以说，这些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农业生产是土默特地区农业的先河。清王朝统一中国后，由起初的限制关里的汉人出关种地到允许关里的汉人到口外雁行式种地，到寄居种地直到落籍为农，前后经历了二百多年的时间。到乾隆二年（1737年），清政府为解决山西、绥远地区驻军的粮秣，在土默特地区先后放垦大粮官地二万一百余顷，从此，才正式允许关里的汉人（主要是山西的汉人）来土默特地区居住种地，逐步变雁行式耕农为寄居耕农，有的则干脆为清廷“移民实边”政策所招引，由清政府发给川资，携妻带子迁移到土默特地区的。至于真正落籍为农，则是光绪十年（1884年）的事了。我们通过反复调查已经知道，在乾隆年间来到察素齐的汉人，基本为上述两种情况。由此说明，历史资料和故老相传是吻合的，即所谓“乾隆朝开禁，汉民由山西口里迁来”，“察素齐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察素齐形成村邑是在清乾隆年间，是清王朝在土默特地区大量放垦生地，并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的

产物。察素齐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有着山川的形胜，气候宜人，交通便利，物产丰饶的特点。

据察素齐仍健在的耆老们的一致说法，在乾隆初年，开始有山西的汉人在察素齐定居，以租种蒙古人的土地为生。起初从口里出来种地是“跑青牛犊”，即雁行式，春来秋回，不能居住。究竟何时开始从口里出口外“跑青”种地的，耆老们都无法准确回答，只说先人未传说过。而我们通过历史档案资料知道，口里的汉人出口外“跑青”种地约始于康、雍二朝，前后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到乾隆二年（1737年）以后才逐渐定居下来。

据张富先生讲，其先祖于乾隆六年（1741年）从山西宁武城关逃荒来到察素齐，当时的察素齐仅有六户蒙古人和六户汉人，以后汉人逐年增多，一些蒙古人也因土地在察素齐先后从其它地方陆续迁到察素齐定居。①其间，也有经商的河北固民先后落籍察素齐。乾隆六年（1741年）时，察素齐仅有的六户蒙古人②和六户汉人已难详知，较准确的仅知汉人有沙梁上（亦称温家圪旦）的温家和原宁武巷（现幸福巷）北口的张家。

事实上，今天的察素齐是历史上的五个自然村发展连结而成

注①：从其它地方迁来察素齐定居的蒙古人主要是因户口地在此而迁来。据蒙古族老人荣工祥讲，其先祖原居呼和浩特，因户口地在察素齐而由呼迁察，即两口子的一家。另一情况是，据说蒙古族聘闺女，往往以土地为陪嫁物，因此，一些蒙族随娶媳陪嫁的土地迁来。

注②：关于最初察素齐有一户蒙人仅系张富先生的先世口传，张富先生也记忆不太准确，但当初有六户汉人是确实的。同时，察素齐一些蒙古族也确系由其它地方陆续迁来。

的。这五个自然村的名称大多数一直沿用到现在，它们分别是：“西园子”，即现在的西园子村，因位于察素齐的西面，当时从山西来的汉人即以种水地经营菜园子为生故名。“淌不浪”，系蒙古语，汉译亦写作“塔布囊”。意译为王室的女婿，汉语称驸马，满语称额驸。其地理位置即现在的长安街西段，从星光巷西口往西至博彦路与长安街交汇处。这里住有原蒙古人王家，其先人中可能有位“塔布囊”，邑人以此相称，视为荣耀，久之代为地名。“碑楼儿”，其地理位置在现在的中学街南口四周，包括星光巷以南大部。相传，此处原为乱坟岗，为最初跑青牛碾种地的汉人死亡后的埋葬场所，后定居于后街（现团结巷）的温家有先人葬于此，遂建造碑楼故名，以后渐有人家在这里定居形成自然村。“察素齐”即“碑楼”以东部份，包括现在的长安街东段、友好街、和平街、团结巷、友谊巷、东西巷等。据温德小、乔前成、刘拉小、曹恩旺、刘应堂诸先生讲，“察素齐”系“淌不浪”蒙古人王家先祖的名字。从山西出口外种地的汉人互相询问：“种的谁家的地？”答曰：“种的蒙古家察素齐的地”，久而久之遂以人名察素齐代之以地名。据说，察素齐死后，葬于现在察素齐系（公社）砖窑一黄的“界地”西侧，俗称“塔滩子”里。六、七十年代，社员们在那里放牧、劳动，一些老年人还指着一座大坟冢说：“这就是蒙古人察素齐的坟”。这座坟直到察素齐公社（乡）建砖窑村东管平。我们通过分析考证，认为这一传说是可信的。另一舍自然村叫“温家塔旦”，也称“沙梁上”，即现在的友好街东口南侧，为荣巷（原索南巷）以东，沙河路南口西侧。因温家最先居于此地，故称温家塔旦，又因此处地处东沙河横头崖的沙梁上又俗称“沙梁上”。①在以上的五个

注①：在笔者随词译中，一些老耆说察素齐是由四个自然村发展连续而成的，但察素齐范围包括在察素齐之内。因为即便在察素齐之内，仍有许多小的居民点，都有着近似自然村的单独的名称

自然村中，以察素齐为最大。大约到清咸丰、同治年间，五个自然村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逐渐连成一体，并以其中最大的察素齐命名，约定俗成。

在察素齐由五个自然村形成一体的过程中，察素齐的蒙古人也逐渐增加到十来户，而且这十来户蒙古人在察素齐无论是蒙古人中，还是汉人中一致认为原占的蒙古人，他们分别是：西园子的荣家（喇嘛家）、淌不浪的王家（王世和）、同兴义巷后街（星光巷）云家（云锁应）、后街（团结巷东口）的云家（云根祥）、南街（现人民路南段西侧）荣家（荣旺旺）、召庙巷云家（苏嘎拉达）、营盘地儿荣家（荣耀先）、管召庙的李章盖家（李焕文）、蒙古巷（现乌兰巷东口）李家（李润）、云家（云大不浪）等。到清朝末年、民国年间先后迁来察素齐定居的蒙古人有东沙河槽云家（蒙古霞霞）、南街（东西巷）景家（景德全）、荣家（荣拴套）、南门底（现影院路南口西侧）李巨财、从沙尔沁迁来的荣六金等。^②

在清朝乾隆年间先后迁居察素齐的汉人，除我们前面提及的温家圪旦的温家（山西崞县同川池头村五都五甲）和宁武巷（今幸福巷）北口西侧的张家（山西宁武城关）外，还有东沙河槽“德厚店”周家（山西五台）、“骆驼磨”皇甫家（山西崞县同川北河底）、大、二“德旺盛”的李家（山西崞县同川北河底）、二亩地（现太平街）刘家（山西忻县禅档街）、“和善堂”刘家（山西定襄回凤村）、东巷廊（原东京巷，现东风巷）乔家（山西忻县陆右尹村夹道河。一说忻县王如太平街称“三亩地”，东庄街接近东门外处（东庄街东口北）称“树林子”，东西巷南部称“海前架底”等。

（注②：上面所列察素齐蒙古户数系以五峰家族为单位所统计的户数，而不是按单独的家庭单位所统计的户数。据旗史物馆伊克坚同志调查统计，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察素齐的蒙古民户计有21户。

要村)、晋南县巷(现友谊巷)的程家、袁家(两家均系山西静乐县人氏,袁家约于解放前后绝户)、后街(现团结巷)温家(山西太原府孟县泥店五都八甲)、草纸坊巷(现跃进巷)东口的高家(山西定襄崔家庄)、北门里(现中山路北口)的李家(山西宁武海子背,另一支于光绪二十六年水到察素齐后迁大德元巷,即现在的红旗巷)和郭家(山西徐沟柳村富王庄)、长安街中段路南的安家(山西寿阳县瓦岗寨村)、南场儿(原安南巷,现光荣巷)霍家(山西忻县双堡村,一支于民国十年左右迁太平街)、香坊园巷北(现全胜路中段西侧)的张家(山西文水县,一支于光绪年间迁察素齐南街葡萄架底)、后街(现和平街)田家(山西文水县)、袁家(山西保德州袁家庄)、任家巷(现新民巷)任家(山西太原府榆次县寿家庄)、星光巷中段路北的李家(山西祁县李湾村)。在西园子于乾隆年间最早定居的是焦家(山西忻县红笔针沟)、刘家(山西五台笔针沟)和石家(山西忻县沙城)。稍后有赵家(系西园子东赵、山西定襄向阳村)、渠家(山西祁县白圭镇)和郝家(山西祁县三家村三都三甲)等。以上各户均系在乾隆朝六十多年时间中先后迁入察素齐定居的民户。在嘉庆、道光以后陆续迁入察素齐定居的民户还有:晋南县巷(现友谊巷)梁家(山西汾阳梁家村)、南街(现人民路南段)曹家(山西宁武曹庄)、清东、民国初年,一支迁沙河槽东)、友好街马家(山西繁峙)、安南巷(现光荣巷)聂家(山西寿阳县)、老爷庙巷(现人民路中段西侧)和家(山西文水县)、中学街南口西侧(即碑楼)的彭家(山西文水县)、于家(山西应县)、韩家(山西太原)、史家(山西祁县鸡册村)、奶奶庙路西的(现影院路北口西侧)李家(山西忻县三家村)、西京巷(现胜利路)周家(山西忻州李里村)、清水溪街(现长安街西段)路北的兰家(山西崞县拍等村)、草纸坊巷(现跃进巷)龙家(山西崞县

下代林)等。①

在乾隆年间先后迁来察素齐落籍的回民有宁夏武巷(现幸福巷)的白家(河北正定府高头镇,先于乾隆中叶迁善岱厅,于乾隆末迁察素齐)、清真寺东侧的薛家(京郊通县薛家营,先迁善岱厅,后与白家同时迁察素齐)、金家(北京牛街,先迁善岱厅,后与白、薛等家同时迁察素齐)。在嘉庆、道光以后陆续迁来察素齐的回民有河北沧州孟村的吴家(住香坊园巷,即现在友好街71—76号)、河北保定府的白家(住蒙古巷,即现在的乌兰巷)、马家(住友好街)、宁夏固原杨家滩的杨家(住宁夏武巷,即现在的幸福巷)、新疆乌鲁木齐南关的骆家(住友好街四眼井东侧)、宁夏吴忠堡的牛家(住蒙古巷)。民国年间先后迁来的回民有呼和浩特迁来的贾家(住蒙古巷东口,贾大红弟兄)、王家(住蒙古巷,王巨财弟兄)、马家(马六扣弟兄)、付家(付世维)、萨拉齐迁来的陶家(祖籍山西右玉,后迁萨拉齐,再迁察素齐)、马家(马存信)等。

上面所列由山西、河北等地迁居察素齐的回、汉民户,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先世起初出口外“跑青”种地,乾隆初年开禁后遂定居下来。这一情形最有代表性的是“温家圪旦”的温家和同兴义巷

注①:以上所列乾嘉以来由山西迁入察素齐落籍的汉族各户均系家族较大的老户,一般笔者在调访中均未睹了各户所藏的家谱或“荣”(以图表记载宗族世系,汉族称之为“荣”,不知所用何字?此处姑且以“荣”字代之)。有的老户虽无谱或“荣”,但详知籍贯和世系,故均列入;但有些老户,既无家谱或“荣”,又不能详述其籍贯,如西园子的西赵和友好街的姬家等,故未列入。同时,亦限于笔者的认识局限和时间,有些老户尚未没有列入,其中,也有不愿详告者,因各有所虑不能强人所难,待以后有机会可另补叙。

(中山路)中段路西的高家。据温德小先生讲,其先世从山西崞县同州池头村来察素齐租种蒙古人的土地,春来秋回,每年将收下的粮食按二八或三七和蒙古人分成,二份或三份作为地租交蒙古人,剩下的粮食除窖藏籽种,人食马料外,也都卖给了蒙古人,然后带上现钱回家过年,到乾隆年间举家迁居察素齐沙梁上(温家圪旦)。当时,温家租种的土地很多,听老人说,察素齐的原占蒙古人差不多都到温家收地租。据高家后人高存喜先生讲,其先世从山西定襄崔家庄来察素齐跑青种地,种的土地即现在草纸坊巷(现跃进巷)以北七十亩,是大毕克齐蒙古人百岁的地,以南三、四十亩,是西园子蒙古人喇嘛家的地。当时察素齐没有人家,这里有太榆树四、五株,是先人们跑青种地的记号,每年从山西出来种地就住在大榆树下,秋天收完场把农具、人食马料埋在树下,第二年回来好寻找。这些太榆树约有四、五百年,其中一株古榆就长在高存喜老人院内,是察素齐最大的榆树,四人合围还抱不住。高家的先人认为是株神树,在树上盖了个小庙,平常焚香献贡,祈求保佑高家平安发达,直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才将这株古榆伐卖。

二、在清政府“移民实边”政策的推行下,迁移、安置于察素齐。这一情形最有代表性的是晋南县巷(现友谊巷和乌兰巷交汇处)的程家和东沙河槽“德厚店”周家。据程根喜先生讲,其先世和袁家(已黑户)祖籍均系山西静乐县人民,于清朝乾隆年间迁居察素齐。听老人辈辈传说,从老家出来时公家(按:指清政府)按人给带得盘缠路费,当时叫“移民”。刚来时住在山里,因为山西老家就是山区,出了口外还不愿离开山。住的地方就是现在东沟后头窑泥板西面的西地河,但因人口多、土地少养活不了,一支搬到察素齐的晋南县巷定居,一支搬到只凡梁的平泉营子,一支搬到武川的里气沟,里气沟的一支又迁到百灵庙的红山子。程家和袁家是晋南县巷最早的住户,老家本来是山西静乐

县，人们当时文化水平低，搞不清“静乐县”和晋南县的差别，加之口音和习惯，久而久之，就把这条巷子叫做“晋南县巷”了。又据周善善老先生讲，周家原籍山西五台，清朝乾隆年间往口外移民，周家遂迁移察素齐。当时公家（按：指清政府）给带有路费盘缠，并负责联系安顿。

三、靠工匠手艺出口外谋生，随后迁居察素齐。这类情形较有代表性的是东沙河槽“骆驼店”的皇甫家和察素齐闻名的大、二德旺盛的李家及任家巷（现新民路）的任家。据李存义和皇甫德全两位老先生分别讲述，李家和皇甫家原籍均系山西崞县同川北河底，李家先祖名李玉，是位刻碑石匠，皇甫家先祖名皇甫功，是位泥瓦匠，二人同时于乾隆初年携带家眷出口外以手艺谋生，相交甚厚。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一说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察素齐兴建关帝庙时，李玉和皇甫功都是建庙的匠人，当时的石碑上铸有二人的名字。后由于察素齐是农区，以农业种植为主，而且土地广袤肥沃，李、皇甫两家逐渐以农为生。据李存义先生讲，李家的先世曾和察素齐西面“贾家淤地”贾家的先世（贾家亦系山西崞县同川人氏），同时上武川纳令沟一带找地垦荒，当时到了白米会沟这个地方，李氏用锹挖土以辨土质，谁知一锹挖出一只“搬仓子”（类田鼠），认为晦气就说：“这个地方不好，瞎了眼的人才往这儿住了”，于是离开白米会沟往前走了五里，到了前乌兰哈达住下，垦有荒地七、八顷，贾家到了后乌兰哈达也垦有荒地七、八顷。直到现在，前、后乌兰哈达还分别住有李氏、贾氏的后人。此后，贾家的先人顺着万家沟这股水出山，看到沟前的土地可以淤灌，于是又将一部份族人从山中迁出，开始淤灌“贾家淤地”，随后就逐渐形成了老大柜、小三柜、西柜、南柜等以贾姓为主要村民的自然村落。李存义先生颇有感慨地说：“听老人们说，贾家的先人在口里就是务艺淤地的，所以人家有经验，懂得山川形势，于是利用万家沟这股水淤了那么多

地，还真不容易啊！”除了李家、皇甫家是靠手艺出口外谋生的外，影院东侧（即过去的任家巷，现在的新民巷）的任家也是这种情形。据任安梁同志讲，任家原籍山西榆次寿家庄，先祖是木匠，头一年出口外揽营生，第二年才把全家迁出来。后来修建奶奶庙（即现在察素齐乡机械厂和招待所处）都有任家的先人参加，碑上刻有名字。任家家传的木匠手艺一直没有丢掉，到现在仍有后人以木匠为生。再有磨街曹家，祖籍山西宁武曹庄，世为裁缝，出口外以缝纫谋生，后落籍察素齐，渐抛弃缝纫购置土地，后人遂以种地为业。

四、逢口里遭年馑，逃荒迁徙察素齐。这类情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宁武巷（现幸福巷）的张家和西园子的渠家。据张富先生讲，张家祖籍山西宁武城关，乾隆初年因口里闹灾荒，张氏先祖弟兄二人跑出口外谋生，遂定居察素齐，以种地为生。后人口增加，张家土地少，不足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于是，一支流落到山底下的白只户，一支流落到武川白毡窝儿。察素齐的一支除了种地外，农闲时也磨豆腐以补贴家底生活。西园村渠家后裔渠淳先生讲，渠家原籍山西祁县白圭镇，乾隆末年高祖渠寿经携家眷逃荒到察素齐。出口外时，一副扁担两只筐，一只筐中放娃娃，一只筐中放锅碗，餐风露宿，饱尝艰辛。在西园子安家后，先租种蒙古人的土地为生，到祖父渠泽、父亲渠生贵时开始发家，广购土地、置备车马，家盛一时。渠家从曾祖父辈分为“通、顺、生、存、财”五门，至今已历八世，人口已有四百余人。

五、出口外经商做生意，后迁居察素齐。这类情形的白家较多，特别是咸、同、光绪以来迁居察素齐的汉人，好多是出口外做生意最后落籍察素齐的，如“神楼”（现中学街南口西侧）的史家，西京巷（现胜利路）的屠家等。据史嘉亨同志讲，史家祖籍山西祁县鸡树村人，先世于乾隆末年从老家出口外做小买卖，肩挑小担子（小担卖布卖点针线等日常生活小用品，走村串社，以

此为此，后逐渐务农为生。周福安先生讲，周家祖籍山西忻州李里村人，高祖父周秉文身背针线土布包袱于光绪年间出口外做小买卖落籍察素齐，后渐发家致富，到曾祖父周敬礼时达于极盛，在四眼井南（现友好村委会办公处及四眼井）买地盖房，盖有几处大院，建有砖瓦厅房，后察素齐较天的地陈行商号“聚义兴”所占门面即周家所有，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家道中落，家业不振。除经商落籍察素齐者外，还有以其它职业谋生而迁居察素齐的，如后街（现团结巷）秦家即医行医看病为业而落籍察素齐。据秦天禄先生讲，秦家祖籍山西洪洞县圪针沟，先世得医，俗称“药生担”，走村串户看病卖药。清咸丰年间，因山西遭年旱，弟兄二人出口外谋生，落脚黑牛沟口，兄长来察素齐行医，遂定居于察素齐，兄弟俩来到团武川扁河，形成一秦家村。

六、由由西出外谋生先落脚它乡，后又迁居察素齐。类似这一情形的户家为数也不少，如后街（现和平街）袁家。据袁明玉老先生讲，袁家祖籍山西保德州袁家庄，先世于乾隆初年出口外，起初落脚在调拉齐的老藏营村，后来，一支于乾隆末年迁居察素齐，到祖父辈开始发家，但家门人丁不旺，至今袁家人口不多。又如前街巷“和善堂”刘家，祖籍山西定襄回凤村，先世出口外先住此老山奶奶庙沟种地为生，但土磨七狼狗和刁粮拖牲畜，不得安身，后又迁到察素齐落籍。北门里的祖籍山西宁武海子背李家（北门里有三家李姓，此李姓为大户），在原籍居山中为樵夫，以打柴为生，出口外后不习惯种地，于是住进尖青山西沟后面的烂木桥子，但仅靠打柴难以为生，遂又迁居察素齐。再如察素齐最早的几户回民白、薛、金、马诸家，乾隆初年由河北出口外经商最先落脚善岱镇，当时的善岱为协理通判厅厅治所在，又是水旱码头（大黑河从镇中流过，可为漕运），人口较多，商业繁荣，六户回民建有清真寺，置有坟地，到乾隆末年，一因民族矛盾，一因善岱自撤厅后，商业日渐萧条，几户回民

遂迁察素齐，有的则迁往萨拉齐或包头。

七、察素齐的回民，无论来自何地，多因经商而在此落籍。有个别户，如原籍宁夏吴忠堡的毕家，则为避清咸、同年间西北回民大起义免遭清政府的残酷镇压而逃居察素齐，有的亦因逃荒而来，如河北保定府白家，寡母领孤子白有福逃难到察素齐落籍，后渐富，到白俊时有地数顷，开有六陈行“福顺全”，三十年代曾自印“贴子钱”，成为察素齐蒙、汉、回中有名的富户。一般来说，回回初来均无土地，后逐渐购置，于是出现了亦商亦农的情况，有的甚则干脆弃商营农。

八、察素齐的汉人，基本来自山西，而尤以晋北、晋中居多（大概土默特地区的情况均如此），因而，无论是风俗礼仪、生活习俗、住房形制，还是口语方言、世情交往、文化娱乐，一概山西化，但个别风俗亦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区别，此处仅以人死佩孝为例，祖籍为崞县者，其孝帽为“七角(尖)子”，祖籍宁武者，其孝帽则缀有两根飘带；祖籍为忻州者，其孝帽则为筐篮形，不一而足。其它差别之处，不赘赘言，留待研究地方民俗的同志考究。

附：沙梁上（温家圪旦）温家家谱

温氏宗族世谱

大清咸丰三年九月中旬关南来人
东社村温天赋

池头村温丕亨 二人来抄家谱

同乐都

崇信都

住同川五都

崇仁都

崇义都

神原都

池头村系五甲

温氏族谱以縣得列名

从定邑（按：定襄）回凤村迁到醇县

（按：崞县）同州池头村

一 世

始祖温^{医官}生一子温子柔刘氏双① 生五子

二 世

温世贤 王氏 生五子住宏道村
刘氏

温世荣 聂氏 少亡
张氏

温世昌 常氏 生五子住池头村（三世）

温世隆 张氏 生五子住东社村

温世明 出家为僧

三 世 （世昌五子住池头村）

温福胜 刘氏 生一子

温福威 张氏 生一子

温福仁 聂氏

温福义 赵氏 生一子

温福智 赵氏 生一子

四 世

温彦整（胜生）李氏 生一子

温彦才（威生）聂氏 生一子

温彦宝（义生）王氏 生一子

注①：“双”字下面似还有一字，因家谱年代久远，纸质黄脆，磨损不堪，不知为何字。

温彦良 (智生) 刘氏

五

温文贵 (整生) 郝氏

温文玘 (才生) 聂氏

温文才 (宝生) 张氏

六

温思敬 (贵生) 刘氏

温思厚 (贵生) 李氏

温思梁 (玘生) 朱氏

温思岩 (玘生) 郭氏

温思郁 (才生) 张氏

温思经 (才生) 刘氏

七

温 普 (敬生) 田氏

温 迪 (梁生) 王氏

温 干 (郁生) 赵氏

八

温九厚 (普生) 王氏

温九复 (普生) 张氏

九

温仲江 (厚生) 田氏

温仲海 (厚生) 吕氏

十

温 相 (江生) 王氏

温 臣 (海生) 李氏

温 余 (海生) 李氏

温 前 (海生) 兰氏
聂氏

世

生二子

生二子

生二子

世

生一子

生一子

生一子

世

此住大宅

生二子

此住二宅

此住四宅

世

生二子

世

生一子

生四子

世

生六子

温 寿(海生) 出家为僧

温 敏(敏生) 真定府

十一世

温万才(臣生) 李氏 生二子

温万宝(臣生) 张氏 生八子

温万禄(臣生) 刘氏

温万仓(臣生) 乔氏

温万厥(臣生) 原氏

温万库(臣生) 胡氏

十二世

温朝智(财生) 张氏 生三子

温朝贵(财生) 华氏 郭氏

温朝用(宝生) 生一子

温朝钦(宝生)

温朝忠(宝生) 生二子

温朝宗(宝生)

温朝良(宝生)

温朝宽(宝生) 生四子

温朝阴(宝生) 生二子

温朝雨(宝生) 生二子

十三世

温一廉(智生) 姜氏 樊氏

温一谦(智生) 李氏 郝氏

温一熙(智生) 张氏 王氏 赵氏 侯氏

温一果(用生) 王氏

温一美 (忠生)

温一清 (忠生) 张氏

温一安 (宽生) 张氏

温一然 (宽生) 聂氏

温一再 (宽生) 张氏

温一道 (宽生) 覃氏

温一富 (阴生) 张氏

温一会 (阴生) 张氏

温一增 (雨生) 王氏

温一成 (雨生) 梁氏

十四世

温时龙 (富生) 张氏

温时凤 (富生)

温时益 (富生)

温时秋 (富生)

温时科 (会生) 兰氏

温时韦 (会生) 高氏

温时卿 (会生) 李氏

李氏 李氏 李氏 生四子

十五世

温可成 (卿生) 朱氏

温可量 (卿生) 赵氏

温可宽 (卿生)

温可信 (卿生) 刘氏

十六世

温习唐 (成生)

温习正 (成生)

温习宇(成生)

温习海(成生)住关南池头村

温明祥(信生)朱氏 生四子

十七世

(按:据《温氏宗族世谱》收藏者温进宝老先生讲,温家先世自十七世温万喜时出口外落籍察素齐,十七世以前各世系为山西原籍世系。)

温万智(祥生)吴氏 生一子少亡

温万展(祥生)赵氏 生一子少亡

温万霓(祥生)

温万喜(祥生)赵氏 生六子

十八世

温龙荣(喜生)白氏 生三子

温龙华(喜生)周氏贾氏 生三子
金氏

温龙富(喜生)赵氏 生六子

温龙贵(喜生)张氏 生二子

温龙现(喜生)刘氏 生一子

温龙耀(喜生)樊氏 生一子

十九世

温元福(荣生)张氏 生二子

温元禄(荣生)杜氏 生一子

温元祯(荣生)杨氏 生一子

温元德(华生)李氏 生一子

温元明(华生)赵氏(出嫁) 生一子

温元兴(华生)白氏 生一子

温元仁(富生)杨氏 尚氏 生一子

温元仪 (富生) 史氏 (出嫁) 生一子
 温元礼 (富生) 简氏 生二子
 温元智 (富生)
 温元信 (富生)
 温元钢 (富生) 樊氏
 温元吉 (贵生) 郭氏 生一子
 温福贵 (贵生)
 温元化 (现生) 记氏 (出嫁) 生一子
 温元旺 (耀生) 赵氏 生四子
 二十世
 温生玉 (福生) 少亡
 温生发 (福生) 郭氏 (出嫁) 生二子
 温生金 (禄生) 徐氏 生三子
 温生财 (祯生) 宋氏 (出嫁) 迁白只户
 温满满 (德生)
 温红娃 (旺生) 生二子
 温富红 (旺生) 生二子
 温玉红 (旺生) 生二子
 温四毛 (旺生) 生二子
 二十一世
 温大河 (发生)
 温二河 (发生)
 温泗海 (金生) 皇氏 张氏 尹氏 生二子
 温泗江 (金生) 生二子
 温泗湖 (金生) 生四子
 温泗水 (富细生) 生一子
 温泗河 (富细生) 生三子

温喜河(玉红生) 生一子 (魏氏) 温氏(书斋) 温永福
 温老补(玉红生) 生一子 温氏(书斋) 温子德
 温俊河(毛生) 生一子 温氏(书斋) 温永福
 温天河(毛生) 生一子 温氏(书斋) 温永福
 温和尚(红娃生) 生一子 温氏(书斋) 温永福
 温巴和(红娃生) 生二子 温氏(书斋) 温永福

二 十 二 世

温荣和(海生) 张氏 生一子 温氏(书斋) 温永福
 温荣为(海生) 汪氏 生三子 温氏(书斋) 温永福
 温荣富(江生) 生五子 温氏(书斋) 温永福
 温荣贵(江生) 霍氏 生三子 温氏(书斋) 温永福
 温荣昌(湖生) 田氏 生四子 温氏(书斋) 温永福
 温荣盛(湖生) 袁氏 生二子 温氏(书斋) 温永福
 温荣德(湖生) 冀边氏 生二子 温氏(书斋) 温永福
 温荣鳌(湖生) 安氏 生一子 温氏(书斋) 温永福
 温 亮(巴和生) 生一子 温氏(书斋) 温永福
 温拉碗(巴和生) 生二子 温氏(书斋) 温永福
 温银元(和小生) 生一子 温氏(书斋) 温永福
 温银全(存河生) 生一子 温氏(书斋) 温永福
 温银中(存河生) 生一子 温氏(书斋) 温永福
 温金中(存河生) 生一子 温氏(书斋) 温永福
 温金全(老补生) 生一子 温氏(书斋) 温永福
 温生铁(天河生) 生一子 温氏(书斋) 温永福

二 十 三 世

《温氏宗族世谱》世系排列下限至二十三世,只列世系序号,未书名讳。据收藏者温进宝老先生讲,其为二十二世温荣和

生，现年84岁，乃温家二十三世长门长子。温进宝先生已有重孙，共四世，如从十七世温万喜来察素齐落籍，前后已历十世。

从清朝乾隆初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二百年中，察素齐的发展十分缓慢。自咸、同、孝、同四个自然村联结起来后，东西街长七里四分半，南北不足一里，这就形成了察素齐市镇建设最典型的特色，象一条长带蜿蜒在大青山脚下。不规则的狭长形上分散着或稠或疏的居民住宅。同旧中国所有的村镇一样，其建设没有丝毫规划性，街道和居民住宅的发展任其自然，即使到今天，我们还可以从残留的遗迹中，依稀看到它的原始性。解放前，察素齐最繁华的街道叫大街，与后街、南街相对而言，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初始称中山街，即现在的长安街东段（从人民剧场往东至人民路）和友好街西段（从人民路到全胜街南到东侧的清真寺）。大街路面宽仅两丈余，两侧高铺窗檐矮，以致每到秋收季节，即使铁瓦车装满了“五联车”，满载庄稼从街通过，行人都要到两侧的店铺屋檐下暂避，耳边只听见车上庄稼捆子和店铺屋檐摩擦的声音。这一情况，在五十年代前期仍是如此。

解放前察素齐所形成的街巷主要有以下几条：

“大街”，解放后五十年代称中山街，即现在的长安街东段和友好街。西起人民剧场，东至紫沙沟。

“淌不浪街”，即现在的长安街西段。西起长安街西口，东至星光巷西口。

“西园街”，即现在的西园街。

“奶奶庙跟前”，包括现在的中学街南段，影院路等。

“南街”，包括现在的人民路南段及东面巷。

“后街”，包括现在的和平街、团结巷、星光巷。

“东沙河槽”，当年既是灌溉河槽，又是人行车马路，即现在的沙河路。

“西沙河槽”，情况同东沙河槽，即现在的全胜路。

“东门跟前”，即现在的东胜街。

“草纸坊巷”，即现在的跃进巷。

“同兴义巷”，即现在的中山路。

“石泉巷”，即现在的石泉巷。

“把什路”，即现在的把什路。

“营盘地儿”，又称旧营盘，即现在的中学路西口往南至西园街东口，现为博彦路中段。

“和合楼”即现在的中学路中段。

“任家巷”，在人民别墅东侧，即现在的新民巷。

“路家巷”，即现在的解放巷。

“召巷廊”，即现在的召庙巷。

“四眼井巷”，即现在的四眼井巷。

“守武巷”，又称“南巷廊”，即现在的幸福巷。

“南场儿”，又称安南巷，即现在的光德巷。

“郝家巷”，该巷名取消，现为长安街14号。

“西京巷”，即现在的胜利路。

“老爷庙巷”，又称美帝庙，即现在的人民路中段，从十字路口往北至人武部、制鞋厂以南。

“染坊巷”，即现在的通顺巷。

“大德元巷”，即现在的红旗巷。

“香坊园巷”，该巷名取消，现为友好街71号至76号。

“晋南县巷”，即现在的友谊巷。

“蒙古巷”，即现在的乌兰巷。

“东巷廊”，最早称“喇玛巷子”，后称东京巷，即现在的东风巷。

“城隍后底”，即现在的城隍街。

“渠尔沟路”，即现在的沙河中段东北方向。

“二亩地”即现在的太平街。

从以上察素齐的街巷名称来看，或以地形、地理位置命名，如“西圈街”、“南街”、“后街”、“东沙河槽”等；或以社会生产行业和字号名称命名，如“草纸坊巷”、“染坊巷”、“香坊园巷”、“同兴义巷”、“大德元巷”等；或以邻近寺庙名称命名，如“召巷”、“关帝庙巷”等；或以最早居住的籍贯、族别命名，如“宁武巷”、“晋南县巷”（实际为静乐县）、“蒙古巷”等。这些街巷名称带有原始的、历史的印记，是我们考察、分析当地人文历史的重要依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察素齐发展的历史上，比较显赫、宏大的建筑，恐怕要数寺庙了。察素齐镇内共有8座寺庙，分别为蒙古召庙、蒙古老爷庙（蒙古关帝庙）、关帝庙、东龙王庙、西龙王庙、奶奶庙、白雨庙和清真寺，其它小庙如东、西五道庙等未作统计，其中，要以蒙古召庙、蒙古老爷庙、东龙王庙、关帝庙（老爷庙）、清真寺为最早。

蒙古召庙，又称察素齐召，白塔召。该召座落于察素齐街心正南，召庙巷南口东侧。据西鸿斋先生讲，白塔召约建于清康熙年间，至今有三百年的时间。最初系云家的家庙，后来为察素齐全体蒙古人所共有。该召原建有大殿、偏殿、经楼、禅房等，并耸立着白塔一座，到五十年代保存还基本完好，“文革”中全部拆毁。在五十年代后期，该召曾作为察业社的饲养院。1980年以后，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政府拨款修缮后改建为旗文物馆，并辟为小公园供人们游憩。

蒙古老爷庙座落在长安街西段（原满不浪街）路北，为王姓蒙古人的家庙，大约建于雍正年间或乾隆初年。据居住在“满不浪”街的汉人老户讲，老人传说，“汉人未“满不浪”时就有王姓

蒙古人的先世和蒙古老爷庙，由此亦可推断，蒙古老爷庙建筑时间不晚于乾隆年间。解放后，该庙曾为察素齐公社园艺大队的办公处，后全部拆毁。

东龙王庙座落在东沙河槽东侧，东胜街西端，其址原约建于清乾隆初年，为最早从山西迁居察素齐的农户汉人阿拉图传说当时六户汉人的先世之一毛翁说即温家地县的温家虎祖从山西出外时，随身背出一个小龙王，在庙地处筑起一间草棚供奉祭祀，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后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发展，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集资建起砖木结构的龙王庙。但随着察素齐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似乎仅有一座龙王庙已不能满足当时农民的需要，又于道光八年（1828年）在现在的察素齐粮食门市处，即原“香坊园巷”（此巷名已取消）西侧，斜对四眼井（此井在路南侧，于七十年代湮废）另建起一座规模宏大的龙王庙，俗称西龙王庙。从此，有了东、西龙王庙之说。西龙王庙建起后，为了便于处理社会公益问题，察素齐农户的社会组织“青苗社”（一称“大社”）实符分社，以晋南里巷（现名友谊巷）中心为界，以东属东龙王庙大社管辖，俗称“东社”，以西属西龙王庙大社管辖称“西社”。约在清同治年间，西园子，尚不浪的农户也成立起一社，称之为“西社”，于是，原西龙王庙的“西社”则改称为“中社”，从此，察素齐有了东、中、西三个社。三社到民国七年（1918年）又合并为一社，此是后话。大约与察素齐的农户组织“青苗社”同时或稍后，察素齐凡有万家沟水份子的农户又组织了一个管理、使用水的机构叫“水神社”，又称“槽牛社”，社址也设在西龙王庙。据称“水神社”的农户买有万家沟的水共七十八份（一说八十份）。在七十八份水中，四个蒙古族水头每人一份，为世袭，西园子蒙古喇嘛家买有全河水，用期半天，其它农户买有水份子各家不一，如西园子渠家（渠生贵）有水两份，回民“福成魁”骆家有水两份，宁武海子青李家

有水四份等。凡有水份子的农户在清代都是从归化城副都统衙门购买龙票，到民国年间则在土默特总管衙门办理买票手续。渠家原买有水一份，后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买喇嘛家水一份，花银元一千元，所付水款全以国民党“平市币”在呼和浩特“平市关钱局”兑换银元支付。由此亦可知万家沟的一份水何等珍贵。“水神社”每年阴历四月初一开社分水，届时在西龙王庙戏台演戏三天，就当时来讲也十分风光热闹。

东、西龙王庙均坐北朝南，两庙均为前后院落，建有正殿、后殿、禅房、钟楼、山门，规模宏大，屋宇重重，布局合理，工艺精湛。庙内塑像，佛、道合流，造形逼真，肃穆庄重。庙中所居，或道士、或和尚、或僧、道同居，共食人间烟火。由此亦可见在中国民间外来的释教和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互相渗透、融合的状况。在东、西龙王庙山门的对面，都分别建有坐南朝北的五间大戏台。戏台高砌拱脊，抱厦飞檐，也十分壮观。东龙王庙每逢阴历七月十五，西龙王庙每逢阴历四月初一举行庙会，唱戏三至五天，届时四村八乡的村民皆来赶会，热闹非常。东龙王庙在解放初期仍有香火。记得1952年逢春夏太旱，数月无雨，刚刚参加互助组的农民仍希冀得到龙王的保佑，祭素齐的男女老少，成群结队，赤足袒臂，头戴柳枝帽，给龙王跪拜焚香祈祷。据说有一妇人可赤足走剃刀，一时传为奇谈。然后，男女农民结队到万家沟水神庙请龙王祈雨，谁知到了夜间为当时的民兵进入庙内将所有的泥胎神像砸了个粉碎，自此，东龙王庙一蹶不振，以后成为察素齐公社太平大队的办公室及库房，后拆毁。西龙王庙在解放前即改为察素齐第二小学，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为旗工全职工学校，后改建它用全部拆毁。

关帝庙，俗称老爷庙，该庙坐落在现在的人民路十字路口东侧及新华书店、二经局办公楼一线。初建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见1981年笔者采访骆文魁先生笔记），原址在察素齐清真寺处，后于

乾隆中后期，察素齐的汉民将关帝庙西迁重建，旧庙址卖与回民盖了清真寺。新建的关帝庙规模如何，不得而知，但后来肯定屡经扩建修缮，所以，在后人的眼里，关帝庙是察素齐最巍峨宏大，彩绘灿烂，庄严肃穆的庙宇了。关帝庙在五十年代前期尚保存完好，山门石条基础足有一人高，门前雄踞两头石狮，两根石旗杆高耸两边。石阶拾级跨入山门，两厢塑有持琵琶、执宝剑、绕青龙、握伞持银鼠的持国、增长、广目，多闻四大天王；入正殿则塑有金碧辉煌、栩栩如生的关羽像。庙中另建有后殿，东西禅房、钟楼等。整个寺院建筑浑然一体，加之庙中一株古槐，群鸟来巢，树荫森森，香烟缭绕，身居其中，给人一种陶然忘机的感觉。据说在五十年代后期拆除山门、正殿时，凿枘结实，间无缝隙，动用十磅大锤敲打，犹嫌费劲，可见做工之精细。每年上元节（即正月十五）是关帝庙的庙会日。届时，庙内钟磬齐鸣，香烟馥郁，善男信女络绎不绝；山门前一条大街，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商贩云集，杂艺纷呈；山门对面的南戏台上锣鼓押板，丝竹乱耳，精彩戏文少则三日，多则五天，是察素齐其它寺庙的庙会所不能比拟的。据说极盛时，不仅有呼、包二市的香客商贩，甚至有京、津地区的客商前来赶会。关帝庙由南街荣姓蒙古人（即荣生华同志的先世）掌管，每年负责管理、收香火银。关帝庙在民国年间即作为察素齐商务会、察素齐镇、乡的办公地址。解放后，也一直作为察素齐镇、公社的办公处。到1972年建新华书店时才全部拆除。

奶奶庙坐落在现察素齐乡机械厂、招待所处，人民影剧院为其原来所建的戏台旧址。该庙约建于乾隆末年或嘉庆初年，庙内奉奶奶，经笔者多方调查求教，仍不得其详，其职能与“送子娘娘”相类，多为妇人求子所设。光绪年间曾重修，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新修戏台。据说，为庆贺新戏台竣工，演“开光戏”以待四乡村民。奶奶庙在每年的阴历四月十八日为庙会日，每次庙会的会首

共有8家，届时“送会首”的仪式，即在此时改选会首，公推比较富有、可以误工误时、并有一定办事能力的人来担任。一届庙会完了由公众另推选8人为下一届庙会的会首，每年轮换一次。庙会的一切费用由察素齐全体村民负担摊派。奶奶庙每年庙会的香火钱由蒙古人李家收取。李家最后一代在庙的人称“阴阳二秃子”，是位家居道士，可以批阴阳。据说，最初奶奶庙中供奉的奶奶就是这位“阴阳二秃子”的先人请回来的。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土默特旗的蒙古人在有清一代逐步汉化的过程中，由明代信仰喇嘛教到清代也有不少人逐渐信仰了道教的。奶奶庙每年的庙会也比较隆重盛大，其规模仅次于关帝庙的庙会。届时，四周村民云集，尤以焚香求子的妇女为多。各地大小客商布满街头巷尾，据说也有馕包、京津地区的商人来设点卖货。笔者记忆所及，五十年代，关帝庙的庙会仅有过几次，后无复兴，而奶奶庙的庙会似乎每年都有，而且盛极一时。庙会时所请的戏班皆晋察名家，诸如“老花女”李桂林，“十六红”冯金全，呼市大观园的康翠玲、赵锦瑞，呼市民众剧社的任翠凤、苏玉兰，包头的“水上漂”王玉山等，都在奶奶庙四月十八的庙会上大显身手。这一庙会后来改称“城乡物资交流会”，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末。奶奶庙早在二十年代即时为察素齐第一完全小学，王有功（泽民）曾任过校长。庙中办学断断续续，直到解放后五十年代中期。后察素齐第一小学建校后迁新址，庙院遂改作它用。六十年代中期，奶奶庙戏台拆除建人民剧院，禅院改建为察素齐公社机械厂和招待所。

白雨庙亦称孙膑庙，该庙坐落在西园街西口的西门外西北处，庙中奉战国时的孙膑。因察素齐所处的地理位置，每年夏季既易得偏降雨，也易受冰雹的袭击。冰雹亦称“白雨”，民间传说秦始皇兵吞六国，其殿前保王伞（毛货）摆下的烟五雷阵为孙膑所破，故农家崇奉孙膑以避雹灾而建白雨庙。该庙约建于嘉庆年间，光绪五年

(1879年) 续修，民国十年(1921年)左右重修戏台。该庙香火不盛，五十年代尚有遗址，后在农业学大寨中拆除无遗。

察素齐清真寺又称礼拜寺，坐落于察素齐镇友好街中部路北，全胜街南口路东，与宁武巷(现幸福巷)北口相对。该寺初建于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为察素齐回民购买汉民关帝庙旧址所建。初为临街土房两间，到道光、光绪年间均有所翻修扩建，但规模不大。清宣统元年(1909年)始修砖木结构的礼拜大殿。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全体回民集资，并在鄂、包、萨、托等地募捐，新建讲堂四间，淋浴室四间。解放后，该寺保存完好，为察素齐全体回民完成宗教功课、庆祝民族节日的主要场所。“文革”中该寺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文革”结束后，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于1977年政府拨款凿深机井一眼，供周围五百余户各族群众饮永。1982年，全体回民又集资扩建礼拜大殿晋晋殿，1988年和1989年两年，回民群众集资并得政府补贴翻建男版淋浴室九间，新建清真门市部十间。该寺为典型的中国传统风格的建筑群体，殿宇高卷飞檐，雕楹彩绘，加之院内耸立一株二百余年的古榆，更增典雅古朴之趣。

。察素齐何时始有城垣，已不可考，我们现在只能从其遗址的称谓上得知原来筑有城墙。这段有古老城墙遗址的地方察素齐人一直称之为“城墙唐底”，现冠以巷名曰“城墙街”。我们现在从城墙街东口往西大约二百米以内，在居民住宅的后墙下仍可看到这段为历史风雨所蚀、苍苔斑驳的古老城墙遗址。从战乱频仍的清末王朝历史考察，这段城墙约是咸丰、同治年间的遗存。察素齐筑有完好的城墙是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当时正是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年。日寇于1937年10月侵占察素齐镇后，逐步建立日的组织，实行保甲制度，于1939年8月由各保甲抽派民主修筑城墙，按段划券，限期完工。各保甲中的青壮劳力全部出工，日以继夜，前后用了四、五个月的时间就筑成了一道周长约

25华里的城墙。城墙铺底丈余，收顶约五尺，四里相隔不远均筑有炮台。因其时间仓猝，为临战需要，整个城墙全为板筑，仅城门为砖砌。城墙筑毕，共留有五座城门：东门在现在的东胜街东口，新筑的工农路西侧，西门在现在的西园街西口里，北门在现在的中山路北口，旗医药公司、旗运输公司南一百五十米处；南门在现在的人民剧院南，二轻局宿舍附近；西南门在现在的博彦路南段、新兴路西口北二百米处。城墙四周沿线为：自东门起向北延伸，经农机厂，至朱尔沟路口的现旗法院宿舍折向西行，经酿造厂宿舍、原商业局宿舍、原监狱、旗人武部北墙、制鞋厂北墙，穿过察一中斜向西北，至西园街西口村北南折，经西门、渠家菜园地南东折，经西南门、新建物资局宿舍，二轻局宿舍楼、南门、银行旧宿舍院、召门头地、穿劳动局后院、粮食供应站第二门市部、沿原工业局，商业局，粮食局北，穿现检察院，原旗委、人委办公楼北，一直向东至旗化工厂北墙向东折向东门。这一不规则的城墙因其为板筑夯土墙，不碍风吹雨淋，又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洗礼，因而早在笔者的少年时代，即已颓壁残垣、破烂不堪了。自1958年土、萨合并、1960年土默特旗旗府迁往察素齐时起，随着城镇建设的发展，残破的城墙遂逐年拆毁，到现在所留遗迹已不多见了。根据1958年城镇规划测绘记载，察素齐全镇东西宽2600米，南北长750米，建筑占地面积为1.95平方公里。

察素齐在历史上可考的水灾笔者知道三次：一次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一次是民国八年（1919年），再一次是解放后的1958年。前两次水灾，察素齐遭受损失较大，人畜丧命，房屋倒塌，后一次水灾笔者已十多岁，稍有记忆，察素齐损失不大。但几次水灾的形成，主要是东、西二沟的洪水从村北一泻而下，直冲察素齐，分别从博彦路一线（轴承厂、察一中西侧）、察一中高墙外、经和合楼（现中学街南段）南下至奶奶庙西侧（人民剧院西的影院路）直穿铁道，经北门，同兴义巷（现中山

路)、老爷庙巷(现人民路一线)、西沙河槽(现全胜街至清真寺正门折向东)、东沙河槽,进入察素齐,因此,历史上的察素齐凡有街巷皆沟渠纵横,“天晴人行,下雨水行”,无一例外。这里特别需要记述一下东、西两条沙河槽,因为它们为察素齐镇内主要的泄洪通道,即便是解放后的五、六十年代,其仍然发挥着泄洪作用。

东沙河槽即现在的沙河路,在未成路之前人们因其泄洪作用习惯称其东沙河槽。该河槽床面较宽,解放后,迟至六十年代前期,一直为察素齐群众元宵节闹红火的活动场所,扭秧歌,舞龙灯,耍狮子,游旱船、推小车,蹬高跷,乃至放烟火、摆九曲、栽鞦韆等,都是最理想的场所。西沙河槽即现在的全胜街、清真寺前往东友好街一段。四十年代以前,西沙河槽足有三、四尺深,特别是清真寺门前,床深沙厚,是回族群众闲暇时摔跤、拿鼎、踢沙袋、练武功的好地方。自四十年代镇北筑起防洪坝后,西沙河槽的泄洪作用遂丧失,解放后被人们填平成为通衢。

察素齐镇北的防洪坝最初修筑于1940年。其位置自镇西北的西沟山口起,斜向东南方向延伸,至朱尔沟路(察素齐东北方向通往朱尔沟的路)中段,过呼包公路向南一泻而下,沿途可接纳东沟、王八窑子沟、水沟、白道子沟等山沟的洪水。日伪时期修筑的防洪坝仅为一大土堰,现在的防洪坝是解放后自1957年以来在原来的基础上多次整修而成的。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察素齐公社四个大队的社员群众动用了数百万土石方加固而成。其中,旗直机关、厂矿、学校的干部、职工和学生都多次参加过修筑防洪坝的义务劳动。防洪坝全长6500米,其中石堤4200米,防洪能力为400立方米/秒。

解放前察素齐的房屋建筑,除前面记述的几处宗教寺庙为砖木结构、宏大可观外,民居多为土坯房,即使一些地主商绅的住宅和街面上的店铺,也以土房为多,所谓的砖瓦房,屈指可数,

列其著者，如蒙古巷回民白俊的厅子房，四眼井“集义兴”（房东系西京巷周家）的厅子房，召庙巷蒙古苏嘎勒达的砖瓦房，同兴义巷（中山路）李家的砖瓦房（现为察素齐第一派出所占），后街（团结巷）温家的砖瓦房，六陈行大商号“乾元店”（现文化馆东侧）和“天亨店”（现生产资料门市部和察素齐供销社所占）的部份砖瓦房等。即使是民国年间名噪一时的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书记长、曾任绥远省财政厅、教育厅厅长的潘秀仁家中也只是土房而已。因此，察素齐的房屋建筑不仅不能与呼市的房屋建筑同日而语，就是与萨拉齐的民居相比也相形见绌，仅此一点，也足以看出察素齐历史发展的痕迹和村镇特色。

四

在察素齐开始形成村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二百多年中，百工杂业以商业历史最早、也最显著，而商业中则以六陈行（粮食加工业）和以粮食为原料的油、酒、粉、糖坊加工业最繁荣发达。约成立于乾、嘉时期的粮店如“乾元店”、“天亨店”，其经营业务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这些以粮食和粮食加工成品为经营对象的商业店铺，其共同特点：一是自己收购、加工、贩卖粮食及成品，粮食加工成品种类齐全，如白面、莜面、荞面、窝窝面、炒面、二莜面、小米、糜米、黄米等，一应俱全；二是这些店铺兼营百货，如土布、针、线等生活日用品；三是较大的商业字号，其财东和经理绝大多数是山西人，尤以晋北、晋中者居多。至于在经营粮食加工的间时兼开办油、酒、糖、粉作坊的，只是一些较大的字号，或在四种作坊中只兼营其中一种或几种。

据笔者调查了解，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察素齐较大的商业字号有：

“同聚义” 六陈行兼营杂货。位置在现人民银行储蓄所处，

中山路南口东侧；

“德茂兴” 六陈行兼营杂货。位置在福庙巷北口东侧国营“塞外春”饭庄西半部；

“复兴明” 六陈行兼营杂货。位置在“德茂兴”东侧、现长安街储蓄所西侧；

“万和成” 六陈行兼营杂货。位置在现在的曙光门市部处；

“福源成” 六陈行兼营杂货。位置在长安街路南国营照像馆处；

“万兴号” 杂货铺，位置在中山路南口西侧；现二轻局缝纫社处；

“天亨店” 六陈行兼营杂货，系察素齐历史最久的粮店之一。位置在现友好街西段路北，现在产资料门市部及察素齐供销社大院处；

“乾元店” 六陈行兼营杂货，系察素齐历史最久的粮店之一。位置在旗文化馆东侧，糖业第二门市部处；

“恒泰魁” 六陈行兼营杂货。位置在“乾元店”东侧，现在的旗食品公司旧院。

“集义兴” 六陈行兼营杂货。位置在四眼井巷北口东侧，店铺门面仍在，为南厅子房。

“万成店” 察素齐较大的留人车马客店，位置在四眼井巷北口西侧，现在孟玉金理发馆处；

“福盛常” 察素齐最大的当铺。位置在原察素齐国民小学校址，现在的察素齐第二税务所处；

“集义隆店” 粮店，位置在红旗巷口西侧，现在的委托门市部和旗邮局槽舍一带。

“蔚隆集” 六陈行兼营杂货，为察素齐回民白俊福开，位置在东沙河槽西侧，友好街东口路北。

“常隆店” 察素齐较大的留人车马客店，为皇甫家所开，

位置在东沙河槽东侧，现太平村商场处。

“毛圪旦店” 察素齐较大的留人车马客店，位置在清真寺后面，回民骆驼大院处。

除上面所列店铺外，其它百工杂业如木匠、泥瓦匠、鞋匠、白皮匠、黑皮匠、麻绳匠、铁匠（熬铁匠）、烘炉（翻砂）、银匠、铜匠基本都有，除了个别行业工种有私人小作坊外，一般均为摆摊设点，或走村串户者居多。铁匠炉户数较多，大约有五、六家，有固定的工作点；烘炉仅有一处，为山西浑源人杨家所经营。草纸坊在跃进巷，为李家所经营，在抗战前即歇业。至于染坊、香坊约在清朝末叶均歇业，现在八十岁左右的老人尚未见过。屠宰业、饮食业、皮毛业，以回旗经营者居多。察素齐的各家回回，除了个别家庭以农业为主外，其它家庭一方面种有少量土地，另一方面均兼营屠宰、饮食、皮毛，或贩卖牲畜，充当牙纪等。

到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上述各商业店铺均先后歇业。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更是百业凋零，民生艰困，虽有部份商业店铺在支撑门面，间或有新店开张营业，其境况也大非往昔可比。

三十年代末（抗日战争爆发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察素齐的商业店铺主要有：

“义生泉” 为“同兴义”改号，经营范围如前，位置仍在原处；

“公和茂” 未旅行兼营杂货，位置在长安街东段路北，现医药公司门市部处；

“恒德堂” 察素齐最大的中药铺，位置在现在的曙光门市部处；

“常中林” 察素齐唯一的酱园，位置在现在的土产门市部处；

“邮政所” 为李兴武个人经营，位置在现在的百货一门市（转角门市）的西半部；

银匠铺 为杨根子所开，位置在原老爷庙巷南口西侧，现在的百货一门市正门处；

“义和恒” 六陈行兼营杂货，位置在现在的新华书店东侧，二轻门市部处；

“本利生” 洋货庄，为刘树贵所开，位置在现在的五金门市部处；

“德隆全” 六陈行兼营杂货，俗称“二德旺盛”，位置在现在的回民食堂西侧；

“清香园” 回民饭馆，系回回陈窝利所开，位置在现在的回民食堂处；

“大德全” 六陈行兼营杂货，位置在察素齐供销社大门东侧；

“兴隆盛” 六陈行，为托克托县补还岱村人祁二兰所开，位置在现在的红旗巷口西侧；

“三义元” 干货铺，为汉人张二成厚所开，位置在现在的红旗巷口东侧；

“义和全” 六陈行，为山西宁武人张家所开，位置在现幸福巷（宁武巷）北口西侧；

豆腐坊 为宁武人张二保子所开，位置在“义和全”的西侧；

干货铺 为回民骆福洞所开，和张二保子豆腐坊相邻；

“福成魁” 察素齐最大的皮毛庄，为回民骆文魁所开，位置在现在的粮油供应站一门市对面路南处；

“德生全” 六陈行，财东为铁帽人刘如意，位置在四眼井巷北口东侧，原“集义兴”处；

“东万和成” 六陈行兼营杂货，位置在现在的汉民肉食门市部处；

“恒盛永” 察素齐较大的中药铺，为河北武安人曹家所开，位置在糖业第二门市部的东侧；

“乾元店” 六陈行兼营杂货，位置同前，于1940年倒闭歇业；

汉民饭馆， 无名号，为张三黄毛所开，位置在现在的人民路商场东侧的长安酒楼处；

“德顺园”饭馆 系呼和浩特一汉民所开，位置在现人民路商场处；

小布铺 无字号名称，为一山西忻州人所开，位置在现长安街东口南侧；

杂货铺 无字号名称，为山东人李茂东所开，位置在察素齐镇卫生院处；

“福兴明” 六陈行兼营杂货，位置同前；

“德茂兴” 经营布匹杂货，为张久久所开，位置同前；

杂货铺 无字号名称，位置在察素齐理发馆处；

面铺 无字号名称，为杜瑞所开，位置在百货二门市部的东半部；

“五福元” 回民饭馆，为回民牛金宝、马大六、金顺旺等五人所开，位置在解放巷北口东侧，百货二门市部的西半部；

干货铺 无名称，为汉人王春明所开，位置在现在的烟酒糖业门市部处；

通过以上对各商业店铺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察素齐的商业处于萧条停顿阶段。有着悠久历史和经营传统的六陈行店铺已为数不多，有的则规模很小，亦无名号，多为独家经营，显现出其衰落和不振的气象。同时，商品经营范围在发生着新的分化组合，专营程度有所增强。总之，从整体上反映了战争年代百业不振，经济疲困的状况。

五

察素齐自清雍、乾朝在土默特地区设厅以来，汉民隶归化厅辖，但一直为寄民，尚未入籍，到光绪十年（1884年）口外七厅改制，归化城同知和萨拉齐同知均改为抚民同知，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三理事通判改为抚民通判，至此，土默特地区的汉民（包括察素齐）才正式落籍。

察素齐何时设镇，现尚未见到文字资料，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一说民国十八年，1929年）。据耆老们回忆，清末民初，察素齐仅有“社”和商务会，“社”管农户，商务会管商户，“社”和商务会一直存在到新中国建立前。察素齐镇的第一任镇长为李茂春，系察素齐西园子人，家资较富，曾为塾师，察素齐在八十岁左右的老人大都授业于李茂春门下。李在任镇长时，恰逢绥远地区遭百年不遇的大旱，民国十七年（1928年），春夏滴雨未下，赤地千里，入秋落雨，为时已晚，以至颗粒未收。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仅春荒不接之时，就饿死好多人，更多的人家是鬻妻卖子，此即民谣所说的“民国十八年，绥远遭年限”。而当时任镇长的李茂春以“平糶局”的名义向镇内士农工商各户起钱，到山西买粮以拯灾救急，谁知李以灾民粮款为资本，趁机做粮食投机生意。第一次贩粮卖往它地，从中渔利，第二次贩粮途中延误，灾民盼粮急如星火，见救命粮迟迟不到，多次聚众催问李茂春，仅在此期间，好多人即饿毙殒命，其中，尤以老人儿童居多。后察素齐乡民得知李茂春借灾民粮款贩粮渔利，莫不义愤填膺，一时民怨骤起，谩骂之声不绝于耳，纷纷声言找李算帐，李茂春又急又怕，惶惶不可终日，避民众犹恐不及，又何言莅署视事，不久染病不起，日渐沉重。民间

传闻，李临终时，幻见众饿鬼相逼索命而逝。

日伪时期，察素齐改称“信益乡”，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复镇的建制。自1928年李茂春就任第一任镇长，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察素齐历任镇（乡）长为李茂春、渠生贵、路润、马志高、郭天林等人。

察素齐的蒙民在历史上属右翼三甲辖。土默特旗总管满泰曾于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一年（1931——1932年）对土默特左右两翼各佐进行调查，重新登记造册，察素齐属右翼三甲四佐，同佐内还有万家沟村、大毕克齐村、什不根村、阿令台卜村共五村。日伪统治时期，伪政府曾于1940年打乱原左右两翼各佐建制，按地域重新编制各佐，察素齐属右翼三甲四佐（廉字号），同佐还有东沟门村，共二村。

后 记

接受旗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关于“写写察素齐历史”的稿约已近一年时间，实在说，当时有些唐突冒昧。因为，自己虽为土生土长的察素齐人，又夙愿于“编写地方志”行列，但毕竟岁仅不惑，闻见甚少，对于家乡的历史变迁，风物人情，轶事掌故，间或有所得，存心留意少，而负责组稿的同志几经催促，无奈答应了人家，推之有愧，却之不恭，于是，只好硬着头皮，忙里偷闲，深入到父老乡亲中“不耻下问”，有时在街头巷尾碰着几位晒太阳的耄耋老人，也故示亲热，递烟问好，“躬身请教”——求人家多提供些“讲今比古”的材料，好交差了事。好在“皇天不负苦心人”，经过断断续续数月时间的调查访问，一番煞费苦心的联缀拾掇，似为严谨的“三易其稿”，总算写出一篇下乘的文章。现在看着这些洋洋洒洒的文字，“惨淡经营”的意思油然而生：这些仓颉编造的“糊涂鬼”大都是在别人

下班后，或饭后品茗，或观赏电视，或享天伦之乐，或摆几圈麻将，或……。而不才却独伴孤灯，“抠眼拔毛”搞这些东西，是苦是乐，是酸是甜？个中滋味难以说清，故将这篇文字名之曰《孤灯子影话春秋》，也算作是一个附庸风雅的题目。

文章即将问世，其内容或失之粗疏，或失之确凿，或失之张冠李戴，恭请众位先生父老指正、补充。在该文成篇过程中，曾蒙张富、温德小、朱金玉、白守义、吕富、周善善、马旺锁、李在德、云鸿章、郝二挠、石志芳、王留拴、荣二禄、渠淳、渠生财、渠锁锁、渠怀礼、赵二娃、刘白脸、焦勇、程根喜、梁三娃、梁存信、潘林林、温旺旺、刘拉小、皇甫德全、李存义、霍元元、曹恩旺、高存喜、郭贵成、郭文亮、李班挠、乔前成、乔满全、刘应堂、李如松、温进宝、温德福、温宝林、秦天禄、袁明玉、李巨财、云占元、荣生华、史嘉亨、李补仲、于锁锁、彭存胜、李威义、韩三秃、任安荣、任补威、安来来、安万成、和天全、周福安、张来财、兰满梁、亢招财等众位先生、父老及还有许多未能详记姓名的先生父老的大力支持帮助，不胜感激，借此机会，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作者

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五日

归绥县漫述

王道

归绥县作为行政建制已成为历史的陈迹，现在又没有与它大致相仿的行政区域，把它的一些情况讲一讲，对以后的人们不是没有必要的。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出过一部《归绥县志》，书中有关资料可资使用、研究。但抗战的八年、三年内战、解放后的四年多（1954年归绥并入土默特旗）的一些情况则鲜为人知。

这篇“漫述”尽量想就自己所掌握的资料，把归绥县的方方面面介绍给不知情者。当然，呼和浩特、土默特左旗、呼市郊区的志书及有关史料，都有涉及归绥县的东西，但它们各有侧重，而且着眼点并不在归绥县，似乎有必要单就原来的归绥县来扯一扯。

归绥县的正式设置是民国二年（1913年）。以前的情况虽不是重点，但也要谈一谈，否则弄不清来龙去脉，换句话说，归绥县在中国的土地上是历来就有的。（只不过原来不叫归绥县，所以漫述从略。

在古的归绥县

传说称远古原归绥县地的居民为荤粥，周代獫狁居之。（《史记集解·匈奴传》：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

《史记索隐》：葷粥，匈奴别名也。唐虞以上曰山戎，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玃狁，汉曰匈奴。这些记载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究竟有多大，那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课题，我们只好姑妄从之。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破林胡、楼烦，筑长城，在阴山南麓建立云中郡。云中郡范围大约是阴山以南，长城以北，西南至黄河边，东界为蛮汉山与大青山相连处。这样，原归绥县即是当时云中郡所辖。

秦始皇十三年（公元前234年），赵国的云中郡并入秦。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共设三十六郡，云中郡一仍其旧。

汉承秦制，仍设云中郡，当时属北夷县。汉末经魏、晋、南北朝到隋统一，其间三百余年，中国北方出现了一次民族大融合，先后在土默川活动的有鲜卑、柔然、突厥等民族，其中鲜卑拓跋部曾在盛乐（今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建都。原归绥县三国时在盛乐北（距盛乐四十五里）。西晋属拓跋，东晋属刘焯仁。北魏时，将敕勒族（即高车族）安置在阴山之南，因而土默川有“敕勒川”之称。南北朝云中郡领二县，曰延民，曰云阳。原归绥县在延民县北。隋初，置丰州、云州，后改州为郡，丰州为五原郡，云州为定襄郡。原归绥县是在定襄郡西北，榆林郡金河县东北。隋代土默川亦称“由道川”。

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突厥败于唐，为羁縻其部众，设云中都督府（和林格尔境）和定襄都督府（在云中都督府东）。五代十国期间，原归绥县为契丹占据，属辽西京道丰州，丰州城旧址在今呼和浩特郊区如意村西，这叫“丰州滩”。其后女贞建立金，取代了契丹的辽，仍沿用“丰州”的称谓。呼和浩特一带辽、金均派天德军节度使驻守。城东白塔（万部华严经塔）为辽代建筑。

公元1271年忽必烈统一全国，建立元朝，这里仍称丰州，属西京路，后改为大同路。

明代，丰州废，在杀虎口西北三十五里筑玉林城，在原归绥县西南筑云川城，~~以成~~。十六世纪中叶，阿拉坦（俺达）率土默特部在丰州滩驻牧，开始在这里采木架屋，出现了历史上从所未有的安定局面，山西汉民来附者颇多，建造了大量板升（房屋），今天的呼和浩特即建于这个时期，当时名为“库库和屯”。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朝廷封阿拉坦为顺义王，万历十五年（公元1586年）赐库库和屯汉名曰“归化”。其后这里的农牧业得到复兴，商业也逐步发展起来，呼和浩特为中心的广阔平原被称为“土默川”。终明之世，并未内属。

天聪八年（明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皇太极亲征察哈尔，至归化城，土默特部降清，编为左右翼两旗，设都统四人。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设归化城理事同知，隶属于山西朔平府。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在归化城东五里建筑新城，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建成，名为绥远城。同年移右卫建威将军驻绥远，改称绥远将军，辖土默特、乌、伊诸盟。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设归绥兵备道。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裁归化城通判及土默特左右翼都统、副都统，仅留副都统一人驻归化城。至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4年）归绥道下辖口外十二厅：归化城厅、和林格尔厅、托克托厅、萨拉齐厅、清水河厅、丰镇厅、宁远厅、武川厅、兴和厅、五原厅、陶林厅、东胜厅。归化为归绥道首邑。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设归绥道观察使，改厅为县，同知、通判改称知事。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裁观察使及副都统，设道署。民政两府，与山西分治，称为绥远特别行政区，以将军为行政长官。同年撤去绥远城同知于归化，称为“归绥县”。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绥远将军改称都统，改土默特

行政长官为总管。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建立绥远省，以归绥县城区为绥远省省会。这年起归绥县知事改称县长。

归绥县与土默特旗

土默特旗的历史远比归绥县古老。《明史》记载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俺答者，于小王子为从父行，据河套，雄赳，喜兵，为诸部长。”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墨尔根济农去世，阿拉坦逐渐成为右翼三部的首领，他指挥着十二土默特。由于他辈份高，年龄大，受到各分枝首领的尊重，后来他的势力扩展到东边的辽河流域，西边的青海、甘肃，而其大本营即在归化城附近。

土默特部于1634年归顺清朝后，起初为两个旗，1762年起成为一个旗，设副都统一人。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北洋政府为给将直隶、山西两省边外地区划行省打基础，设立绥远、察哈尔、热河三个特别行政区。这年将绥远将军改为都统，同时要撤销土默特旗的建置，要将土默特旗蒙古人分划给各县统辖，土默特十二家参领（即噶勒达）议决进京请愿，最后北洋政府同意保留旗制，将副都统改为总管。直到解放后1954年归绥县并入土默特旗前，归绥县、萨拉齐县、托克托县、清水河县、和林格尔县、包头县、武川县及归绥、包头两市所有蒙古人均归土默特旗管辖，而上述七县二市的汉人则归各该县市管辖，这就是所谓“旗县并存，蒙汉分治”。

土默特旗亦称土默特特别旗，其原由为何？

荣祥《大青山人自序》：“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甲戌。九月中旬，国民政府发来任命状，任命山人为归化土默特特别旗总管。特别旗者，不隶属于盟之独立旗，其政治待遇仅次于盟长而高于隶属之普通旗扎萨克。”

刘映元《贺色奋父子列传》（原稿作“评传”）一文叙述到土默特派入赴京请愿，力保旗制时说：“经武尔功奔走各方，郭象伋拟稿据理力争，‘北洋政府’终于打消了原先的意图，把土默特部改为土默特特别旗，参照察哈尔八旗和四个牧场的首长称谓，将土默特部副都统改称为土默特特别旗总管。”

《绥远通志稿》：“特别旗之由来，大略言之，不外三端：或以处境僻远，不能加入山河阻隔之别盟；或以前世地位尊贵，部落强盛，清廷不欲令与他旗联合；或以设旗稍晚，已在各盟划分之后，不便多所纷更。凡如此者，皆令特立自治，而沿为特别旗。”

上述引文告诉我们，所谓“特别旗”即不隶属于盟的旗，清代叫内属旗。这种旗在东北有伊克明安旗，在西北有阿拉善旗，在绥远则有归化城土默特旗（东北也有个土默特旗）。“特别旗”始于何时？应该说始于清代，土默特归顺皇太极后，被编为左、右两翼旗时，即是“特别旗”。说始自民国三年（1914年）土默特旗改副都统为总管时，没有什么根据。总管旗很多，察哈尔的八旗都是总管旗，全国则有五十多个，但它们并不是“特别旗”。归化土默特原来的旗首领为都统或副都统是“特别旗”，后来改为总管仍是“特别旗”。主要“特别”在它不隶属于任何一个“盟”，只不过当时没有明确“特别旗”而已。

近年来，由于工作的原因，较多地翻阅了土默特的档案资料，发现清代乃至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上半年，呈文中署“土默特旗”，下达文件写“土默特”或“归化土默特”，也有写“土默特旗”的。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8月17日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致蒙藏委员会《为土默特旗代理总管荣祥呈报清总管于七月十一日逝世关于旗署公务仍由照旧代理理由》的公函，开头便写道：“逕启者案据土默特特别旗代理总管荣祥呈称……”，同年10月5日行政院训令第五四五九号内称“前据

该会呈请派荣祥署理土默特特别旗总管一案。到院，经提出本院第一七八次会议通过。当即转呈。国民政府第二零一四号指令开“呈委。已有明令照派矣。仰即知照。并转飭遵照。此令。”等因。奉此，合行令该会知照。此令。院长汪兆铭”据此，确定土默特旗自1934年10月起始称“土默特特别旗”。

汉族在土默川上活动的历史是古老的，前已述及。

秦、西汉、盛唐各时期，由于军事上的得利，在阴山南麓建立了郡县，当然有一些汉人随军到达现在的土默川。其他朝代，这一带为少数民族为地方主体民族的活动区，但可以肯定也有少数汉人留了下来，后来融合到其他民族中了。成批的汉族人口流入土默川则是明清两代。

明嘉靖年间，阿拉坦统领的十二土默特在土默川上筑“板升”定居，有大批明王朝统治下的汉人来到这里。这些人的情况复杂，有的是逃避缉拿投奔阿拉坦的，有的是明蒙互相犯扰挟裹出塞的，有的是被诬害无法生活的。其中以白莲教及其他会道门头子为最有活动能力。这些人儒、释、道都有，农、工、商俱全。他们来到阿拉坦的“丰州滩”，受到了接纳，有的还得到重用（如赵全、丘富、李自馨等人）。他们在作战时，给阿拉坦带路、出谋划策；在建造板升时，可发挥铁匠、木匠、泥匠的技术特长，特别是在开垦田地、发展农业中作出巨大的贡献。这些人除少数是只身而外，大都带有家眷。

清代汉人移居塞外，限制比之明代要宽得多了，这是与满清统治者的利益所需相联系的。顺治年间大修喇嘛召庙需要工匠，康熙年间征讨噶尔丹期间，大批商贾及工匠随军由山西来到土默川。乾隆初，原来驻右玉的满州八旗官兵，来绥远城（即今呼和浩特新城）定居，为解决其军需及家属用粮，不得不移民垦荒（以前军需粮食是由山西驮运）。清初大量山西汉人涌入土默川的社会背景，大略如此。起初大多数农民春来秋去，叫做“雁行”，

逐渐有人定居下来，不少汉人还与当地蒙古人私订租契，以佃户形式留居。汉人多了，就得管理，于是在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在归化城设理事同知，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增置绥远城同知，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设归绥兵备道。归绥道共辖十二厅，其居民蒙属旗管，汉由厅辖，形成了蒙汉分治局面。

归化城·绥远城·归绥市

归化城即呼和浩特前身。这座城修于明万历年间，1981年呼和浩特市曾举行建城四百周年庆祝活动，这就确认归化城建成于1581年，即明神宗万历九年。此外，建城年代还有多种说法：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等。对此我们不作考证。蒙古人把这座城叫“库库和屯”，意为蓝色城市，明朝赐名归化。

关于归化城，《归绥识略》说“城周三里许，高三丈余，旧南北两门，年久坍塌，经土默特左右翼与六召喇嘛、台吉等三佐领下人，于旧城南增设外城，包东西南三面，筑墙开门，东曰承恩，西曰柔远，南曰归化，北曰建威，俱建楼其上。以旧南门为鼓楼，颜曰威固。康熙三十年工竣报部。乾隆元年重修。”《归绥县志》接下去续写道“道光、同治时相继重修，光绪间土郭多圯。民国八年，城郭及鼓楼俱拆去，今有者北门门楼”。清初，这座城仍很小，城内只有些官府，市店在城外。清末乃至民国，市容渐改变，街道衢巷逐而增多，至1949年解放前夕，市内正式居民已达近八万人（连同驻军及流动人口共约十五万人）。

原土默特高府集中在内城里。北门里街西向南为原顺义王府，后为都统丹津府第，衙署向南为议事厅，为土默特十二家参领议事的地方，人们习惯上称“总管衙门”，再往前，西为右翼都统府，即解放后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址，东为左翼都统府，即

解放后恒昌店巷小学址。

外城也不大。北门未动，一直保持到解放后。其址在今旧城公共汽车终点站南端。南门在今大十字街口。西门在九龙湾西口。东门在官园街东口。俄国人波兹德涅耶夫于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来过归化城，他写道：其他主要的呼和浩特官署和社会机关都不在城堡，而在买卖城。所说“买卖城”即今大十字以南到南茶坊一带。

道台衙门（归绥兵备道署）在西顺城街西口，扎达海河西岸。即今呼和浩特一中前院。二府衙门（归化抚民同知署，县政府）在今县府街西口处，也在扎达海河西岸。

绥远城即今呼和浩特新城的前身。它建成于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绥远旗志》：“城周围九里十三步，高二丈九尺五寸，顶阔二丈五尺，底阔四丈四尺，四门楼门二重，东门曰迎旭，南门曰承薰，西门曰阜安，北门曰镇宁。周围角楼四座，城上四面堆拨八处，每处建盖房三间。城内适中处钟楼一座，上有玉皇弥罗阁。”新城在旧城东北，相距约五里。钟楼，俗称“鼓楼”，在城内中心地带。

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总理事务五大臣议奏：“归化城盖造新城，去右卫仅二百余里，无庸添设将军，请将右卫将军移驻该城，止添副都统二员。其右卫之副都统二员，仍留原处，亦归该将军管辖。从之。”公元1739年绥远城建成后，“移右卫建威将军驻其地”。可见绥远城实际是个大兵营，因为带来了家属，随之亦有少量的铺面、商店。将军衙署现今犹存，列为内蒙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前来驻防的官兵绝大多数是满州八旗官兵，新城街道整齐，房屋建筑讲究，而且等级森严。如将军署为一百三十二间，都统署为五十四间，协领署为三十八间，佐领署为二十四间，防御署为十九间，骁骑校署十四间，笔帖式署十四间，马甲兵及步甲兵每

名两间。协领以上的住房筒瓦盖顶，顶上起脊，插飞出檐，砖木结构，门前台阶三至五级；骁骑校以上至协领，门前台阶不得超出三级；骁骑校以下至马步甲兵为土木结构，以砖“穿靴戴帽”，板瓦盖顶，骁骑校、笔帖式有低脊，马步甲兵无脊，门前台阶为一级。总之，较旧城的房舍讲究得多，所以老百姓说那里都是“砖瓦圪洞”。

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改绥远城建威将军曰绥远城将军。

辛亥革命以后，绥远地区的情况较为复杂，山西的阎锡山笼络了一批土默特青年，想藉此牢固地统治绥远，新任绥远将军张绍曾曾是北洋系军人，与阎不合，地方上的清末掌权者及有影响的人物，一般思想守旧，不欢迎革命。阎锡山的军队由包头进军归化，在道试受到土默特陆军营的狙击，前线总指挥王家驹战死，不得不绕道托克托返回山西，便是明证。张绍曾到职以后，一直为绥晋分治而与阎明争暗斗，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将绥远城同知并入归化厅，并改称归绥县。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设绥远特别行政区，实现了绥晋分治。以后，一直把今呼和浩特新旧二城合起来称为“归化城”，直至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绥远省政府成立后，才报呈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通令改归化城为归绥市。

归绥县的辖区

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至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归绥县实际管辖区域与清代归化城厅相同，分东、西、南、北四边包西一十二个村，加归化、绥远二城。到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将北乡之山后可可以力更等十八村划入武川县治，其后山后可可以力更成为武川县府所在地。归

绥县全县分四个区：

第一区

区公所设在旧城，辖二百九十九街，面积七十七平方里。东至第二区桥寨乡，西至第四区西龙王庙乡，南至第三区星星板乡，北至今火车站。

梁山街	大东街	小东街	大南街
小南街	棋盘街	马路街	半道街
圪料街	大西街	小西街	臙旦街
桥头街	长胜街	通顺街	牛桥街
草桥街	草市街	太平街	小北街
宽巷（北门外）	井儿巷	王家巷	宁武巷

剪子巷	兴隆巷	定襄巷	头道巷
二道巷	三道巷	一人巷	石头巷
隆茂巷	史家巷	文庙巷	官店巷
南楼巷	依仁巷	寿福巷	家庙巷
牛头巷	大厅巷	大南巷	大北巷
小北巷	大东巷	大西巷	楼儿巷
监墙巷	口袋巷	马号巷	周家巷
学道巷	四和巷	司马巷	鸟道巷
太管巷	杨家巷	水渠巷	冯源巷
东寺巷	头道巷（小召前）	二道巷（小召前）	宽巷子
马莲滩	吉兴里	东菜园	南菜园
小花园	南茶坊	北茶坊	西茶坊
东沙梁	西沙梁	北沙梁	民家沿
民西沿	西河沿	县府前	县府后
九龙滩	县府东	县府西	老李坟
民厅后	水磨后	西口外	孤魂滩
后沙滩	园条外	大十字	新城道

海窟街	东顺城街	西顺城街	南顺城街
大召前街	小召后街	新召前街	阳沟沿街
通顺西街	民市南街	民市北街	三官庙巷
羊冈子街	东得胜街	西得胜街	上栅子街
东马道巷	西马道街	营房道街	北门内街
北门外街	官园子街	东门内街	东门外街
十间房街	吕祖庙街	公义店街	民乐社街
新城道街	永光店街	晋阳楼巷	丁茶馆巷
三星成巷	龙门店巷	三贤庙巷	会仙楼巷
奎星楼巷	荞麦皮巷	取盛店巷	东鞋袜巷
嘛喇庙巷	财神庙巷	平康里巷	会元坊巷
小二道巷	美人里巷	义丰店巷	穿行街巷
大东园巷	杨树园巷	小东园巷	便宜斋巷
大御史巷	小御史巷	太和居巷	白公鸡巷
川行店巷	西鞋袜巷	西成店巷	熏皮房巷
万顺店巷	秉生园巷	翠花官巷	大兴泰巷
大范家巷	长和廊巷	长安店巷	小范家巷
周织屋巷	观音庙巷	奎隆永巷	兴隆永巷
剃头楼巷	议事厅巷	老磨店巷	二公馆巷
恒磨店巷	四眼井巷	万盛合巷	天裕翔巷
地亩局巷	耀义隆巷	天光号巷	礼拜寺巷
城隍庙巷	伊哈透巷	于五庙巷	龙王庙巷
太平召前	公安局前	东召黑浪	大召紫仓
大召西巷	葱茆家滩	西茆家滩	
小召东夹道	巧尔莽召巷	美人桥南街	
美人桥北街	东五土家街	西五十家街	
大召西夹道	南柴火巷街	半桥东河沿	
东五道磨街	西五道磨街	大召东夹道	

牛桥西河沿 牛桥南河沿 光龙马店巷

乃莫齐召西来道

以上旧城街巷

东街	西街	南街	北街
总局街	苏虎街	法院街	书院街
城防街	家庙街	棋杆街	仁普街
糖坊街	东厅街	马税厅街	财神庙街
建设厅街	粮饷府街	西落凤街	东落凤街
关岳庙街	法院西街	日盛茂街	聚隆昌街
老缸房街	隆世丰街	元贞永街	山神庙街
五区后巷	西夹道巷	二营小巷	庆恒泰巷
傅茶馆巷	碾子房巷	阳泉前巷	阳泉后巷
王德小巷	工艺局巷	二眼井巷	相蒙前巷
相蒙后巷	老缸房巷	庆丰泰巷	旗杆前巷
公义泉巷	辘轳把巷	法院后巷	书院前巷
银匠铺巷	福顺公巷	天启恒巷	元贞永巷
五道庙巷	大兴当巷	蒙古场巷	乾泰泉南街
乾泰泉北街	正白二甲街	北马神庙街	南马神庙街
乾泰泉后巷	乾泰泉小巷	马税厅小巷	江南馆前巷
江南馆后巷	山神庙后巷	日盛茂前巷	日盛茂后巷
大兴当后巷	南牛肉铺巷	北牛肉铺巷	柴火铺前巷
柴火铺后巷	义成泉前巷	义成泉后巷	

以上新城街巷

张家巷	小东巷	小西巷	东马路街
西马路街	南马路街	北马路街	东华棧街
新安里街	洪桥村街	甲山里街	粮棧大街
塞北关街	官房子街	三盛棧巷	邮政局巷
华安棧巷	四合店巷	崔家北院	崔家南院

电灯公司街

以上火车站附近街巷

第二区

区公所设在城东白塔镇，辖七镇九十四乡五十村，面积一万八百平方里，东至东干只（丈）胡洞界武川县，西至新城，南至三十棋窑乡界凉城县，北至那只害村界武川县。

白塔 壕沁营（包括郑家沙梁村）

哈拉沁（包括三把树村） 坝口子

买岱尔 保尔合少（包括碌油沟村）

讨不气（包括大西沟村，小潮岱村，大成窑村）

以上镇

水磨 安宁 奎树 古路

集贤（即东讨号板申） 麻什（包括公蓝太村）

南店 五路 朱海（包括朱海窑村、朱海脑包村）

羊群窑 脑包上 合昌图 三应窑

新庄子 大窑子（包括将台村、板旦石沟村）

苏木沁 郭家营 什兰岱 邵独利 桥靠儿

乔家营（包括陈家营村） 搗黑楞 宝全庄

后窑子（包括畔沟子村、东畔沟子村） 小台什

大台什（包括樊家营村） 圪老板（包括舍北崖村）

前三富 后三富 双树尔（包括周富村）

邢家营 太平庄 庄子上（包括前后水泉村）

不塔气 野马图 府新营 卯独沁

大苏计（包括小苏计村） 滕家营（包括坝堰村）

老赞窑 黑土窑 北水泉（包括西红桥村）

一家村 生盖营（包括榆树沟村）

添密尔（包括添密湾村） 三合村 如意和

焦赞坟（包括坝底村、小东沟村） 哈拉更

六棋牛 十字沟 小井沟

西河社(包括面铺窑村、郭兰窑村、杨氏窑村)

毫顺沟(包括头二三道沟村)

沙湾子(包括半山子村、大小毛忽洞村、板定营村、大小段家营村)

滩岱榆林 东把栅尔 三十坝窑 西讨号板

厂汉圈圈 头二道河 徐家沙梁 宝树圈圈

格尔此老 南讨速号 北讨速号 乌兰不浪

古楼板申 甲兰板申 黑炭板申 厂汉板申

塔布板申 姑子板申 麻花板申

羊盖板申(包括达赖营村、明松营村)

红沙口子 代州营子

• 东黄合少(包括鬲圈地村、西梁上村) 西黄合少

二十家子(包括石门子村、脑包沟村、新地沟村)

古力半乌素 东干子胡洞

西干子胡洞(包括嘛喇营村、韩家营村)

沟口嘛喇营(包括郝家营村) 东五十家子(包括石人湾村)

西五十家子 红忽吉讨号(包括东梁村、南园村)

南一间房子(包括小一间房子村) 北一间房子

前后罗家营 上石头新营(包括曹家营村、破庙子村、崔家坡村)

下石头新营 塔布突力亥 前后乃莫板申

以上乡

第三区

区公所设在城南茂林太乡,辖二镇一百二十六乡,面积八千平方里。东至第二区羊盖板申乡,西至第四区前朱堡乡,南至大路一间房子界和林格尔县,北至第一区南茶坊。

三两 沙尔沁

以上镇

西地	姚府	八拜	根堡	
甲尔旦	南双树	什不更	达赖庄	
南台什	耳林岱	前朱堡	浑津桥	
阿林潮	新营子	碾格兔	茂林太	
沙尔营	小黑河	潮忽洞	五里营	
东坝上	木塔尔	西庄尔	六俱牛	
孙得利	吉牙兔	补圪兔	七圪太	
阿力拜	店尔上	格尔兔	大图赖	
泉子上	百什户	东水泉	舍必崖	
拐喇嘛	西瓦窑	黑沙图	高庙子	
沙梁子	茂盛营	喇嘛营	牛牛营	
沂州营	贾家营	三里营	寇家营	
刘家营	姜家营	兴旺庄	宋家庄	
大有庄	张家庄	杜家庄	西王庄	
八里庄	太平庄	大刘庄	潘家庄	
赵家庄	苏家庄	天平营	前巧尔报	
后巧尔报	姑子板申	桃花板申	(即讨号板申)	
姑姑板申	色金板申	星星板申	宿泥板申	
密密板申	色青板申	沟子板申	牌楼板申	
达赖丹坝	高力丹坝	西此老气	南此老气	
中此老气	玉申斜气	南讨不气	什不哈气	
阿林章坝	西甲兰营	西板定营	南毫沁营	
前毛道营	后毛道营	东甲兰营	东板定营	
东大黑河	西大黑河	前白庙子	后白庙子	
阿歌营子	连家营子	那家营子	练家营子	
田家营子	郭家营子	范家营子	花狗营子	
冯四营子	丰厚庄	乌兰把兔	三仙庄子	

老龙不浪 东王家庄 西刘家庄 小刘家庄
 西厂克尔 东什拉乌素 西什拉乌素 东章盖营子
 南章盖营子 大小一家村 新圪力圪太
 旧圪力圪太 刘家二道河 李茂章盖营
 大路一间房子 岑胡一间房子 苏光州白庙子
 天丰永白庙子 讨尔号一间房子

以上乡

第四区

区公所设在城西毕克齐镇，辖二镇一百零三乡二十二村，面积七千七百七十平方里。东至县城西土围墙，西至西淤地界萨拉齐县，南至黑河土界托克托县，北至大青山阳元龙五合社界武川县。

毕克齐（包括北园子村、小古城村、脑包村、南园子村、牛群房子村、官保圈圪村）

察素齐

以上镇

平基 蓝黏 栽生 此老

南什轴（包括沙梁村、西南什轴村） 北什轴

讨尔号（包括耿家营村） 打尔架 台格木

什报气 和顺店 水磨上 兵州亥

常黑赖 圪速跪 北园子 麻黑赖

黑河上 大里堡 什兵地 一前响

集合社 巴独户 白只户 珠尔沟

葛家沟 黑牛沟（包括乌兰板申村） 东红岱

西红岱 后红岱 主根岱 波林岱

后朱堡 喇海流 中海流 北海流

董家营（包括出堰村） 刘家营 牛牛营

耿家营 孔家营 苏盖营 毛扣营

古城尔 把什尔（包括小把什尔村） 锁号尔
 羊羔尔（包括小羊羔村） 铁帽尔（包括沙梁子村、小铁帽尔村）
 忽赛尔（包括东棚子村） 成留尔
 帐房尔（包括鸡旦板申村） 袄太（包括马鬃村）
 鸟尔素 点尔素 那速图 西梁上
 四合社 门沁坝 红崖甲 点什气
 柳树湾 毛脑亥 苏堡盖 硝池子
 瓜房子（包括白塔尔村） 沟口子 新营子
 恼木汉 西淤地 八里庄 店尔上
 攸攸板申 刀刀板申 七炭板申 什拉门更
 东淌不浪 西淌不浪 西龙王庙 大毕斜气
 王毕斜气 雨施格气（包括小雨施格气村） 东乌素图
 西乌素图 下十里坡（包括小里堡村）
 东讨合气 西讨合气 西沟七村 上十里坡
 袄尔圪沁 二道河子 玻璃圪沁 西沙尔沁
 瓦窑圪沁（包括小瓦窑圪沁村） 忽拉格气
 杨家堡子 大小圪贲 东三间房 西三间房
 元龙五合社 上下五里坡 西一间房子
 西沟子板申 厂汉秃办亥

以上多

1937年至1945年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下半年，土默川沦陷，将归绥市改为厚和特别市，市内还设立了巴彦塔拉盟。归绥县曾一度改名巴彦县，隶属巴彦塔拉盟。后撤销了巴彦县，将原归绥县各镇乡分别划为十六个乡，以“仁、义、忠、信”排列乡名，直属厚和市管辖。这十六个乡是：

仁和多（乡公所设在桥靠）
 仁厚乡（乡公所设在坝口子）
 义文乡（乡公所设在白塔）
 义贞乡（乡公所设在陶卜齐）
 义利乡（乡公所设在美岱）
 义恒乡（乡公所设在毫沁营）
 义丰乡（乡公所设在西黄合少）
 忠良乡（乡公所设在八拜）
 忠孝乡（乡公所设在茂林太）
 忠诚乡（乡公所设在南双树）
 忠义乡（乡公所设在三两）
 信德乡（乡公所设在兵州亥）
 信安乡（乡公所设在毕克齐）
 信益乡（乡公所设在察素齐）
 信道乡（乡公所设在北什轴）
 信善乡（乡公所设在铁帽）

1937年以前是县管区乡，1937年以后是市管乡，原来是市县合一，后来是以市代县。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曾在归绥县与邻县的接壤处建立游击政权，如归绥与武川县之间、归绥县与萨拉齐之间等等，但没有形成控制全县的规模。国民党的归绥游击县更是徒具虚名，后来干脆连人也跑到后套去了。

1945下半年至1949年9月

抗战胜利后，恢复了归绥县的建置，并实行了市县分家，早在日本侵略者公开投降之前，傅作义即在后套着手布置抢占城镇、重返归绥的工作，八月间任命了省、市、县首脑人物，决定成立一个以李居义、张遐民为正副主任的归绥市政务委员会，任命

温永栋为归绥市警备司令兼归绥市市长，杨凯南为归绥县县长。这样，归绥县的第一区（即新旧二城）划为归绥市，市四周的乡镇即为归绥县（北面至大青山内二十里处的蜈蚣坝）。十六个乡的名称未变，一直沿用至1949年解放。

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起义时，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归绥县人民政府（设在城东陶卜齐），另有国民党领导的归绥县县政府。根据和平解放的有关条款，于1950年2月7日合并成立了归绥县人民政府。

这时的归绥县，处于东经 $110^{\circ}35'$ 至 112° ，北纬 $40^{\circ}31'$ 至 $41^{\circ}8'$ 之间，东邻武川、凉城二县，南接和林格尔县和清水河县，西靠萨拉齐县，北界武川县。东西约100公里，南北约60公里，总面积为6663公里。

解放后的归绥县

归绥县的归属

1949年9月19日至1950年3月21日，属归绥市领导。

1950年3月22日至1950年9月3日，属包头专区专员公署领导。

1950年9月4日至1950年11月26日，属绥中专区专员公署（包头）领导。

1950年11月27日至1952年11月16日，属萨县专区专员公署领导。

1952年11月27日，萨县专区专员公署撤销，归绥县改属集宁专区专员公署领导。

归绥县县政府所在地

1949年9月至1950年2月，仍在旧城乃莫气召。

1950年2月至1952年6月，在东尚义街一号今玉泉区教师进

修学校址。

1952年7月至1953年12月，在西茶坊新址（今福利院）

1953年12月，迁到议事厅巷与虫默特旗人民政府合署办公。

废保建政（1950年冬至1951年春）以后，归绥县共划为六个区，建立了六个区公所（区公所为县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下辖132个行政村：

第一区（区公所设在罗家营），共辖二十七个行政村：

陶卜齐	不塔气	郜独力	六碾半
毫沁营	讨思浩	奎 寨	西塔坝
小 井	保尔哈少	平丈胡洞	苦力半乌素
塔 利	哈拉沁	三道沟	五路
白 塔	罗家营	南 店	郑家沙梁
大窠子	脑 包	乔家营	三道河
羊群窠子	朝岱	黑出四	

（共一百三十三个自然村）

第二区（区公所设在美岱），共辖二十四个行政村：

太平庄	黑沙兔	辛庄子	美岱
添密湾	二十家子	西五十家子	朱亥
集贤	保素	西黄合少	东黄合少
苏木沁	后三富	前三富	格此老
南毫沁营	羊盖板	讨速号	喇嘛营
前白庙子	后白庙子	八拜	林坝

（四十九个自然村）

第三区（区公所在茂林太），共辖二十九个行政村：

茂林太	前毛道	桃花板	西黑河
什不斜气	达赖庄	讨卜气	南台什
潮忽闹	甲尔旦	老龙不浪	迭赖丹坝
牌楼板	耳林岱	浑津桥	潘庄

沙尔沁 东坝上 白庙子 一间房
什不更 西林拉乌素 阿林朝 南此老
本滩 白皮营 沙尔营 南双树 店尔上
(共一百一十三个自然村)

第四区(区公所设在攸攸板), 共辖二十个行政村:

攸攸板 乌素图 刀刀板 厂汉板
孔家营 讨号板 大台什 前巧报
后巧报 五里营 东把栅 沟子板
石头新营 坝口子 打尔架 台阁牧
讨尔号 兵州亥 什报气 袄太
(共七十九个自然村)

第五区(区公所设在毕克齐), 共辖十七个行政村:

毕克齐第一街 毕克齐第二街
毕克齐第三街 店上 水磨 大旗
下十里坡 水磨沟 三两 西厂克
主根岱 北什轴 南什轴 常合理
波林岱 红岱 黑河
(共六十四个自然村)

第六区(区公所设在察素齐), 共辖十五个行政村:

察素齐第一街 察素齐第二街 察素齐第三街
把什 西柜 毛恼亥 讨合齐
玻璃圪沁 铁帽 榆木汉 白只户
蓝鞋 朱尔沟 东沟 万家沟
(共一百六十个自然村)

1952年8月, 驻绥远省人民政府批准, 归绥县的行政区划作了重新调整, 调整后为七个区, 两个镇。

第一区(区公所设在攸攸板), 共辖十五个行政村:

石头新营子 厂汉板 孔家营 坝口子

沟子板 桃花板 讨尔号 台阁牧
兵州亥 什浪气 打尔架 刀刀板
东乌素图 五里营 攸攸板

第二区（区公所设在罗家营子），共辖十三个行政村：

白塔 鄯独利 芥家营 小井
讨思浩 塔利 黑土团 不塔气
南店 毫沁营 罗家营子 郑家沙梁
哈拉沁

第三区（区公所设在榆林子），共辖十三个行政村：

三道沟 陶卜气 潮岱 古力半乌素
二道河 干文胡洞 大窑子 榆林子
保合少 奎素 脑包 塔坝
苏木沁

第四区（区公所设在美岱），共辖十六个行政村：

后五十家子 东五十家子 西五十家子
毛不浪 朱亥 东黄合少 西黄合少
黑炭板 格此老 东讨号板 五路
添密 太平庄 辛庄子 黑沙兔
美岱

第五区（区公所设在八拜），共辖十六个行政村：

羊盖板 碾格图 林坝 什不斜气
西大黑河 巧尔报 后巧尔报 太台什
讨号板 东把栅 六俱牛 后三富
喇嘛营 白庙子 毫沁营子 八拜

第六区（区公所设在茂林太），共辖二十四个行政村：

南台什 达赖庄 南此老 什不夏
沙尔沁 东坝上 本滩 白庙子
前毛道 南双树 甲尔旦 西什拉乌素

牌楼板 老龙不浪 一间房子 沙尔营

达赖丹坝 耳林岱 阿林朝 朝忽闹

潘庄 白皮营 浑津桥 茂林太

第七区(区公所设在北什轴),共辖十八个行政村:

袄太 店上(古城) 西红岱 波林岱

主根岱 常合理 店上 西厂克

黑河上 南什轴 白只户 恼木汗

铁帽 玻璃圪沁 讨合气 蓝靴

三两 北什轴

毕克齐镇 下辖七个行政村:

毕镇第一街 毕镇第二街 毕镇第三街

十里坡 水磨 大毕克齐 水磨沟

察素齐镇 共辖九个行政村:

察镇第一街 察镇第二街 察镇第三街

朱尔沟 东沟 万家沟 把什

西柜 毛脑亥

1953年初到8月中旬初,归绥县进行了政村建乡工作,即把行政村改为乡。此次行政调整之后,全县七区二镇之下,共设一百零七个乡和9个居民委员会(乡级)。

第一区(攸攸板):辖十三个乡,七十四个自然村。这十三个乡是:

攸攸板 坝口子 讨尔号 孔家营

桃花板 小黑河 新营子 五里营

乌素图 刀刀板 台阁牧 打尔架

兵州亥

第二区(罗家营):辖十一个乡,六十六个自然村。这十一个乡是:

毫沁营 小井 郜独利 乔家营

白塔 什兰岱 南店 哈拉沁

罗家营 塔利 讨思号

第三区(榆林子): 辖十二个乡, 九十六个自然村。这十二个乡是:

榆林子 陶卜齐 二道河子 二道沟

干丈胡洞 苏木沁 古力半 保合少

大窑子 脑包 奎素 什字

第四区(美岱): 辖十二个乡, 四十六个自然村。这十二个乡是:

美岱 添密 五路 太平庄

讨速号 格此老 黑炭板 五十家

朱亥 老文窑 黄合少 二十家

第五区(八拜): 辖十四个乡, 四十八个自然村。这十四个乡是:

巧尔报 大台什 讨号板 喇嘛营

永合 三富 白庙子 西黑河

南毫沁营 什不斜气 碾格兔 羊盖板

八拜 林坝

第六区(茂林太): 辖二十一个乡, 八十五个自然村。这二十一个乡是:

茂林太 南台什 刘家营 什不更

沙尔营 牌楼板 甲尔旦 一间房子

潮忽闹 沙尔沁 潘庄 白皮营子

阿林朝 南此老 西什拉 南双树

老龙不浪 耳林岱 前毛道 东坝什

达赖丹坝

第七区(北什轴): 辖十五个乡, 七十五个自然村。这十五个乡是:

北店 忽乐齐 波林岱 常合理
三两 红岱 店什 南什轴
黑河 北什轴 白只户 恼木汉
铁帽 玻璃圪沁 蓝黏

毕克齐镇：辖五个居民委员会、三个乡，五个自然村。

南园子居民委员会 解放街居民委员会
五道街居民委员会 和平街居民委员会
水磨村居民委员会 大旗乡 水磨沟乡
十里坡乡

察素齐镇：辖四个居民委员会，六个乡，二十九个自然村。

第一居民委员会 第二居民委员会
第三居民委员会 第四居民委员会
西柜乡 把什乡 毛脑亥乡 朱尔沟乡
东沟乡 万家沟乡

为结束绥中地区“旗县并存，蒙汉分治”的局面，经过长期的酝酿，绥远省人民政府提出方案，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1954年3月3日撤销归绥县的建制，以原归绥县的地域为基础，组成新的土默特旗。至此，归绥县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成为历史的行政建制。结束旗县并有之后，区乡区划基本未变，仍为七区二镇，只作了个别乡、街的调整。

下边录出两个关于结束绥中地区旗县并存方面的文件，以便了解具体情况。

绥远省人民政府为公布结束绥中地区

旗县并存实施方案的命令

(1954年2月11日〔54〕府民建字第5号)

归包两市、乌盟政府集宁专署：

结束绥中地区旗县并存实施方案，业经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元月十五日以（54）政司字第四号批复照准。兹将实施要点令示如下，希即执行。

一、撤销归绥县的建制，以该县原辖地区为基础，并将原归绥县邻近各纯蒙村及蒙民聚居多数的村庄划归土默特旗，原属土默特旗的召河划归乌盟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磴口乡划归乌盟石拐沟矿区，其余分布在其他各市县的街、乡均归各该当地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

二、原归绥县辖境以外划归土默特旗领导的村庄如下：萨拉齐县境内的沙尔沁村（纯蒙）、云社堡村、章盖台村、杭盖村（以上三村蒙汉杂居），托县境内的塔布子村（蒙汉杂居）、乃莫板村（纯蒙）、口肯板（纯蒙），和林格尔县境内的一间房村（蒙汉杂居）、小西平村（纯汉村，因该村水利、地理等条件宜一并划归该旗）。

三、结束旗县并存后，土默特旗改由集宁专署领导，其区乡的划分，原则上仍按原县的区乡建制，一般不变，个别需要调整者，可在不超出原县辖区乡单位范围内作个别调整，调整后报省备案。

四、土默特旗原辖七个区，除召河区的编制和干部划归乌盟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外，其余六个区的干部就地分别参加当地工作，其编制撤回归省。原辖二十六个乡及三个街的干部和编制，除磴口乡划归乌盟石拐沟矿区外，均就地分别并入当地市、县、镇所辖居民委员会或乡。

五、原土默特旗所辖分散在各市县的街、乡划归各市县领导后，如当地已进行普选，应按当地蒙民居住情况，适当增加蒙民代表和政府委员会中的蒙民委员或乡长及村主任。

六、土默特旗在归绥县以外地区，应由该旗将这些地区当前各项主要工作情况和干部情况分别介绍给有关市、县、旗政府，

并进行移交。

七、各地在进行结束旗县并存工作中，必须在群众中进行民族政策的宣传，达到民族团结，以利建设。土默特旗与归绥县合并完毕后，土默特旗应将整个交接工作总结报省。

土默特旗人民政府通告

民政字第15号

为遵照执行结束绥中地区旗县并存实施方案由

兹遵照绥远省人民政府二月十一日（54）府民建字第五号命令内开：“结束绥中地区旗县并存实施方案，业经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元月十五日以（54）政司字第四号批复照准，兹将实施要点令示，希即执行……”我旗当即遵照令示要点主要精神，业经第四次联合行政会议研究，决定执行命令的具体规定如下：

一、归绥县的建制于三月三日正式撤销，原县辖地区划归土默特旗。各级行政干部仍留原地工作，由土默特旗人民政府领导。

二、土默特旗的管辖地区确定为原归绥县所辖地区的全部以及其附近萨拉齐县境内的沙尔沁村、云社堡村、章盖台村、杭盖村，托克托县境内的塔布子村、乃莫板村、口肯板村，和林格尔县境内的大路一间房子村、小西平村、班定板村、公布板申村，在此辖区内各族人民均归土默特旗人民政府统一领导。

三、土默特旗行政区划，以原归绥县的行政区划为基础，一般不变，仍为二个镇政府、七个区公所，区镇所辖的乡、街亦暂不做更动，必要时可以个别调整，原归绥县境以外划归土默特旗的村庄，沙尔沁、云社堡二村由察素齐镇人民政府领导，章盖台、杭盖、塔布子、乃莫板、口肯板等村由第七区公所领导，大路一间房子、小西平、班定板、公布板申等村由第六区公所领导。

四、土默特旗原辖之地区，除划留上述之辖外，原辖之第七区(召河)划归乌盟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领导，第六区的磴口乡划归乌盟石拐矿区领导，其余的地区和蒙民均归当地市县镇所辖的居民委员会或乡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同时土默特旗人民政府给上述有关市县派去适当数量蒙古干部。至于划归各盟市县领导地区内原有的区、乡一切组织和机构，全部撤销。

五、原旗所辖二十六个个乡的干部以及归包二市的闾组干部，均就地并入当地市县镇所辖居民委员会或乡人民政府工作，于普选后另作规定。

以上各项规定由布告之日起施行，除分别与有关各盟市县进行办理接交手续外，希我旗原辖地区内各族人民一体周知为荷。

旗 长 荣 祥

副旗长 李文精

公元一九五四年 三月 三日

顺便提几句有关呼和浩特郊区的话。呼和浩特郊区始组于1950年1月，当时只有四个近郊乡：麻花板、什拉门更、西菜园和碱滩。当时的郊区仅有十四个自然村，二万一千六百三十七人，耕地四万五千九百八十一亩，以种植蔬菜为主。1952年正式成立“归绥市郊区工作委员会”。1954年绥远和内蒙古自治区合并，撤销绥远省建制，将原绥远省所辖盟市旗县并入内蒙古自治区。这年4月25日归绥市恢复了“呼和浩特”的市名，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

1956年10月，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扩大了郊区，将土默特旗的第一区(攸攸板)的台阁牧、攸攸板、坝口子，第二区(罗家营)的罗家营、小井、陶思浩、毫沁营、不塔气，第三区(榆林子)的榆林子、保合少、什字、陶卜齐、大窑子，第五区(八拜)的巧尔报、喇嘛营等乡划归呼和浩特郊区。同年10月，成立郊区人民委员会。

1958年5月，土默特旗的美岱、朱亥、讨速号、八拜、章盖营五个乡，划归呼市郊区。1960年10月，土默特旗的桃花公社共127个自然村划归郊区。至此，呼和浩特郊区的行政区域总面积二千七百六十三平方公里，人口约二十二万四千九百零五人。

1964年5月，台阁牧、沙尔营、沙尔沁、白庙子四个公社划归土默特旗管辖，此次调整以后，呼和浩特市郊区总面积为二千零五十六平方公里，人口约一十七万三千九百五十三人。

与归绥县有关的职官

绥远城将军

绥远城将军的前身为建威将军，原驻右卫（山西右玉县），是驻防将军，只管军事，不管民事。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移驻绥远城后，改称绥远将军，成为封疆大臣。《大清会典》：

“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以绥远城将军兼管右卫、归化事务。”这一将军即是满八旗军驻防统帅，又是边疆大臣。即除了指挥绥远城驻防的八旗官兵，管理伊克昭旗、乌兰察布盟及土默特旗外，遇有战事，还有调遣宣化、大同二镇和节制沿边道厅的权力。

绥远将军为正一品（乾隆三十三年改为从一品），年俸银一百八十两，养廉费五百八十六两二钱六分，粳粟米石折银六十九两六钱六分，加其他费用，年支银一千三百七十两六钱六分。

担任绥远城将军的绝大多数是满州人，清朝中、后期任用了少数蒙古八旗及个别汉八旗人。民国建元以后这一职务由将军而都统，由都统而特别行政区主席，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起改为绥远省政府主席。

归绥道

道是清代设于省与府县之间的一级地方机关，分分守道与分

巡道两种，还有一些没有地域区划的专职道，如粮道、河道、盐法道、海关道等等。道的首脑为道员（或称道台），正四品，年俸银一百零五两。清制州县文书先申府，府申道，由道转布政司、按察司，布、按二司再呈省的最高长官总督或巡抚。

归绥道全称分巡归绥兵备道，为山西省五道之一。山西省四道：分守冀宁道（设在省城）分守雁平兵备道（设在代州）、分守河东兵备道（设在蒲州）、分巡归绥兵备道（设在归化城）。《晋政辑要》：“（归绥道）路当各部落台站要区、犄角绥远城，控制和林格尔、托克托城、昆都仑、清水河、善岱等处地方。归化、绥远二同知暨各协理笔帖式等一切刑名钱谷以及丈量开垦旗庄牧地、仓廩积贮、官兵俸饷、征解草束，运送军需，并夷汉佃田租息、修防建筑工程等项，均由该道督察核转。”

归化城厅同知

清代州县是省的基础，府介乎省与州县之间，故称为省二级。府的长官为知府，其佐治（即副手）为同知、通判。同知、通判多被派到府属境内分防，久而久之成为一个行政单位，称为厅，所以厅又称二府。归化城厅的同知在未设厅以前叫做归化城蒙古民事同知，年俸银八十两，正五品；萨、托、和、清的通判则为从五品，俸银六十两。可见这两个职位有点区别，但相差不大。它们比之内地的县级长官知县要高得多，知县为正七品，俸银四十五两。

《晋政辑要》：“（归化城同知）为各部落台站必由之路，口外夷民往来杂沓，管理蒙古民人讼词，会审旗民命盗案件，又管辖七协理厅，政务纷纭。”

清初，汉人从晋陕等省来到土默特，多系投亲靠友，属于临时居住，一般商人不带家眷，农民春来秋去。内地的地方政权组织机构（州县制度）没有推行到土默川。随着汉、回各族人口的

不断增多，人际交往繁多，民事纠纷时出，于是形成了略异于内地的道厅制度。

绥远城同知全称“绥远城粮饷理事同知”，品位及待遇同归化城同知，职责是“管理旗务，经收归化五厅丰镇、宁远地丁银米，以备八旗官兵粮饷。”

土默特旗都统、副都统、总管

土默川是阿拉坦的大本营。明蒙双方自公元十五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互相攻伐，战火延续了四十年之久。其主要原因，与其说是政治上的，勿宁说是经济上的；一方要求互市，一方不答应。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双方达成贡市协议，五年（公元1575年）明王朝封阿拉坦为顺义王，其下各首领俱封官号，有都督同知、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僉事、正千户、副千户等共六十余名。他们只接受明廷的封号和官号，不接受明廷的统治。清皇太极占有土默川之后，设左右两翼旗，旗的首长为都统，都统为从一品，掌管土默特地区军、政、刑各项事务，世袭制。左翼都统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停袭，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裁撤。右翼都统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停袭，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裁撤。以后仅留一副都统。副都统即梅林章京，正二品，俸银七十七两五钱，由满族官员充任，隶绥远将军（乾隆二十六年以前为建威将军）。

辛亥革命后，于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土默特改设总管，并分科办公。总管由绥远都统提名，总统任命，并咨送蒙藏院。总管月薪五百元，自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七月满泰任总管后改为月薪三百元。

清代归化城同知表

姓名	籍贯	到任年月	备注
多尔济	蒙古正白旗	雍正元年(1723)	这年始设, 隶朔平府
法保	蒙古镶红旗	雍正八年(1730)	
永敏	满洲正白旗	雍正八年(1730)	
永恒		雍正十三年(1735)	
永恒		乾隆元年(1736年)	再任
勒保	满洲镶红旗	乾隆三十四年(1769)	乾隆六年起隶归绥道
撤臣	满洲镶白旗	乾隆四十一年(1776)	
常明	蒙古正红旗	乾隆四十二年(1777)	
智常	满洲镶蓝旗	乾隆五十年(1785)八月	
奎英	满洲镶白旗	嘉庆元年(1796)	
文明	蒙古正红旗	道光三年(1823)	
魁英	满洲镶白旗	道光五年(1825)八月	
齐理克诺布尔		道光十一年(1831)三月	
文明		道光十二年(1832)二月	再任
阿克敦布	满洲正黄旗	道光十三(1833)三月	绥远城同知兼理
文明		道光十三年(1833)四月	再任
觉罗清勋	满洲镶黄旗	道光二十二年(1842)八月	

姓名	籍贯	到任年月	备注
魁英	满洲镶白旗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七月	再任
双奎	满洲正黄旗	道光二十六年(1846)五月	
觉罗清勋	满洲镶黄旗	道光二十六年(1847)十二月	再任
双奎	满洲正黄旗	道光二十七年(1847)五月	再任
觉罗清勋	见上	道光二十七年(1847)七月	再任
双奎	见上	道光二十七年(1847)八月	再任
觉罗清勋	见上	咸丰元年(1851)八月	再任
文明	蒙古正蓝旗	咸丰三年(1853)四月	再任
觉罗清勋	见上	咸丰三年(1853)六月	再任
庆口		咸丰三年(1853)六月	
觉罗清勋	见上	咸丰五年(1855)五月	再任,七年正月卒于任
庚械	蒙古镶红旗	咸丰七年(1857)	
珠隆阿		咸丰十年(1860)三月	
文山		咸丰十年(1861)十一月	
昌口		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	
庚威		同治二年(1863)二月	再任,十三年五月卒于任
清口		同治十三年(1874)	

姓名	籍贯	到任年月	备注
玉珊		同治十三年(1874)七月	光緒元年六月 奉于任
常桂	满洲正黄旗	光緒元年(1875)八月	
玉吉		光緒二年(1876)十月	
常桂	见上	光緒三年(1876)十月	再任
德生	汉军正黄旗	光緒五年(1880)十二月	
谦吉	满洲镶黄旗	光緒七年(1881)二月	
清口		光緒八年(1882)五月	是年改称抚民 同知、加理事銜
谦吉	见上	光緒八年(1882)八月	再任
德生	见上	光緒十年(1884)五月	再任
凤鼎		光緒十年(1884)十月	
方龙光	安徽桐城	光緒十一年(1885)八月	
德生	见上	光緒十二年(1886)九月	再任
松昌	满洲正红旗	光緒十三年(1887)八月	
炳玉	满洲镶蓝旗	光緒十四年(1888)九月	
方龙光	见上	光緒十五年(1889)九月	再任
德生	见上	光緒十六年(1890)九月	再任
平胜	满洲镶白旗	光緒十七年(1891)三月	

姓名	籍贯	到任年月	备注
张心泰	江苏江都	光绪十八年(1892)四月	
程世荣	顺天大兴	光绪十九年(1893)八月	代理
儒芳	满洲正白旗	光绪十九年(1893)八月	
方龙光	见上	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	再任
姚启瑞	安徽桐城	光绪二十一年(1895)八月	
刘鸿逵	直隶昌黎	光绪二十三年(1897)六月	
俞恒	顺天宛平	光绪二十四(1898)	
徐树璟	湖南长沙		
陈寿昌	直隶易州		
魏铨	直隶蔚州		
樊恩庆	河南密县		
盛钟襄	广东		
李崇光	陕西长安	光绪二十八年(1902)	
樊恩庆	见上	光绪三十年(1904)	再任
林以绶	福建		
张家楨	顺天武清	光绪三十二年(1906)八月	
林毓杜	四川南充	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	

姓名	籍贯	到任年月	备注
曾茂林	四川金棠	光緒三十四年(1908)四月	
樊恩庆	见上	光緒三十四年(1908)六月	再任
刘晋荣	直隶	宣统元年(1907)	
福申		宣统三年(1911)九月	
程世荣	顺天大兴	宣统三年(1911)十月	再任

归绥县历任知事、县长表

姓名	籍贯	到任年月	备注
杨瑞鹏	河北井陘	民国元年(1912)	是年改同知为知事
续思文	山西崞县	民国元年(1912)	
唐宝铎	广东中山	民国二年(1913)	
段廷珍	河南	民国二年(1913)四月	
周庆慈	山东 (广东?)	民国三年(1914)七月	
薛维庠	山东	民国四年(1915)一月	
李炳棣	天津 (安徽?)	民国五年(1916)四月	
李文鼎	甘肃西宁	民国五年(1916)八月	
周承志		民国六年(1917)二月	
徐 焘	浙江武进	民国六年(1917)六月	
陈肃瑜	浙江绍兴	民国七年(1918)二月	
刘荫培	京兆大兴	民国七年(1918)五月	
何心澄	安徽	民国九年(1920)四月	再 任
刘荫培	见 上	民国十一年(1922)三月	
冯延铸	直隶涿鹿 (宣化?)	民国十四年(1925)五月	
朱靖培	江 苏	民国十五年(1926)六月	再 任
冯延铸	见 上	民国十五年(1926)九月	

平定县志

姓名	籍贯	到任年月	备注
张锡徐	广东海南	民国十六年(1927)七月	
陈棣华	浙江绍兴	民国十六年(1927)十二月	
蔡镜波	奉天锦县	民国十七年(1928)三月	
张锡徐	广东海南	民国十七年(1928)五月	是年冬改知事为县长
郑植昌	广西桂林	民国二十一年(1932)二月	
郝熙元	山西屯留	民国二十四年(1925)二月	
杨凯南	山西乡宁	民国三十五年(1946)	抗战胜利后第一任
李忠孚	山西晋城	民国三十六年(1947)十月	
张化民	山西临汾地区	民国三十八年(1949)四月	
吴雨亭		1950年2月	解放后第一任
杨森	山西阳高	1950年4月	
高崇林		1952年1月	代理
郭启民	山西介休	1952年6月	女
李济民	河北深县	1953年6月	1954年归绥县并入土旗

归绥县的人口

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101377人

归化城内 男：16523人 女：8279人

合计：24802人

四乡 男：48586人 女：27989人 合计：76575人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242906人

男：150917人 女：91989人

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251909人

男：154927人 女：96982人

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253195人

男：158976人 女：94219人

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进行过一次人口调查，派专人组成调查组，根据调查汇报，各乡人口情况如下：

仁和乡：5720人 男：2159人 女：3570人

仁厚乡：8983人

义文乡：10698人 男：5854人 女：4844人

义贞乡：17139人

义利乡（美岱）：缺

义丰乡：5447人 男：3189人 女：2258人

义恒乡：10886人 男：6119人 女：4767人

忠良乡：10758人 男：4921人 女：4537人

忠孝乡：14095人

忠诚乡：12189人 男：7065人 女：5124人

忠义乡：11797人

信德乡：9802人

信安乡：14643人 男：8585人 女：6058人

信益乡：13291人

信道乡：8799人 男：5208人 女：3591人

信善乡：4734人 男：2435人 女：2299人

朱沟（新生乡）：211人 男：142人 女：69人

东沟（救国乡）： 缺

万家沟（泽民乡）： 缺

以上列实际数字，缺义利乡、东沟和万家沟，共为199192人，男女数分不清。如果义利乡以6000人计算，东沟、万家沟各以200人计算，则199192人加9400人，归绥县1946年全县人口为208592人。这个约数虽然不够准确，但接近真实。

1950年：190464人 户数：41141

男：111958人 女：78506人

1951年：199557人 户数：45898

男：116667人 女：82890人

1952年：209976人 户数：51688

男：124285人 女：85691人

1953年：219656人 户数：53265

男：130685人 女：88971人

归绥县的交通

归化城是归绥县交通的中心，这里的车驼路、公路、铁路通往四方，运送物资，沟通文化，传播科技，被人称为“西口”（东口是张家口）。

驼路

一、外路

亦称库伦路或归库路，归化城至蒙古库伦（乌兰巴托），全长二千八百七十里。从归化动身，过蜈蚣坝，经可可以力更、百灵庙，抵达库伦，驼行三十五、六日可达，骑马十八、九日可达。沿途水草丰富，没有大河阻隔。

二、营路

自归化城北经武川至百灵庙，再向西北，到外蒙古赛音纳颜汗，到乌里雅苏台，再到科布多，越过阿尔泰山，进入统称“西营”的新疆古城子（奇台）、红庙子（乌鲁木齐）和伊犁地区，通往中亚细亚。这条路有“前营路”“后营路”之分。前营路到乌里雅苏台，三千八百七十里；后营路到科布多，五千六百三十里。这是清代的一条主要的驼运贸易路线。

三、西营路

西营路自归化起程，经可可以力更、百灵庙，由乌拉特中公旗进入外蒙古，途经七十二站，抵达新疆古城子。此路分大西路、小西路两条路线。大西路从归化出发，经可可以力更、百灵庙、公忽洞滩，至哈拉牛敦与小西路会合，至古城子，全程五千一百九十里。小西路从归化出发，经可可以力更、百灵庙、乌兰不浪，至哈拉牛敦并入大西路，至古城子，全程六千三百六十里。小西路路程长于大西路，但沿途站口小，水草较大西路丰富，所以商旅喜欢走小西路。

四、南路

归化城至新疆古城子，全长七千里有余。此路由归化城出发，西经包头、宁夏、兰州、凉州等地，而达古城子。民国初年，外蒙古闹独立，营路、西路不通，此路虽远，且宁夏、甘肃省沿途没有好草，还得走，因为事出无奈。

车路

一、归和大道

归绥出发，南行经什拉乌素、一间房子入和林境，再经土城子、南园子、北石咀达和林格尔县城，全长一百二十里。由和林格尔东南行，过新店子、八十里家子，入杀虎口，逃出西右玉县，向南可达太原。由和林格尔西南行，经大红城北，可达清水河。和林至清河一百七十里。此路至右玉东折，经大同、张家口、怀来，到北京，也是一条古老的大道，清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6年）葱昭逢随康熙帝西征，走的便是这条路。

二、归凉丰兴大道

归绥东南行，经舍必崖、西沟门、多拉苏至凉城，计长二百八十里。凉城至兴和二百里。兴和东南行，经柴沟堡、张家口，可抵北京。这条路也很古老。

三、归托大道

归绥西南行，经浑津桥、三两、歪菜沟入托县境，再经吴坝上、小井堡达托克托，计长六十里。此路平坦，到准格尔，过马乍渡，可达山西河曲县。

四、归武百大道

归绥北行，过蜈蚣坝，由后坝至武川，共九十里。由武川西北行，分两条路：一条经三义元、召河、乌兰胡洞、乌兰不浪、而抵百灵庙；另一条经广汉此老、后麻花兔、后广汉此老、而达百灵庙。武川至百灵庙约三百六十里。

五、归萨包大道

归绥西行，经毕克齐，陶思浩，麦达桥，西老藏营，到萨拉齐，计长二百三十里。萨拉齐西行经磴口，达包头，计长七十里。此路沿途平坦，车马不绝。

六、归陶大道

归绥东行，经白塔、陶卜齐、至旗下营后，偏北行，经大同营、拐角铺、羊湾子、坝底、仁义号、抵达陶林（今察右中旗），全程二百四十里。此路到旗下营继续东行，经马盖图、平

地泉（集宁），可南下经丰镇、大同、居庸关，抵北京。从集宁亦可经兴和，从张家口入边，抵北京。

公路

归绥县的最早一条公路为归百公路归绥至蜈蚣坝段（约二十里），筑成于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全线通车，其中归绥至武川为土石路，武川至百灵庙为自然路。

归托公路由归绥途经台阁牧、太羊羔、三两、城墙口、吴坝上、关西窑，至托克托。这条路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始筑，初期由归绥、托克托两县征集沿途村民修筑，次年军队参加了整修，十月，全线筑成。全长六十里。

归绥至和林格尔的归和公路，全长一百二十里，途经大拉乌素、一间房、三铺、上土城。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由军队修筑，十月二十二日全线竣工通车。途中所经大黑河、小黑河、民丰渠、大黑河之后河，都建有简陋的桥梁。

归凉公路，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由军队修筑，次年一月通车。起自归绥，中经什拉乌素、轮沟、西沟门，至凉城。轮沟建有小桥。全长二百八十里。

归清公路，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修筑了归绥至清水河壁之破头窑段，次年续修至刘胡梁，路基极差，一直没能通车使用，仅可供牛板车通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清水河后，重新整修了归清公路，于1939年在洋河石壁处兴建了混凝土三孔平板桥。

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到三十年（公元1941年），日伪修筑了厚和至包头的公路，全石路面，称为兴蒙汽路。全长三百里，此路东可通北平，西可达新疆。筑路征用民工达七十五万之众。与此同时，还修筑了厚和经坝口子、小坝子、坝顶，至武川的山区公路。

铁路

平绥铁路陶卜齐至包头一段横贯土默川，全长三百四十里。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五月，铁道筑至归绥，十三年（公元1923年）元月，筑至包头。

平绥铁路在归绥县境内共六站：陶卜齐站西至白塔站三十里，白塔站距归绥站二十里，归绥至台阁牧站三十六里，台阁牧站至毕克齐站三十二里，毕克齐距察素齐二十八里。

此线到达大同后，南行可通往太原。山西境内的铁轨，尺寸小于其他各铁路，须换乘山西的车辆方可通行，直至全国解放后才改成全国统一铁轨。

航空

归绥市新城东门外的机场，建于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面积为四顷十亩八分，是一个军用的简易飞机场，供高级军政要员乘飞机使用。

1940年，包京间商用飞机曾开航运送客商，设包头、厚和、大同、张家口、北京五站，每周航行三次。由于票价昂贵（每人蒙疆币一百零数元），根本无人问津。

我在绥远陆军步兵 二营的经历见闻

王安仁口述 刘映元整理

土默特旗的蒙古队伍，由吹大号穿坎肩、扛“来复枪”的“巡防队”变为吹洋号、穿操衣、持德国枪的“新军”，是从成立绥远陆军第二营以后开始。这一支新军于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成立，到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秋天遣散，虽然存在了不到十年时间，却经过辛亥革命、“外蒙独立”两次重大时局变动。并且参加了阻挠阎锡山东进的“刀什尔”战役和阻挠哲布尊丹巴南下的“滂江战役”。此后除少数人解甲归田外，有的被玉禄和银海喇嘛收罗，组成了老一团和保商团的班底，有的随云亨、经权和安祥、满泰在绥远掀起过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还有一部分投奔了卢占魁和地主武装等“独立队”。我今年七十三岁，十七岁那年（一九〇八年光绪戊申）被征入绥远陆军步兵第二营当兵。参加“刀什儿”战役时，已升为四连二排二班正目，陆军第二营遣散以后，有一度在土旗煤厘局马卫队当兵。我愿意用五十多年前的一个普通士兵的经历见闻以反映这一阶段内蒙西部地区的历史真实情况。

一、“新军”训练及官兵素质

在内蒙西部成立现代化的地方部队，是贻谷于一九〇三年

(光绪29年)由钦差督办西蒙旗垦务大臣兼任了绥远城将军所推行的“新政”中的重要一项。绥远城将军有权调拨宣化、大同的练军(即巡防队)和河套新城八旗满州兵和旧城土默特旗蒙古兵等汉族队伍组成,不如归化新城八旗满州兵和旧城土默特旗蒙古兵忠实可靠,所以贻谷莅任以后,聘请英皇的学伴北洋军官胡恩光(天津回民,以后任过汉阳兵工厂厂长)担任督练。把满州兵编为“绥远陆军部队第一营”,土默特蒙古兵编为“绥远陆军部队第二营”。实行新式装备与新式训练。加上新城满州蒙古的马甲所组成的前锋营和守卫队相当于一个混成团的兵力,以做他统治西蒙的基本军队。陆军第二营因为旗饷不够,还由陆军部补勘一半京饷。

陆军第二营和陆军第一营的编制相同,每营有四个连,每连三个排,每排三个班,每班正目一名,副目一名,正兵四名,副兵八名。营部有一员督队,一员军需长,一员书记长,两名司书生,一名号目,一名匠目,七名护兵。每连有一员司务长,两名司书生,两名号兵,三名护兵。除过这些军佐和闲杂兵弁,全营的战斗兵共有504名。陆军二营由发义(字仁山)担任管带,四个连的队官,一连是城西毕克齐的富春(字华庭),二连是城南辛辛板的崇庆(字普蒙),三连是萨拉齐厅白庙子的根旺(字子荣),四连是吉雅图(毕克齐人)是一连队官富春的哥哥。他们都是行伍出身。在这以前,土旗的兵都由参领率领,因参领生活腐化已成了大烟鬼,故这支新军的军官都由士兵中选拔。玉禄,我忘记在那个连任督队,我记得他在后山土盖茂抄过北区大地主石锁的家。石家因为保护财产,买了几支快枪和抬枪,毕路齐有个六十三,借此向石家敲诈未果,跑进城里报告玉禄说石家勾通革命党私藏武器图谋不轨,玉禄转告上级并进行查抄。当玉禄查抄得胜,押着石家石子尊等两个儿子回城时,我们还在城边欢迎。玉禄以后骑的便是石家的喜鹊花马。原先的老兵那时都成了班长。如李根车,是由兵升为二连一班的正目,黄根成(即黄济川)是

都统衙门萨县城南海子上的蒙古人，他有个弟弟二板子和他在一个兵棚里吃粮。士兵都是兵册上有名字的纯蒙人，母亲或父亲只要有一方是汉人，混了进去查出来就开革。例如有个沈板小，他母亲是汉人，父亲是蒙人，在我们二营当兵被撵走，以后当了警察，人们叫他“沈老总”。

第二营是用德国造七米厘步枪装备起来的新式陆军，战斗力很强，所以土默特旗的几个知识分子为掌握这支武装力量也加入到里边担任军佐。抗战时任过土旗旗长的森额（字寿朋）由参领任了军需长，民国以后当过东胜县长的文人武尔恭担任过书记长。玉禄是否在陆军第二营当过排长？只有一点似乎给发义当过一个阶段的督队（等于副营长）。以后，还有土默特旗的所谓“嘎勒达”的一些官僚子弟，为了挣上洋刀煊耀乡里，也加入里边担任排长、司务长，统称为老爷的下级军官。领导我的四连二排排长万年子，就是牛头巷路西那家任过参领的少爷。也有哥哥当了兵弟弟也跟上去补了名字的。至于一般士兵，大都是三年拔一次的新兵。

土默特旗的新军，先是由新城武备学堂（后改为陆军学堂）毕业的学生担任教练。先是胡恩光看我们出操，给我们上讲堂的是新城厢兰旗人景云（字汉章，民国初年任满泰的副官长）和一个姓瑞的（新城留美生库其嵩之父）满州人。那时成立了“时政讲习所”，道台衙门派来了两个留过东洋的大学生姓马的和姓尤的给参领和佐领们上操上课，他们也担任正副教练官。他们起先似乎很进步，以后便在下操后和参领们吃喝玩乐。上课只讲操典不谈政治，我们没接受过革命思想教育。我们在东顺城街口北面的一个蒙古营盘驻扎，每天到小教场上两次操，每一礼拜六打一次野操，回来还在营盘中上讲堂，完全用的是德国操典。景云虽然是满族人，他在上讲堂时，只说外国的军队如何战斗力强，武器杀伤力如何猛烈。我入伍时，貽谷还担任将军，经常到小教场

检阅我们。

贻谷阅兵时，不是端坐在演武厅的正中，而是把长袍撩起蹲在地上和士兵们闲扯。有一次问我们想不想家，每月三两六钱银子兵饷够不够花，我们对着这个统治西蒙的钦差大臣怎敢袒露自己的思想，当然异口同声“不想家”、“钱够花”。他笑了笑说：“你们既有父母又有妻子怎能不想家”。并且在操场地上给我们画收支数字，算来算去，除伙食军装剩余无几。根据这一情况，他公布了两项收买军心的命令。一项是官兵每年轮流放假，暑假寒假各一次，家住萨拉齐以东的一次半个月，以西的每次一个月，一项是士兵每人月增饷银五钱银子，班长以上依次增加。我记得班长的饷银是四两五，排长八两，队官十二两。因此，官兵对贻谷的印象很好，认为他是满清的忠良。他被参卸任走时，全营整队前往东门外欢送，因他夜间就由清兵送走，只看见些仆从，没有看见本人，好多士兵都含泪回到旧城。

由于土默特旗官兵长期以来受左右两翼十二个参领的封建统治，陆军第二营的仕官在归化城有财产房舍，所以军官都愿意维持满清时代的那种环境和社会秩序，不主张变革。一般士兵多无家庭负担都很饱暖，入伍后又不受军官虐待，每月四两五钱饷银足够正当花用。我们还可以瞒过军官黑夜遮住窗户赌钱，也能到外边吸鸦片或逛娼妓，没人稽查检举。有王毕克齐的一个速吉圪图，是新军中的头目，外号韩昌（晋剧金沙滩中给辽主领兵的战将）。一九〇九年宣统皇帝登基以后，敢在大街上呼喊：“洋曲灯儿，洋旱烟，宣统坐的三二年”的民谣，二府衙门捕班人听见不查究。军队中虽有满族教练员并不考核士兵的言论行动。另外，“同盟会”对土默特旗只吸收了云亨、经权、安祥几个文人，并没有到陆军二营开展兵运工作。所以我们那时根本不知道世界潮流和国家大事，穿着新式操衣背着洋枪走在大街上感觉非常体面。把孙中山先生和太平天国的洪秀全都看成是朝廷的反叛。将军贻谷

对我们很好，认为满清皇帝对我们也不错，既吃皇粮就应替朝廷效命，加上咸丰年间土默特旗官兵跟上科尔沁旗亲王僧格林沁“打南阵”时，城南八拜村有个汉族羊倌儿，替蒙古东家顶名出征，后来升为武大人的这个影响，个别士兵还有想到战场上给皇上立功的愿望。这就是辛亥革命前夕土默特旗官兵中的思想情况。

二、刀什尔战役经过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太原于是年阴历九月光复，驻在归化城的山西外八旗巡防队于九月下旬起义。“小状元”攻打丰镇是十月下旬，阎锡山北上进入包头已经是十一月中旬。巡防队由统领周维藩率领正式起义那天黑夜，曾由营坊派出队伍企图焚烧北门外“清真大寺”，好造成火光冲天的声势占领旧城包围新城。正在浇上煤油点火的时候，被我们陆军二营查街的士兵发现，以为是土匪抢掠便朝他们开了几枪。

因为该部知道我们装备精良、官兵团结，以为已经有了准备，便撤回营坊连夜撤出城外，并且由于意见分歧，分开两部分各找出路。一路由周维藩率领绕道经兴和大同到晋西北跟随了阎锡山；一路由曹富章率领经武川到了包头，遭到樊恩庆的集体屠杀。我们陆军二营的兵无意之间冲散了巡防队的革命行动，使得他们变更原部署，决定放弃归绥。归绥的好多绅商市民都认为是陆军二营保住了城池。当天回民派出阿訇乡老敲锣打鼓地给发义官带送了锦旗和万民伞，把全营官兵弄得越发以归绥的保卫者自居，更不把革命军放在眼里，所以后来接到出发包萨的命令都想大显身手，并不因为开赴前线打仗而恐惧。

周维藩巡防队的起义，虽然没在归绥造成大的影响，但革命军在全国各地到处动手，消息一天比一天紧张。巡防队撤离以后，归绥城防非常空虚，经道台衙门师爷俞家骥（字轮师，浙江

人，以后给阎锡山当了秘书）向道台戚麟建议叫将军坤岫起用从前外八旗巡防队总领湘军出身的湖南湘乡人谭涌发指挥军队。谭遂偕同胡泰才和李德功（字健侯，山东人，曾任贻谷的亲军马队哨官）等就任归绥营务翼长。指挥所设于归绥旧城西顺城街现第四中学院内。并收罗起二百多旧部成立了一个“防营马队”，由胡泰才担任队官，李德功也编制了一百多步兵。我们陆军第二营和满州八旗的陆军第一营以及土默特旗福坦带的“守卫队”和新成立的炮队都归谭涌发指挥。

阎锡山的军队进入包头，先是谭涌发派胡泰才的防营马队和陆军第一营的一部分步兵和新城的炮队去防守萨拉齐县城。因为胡泰才的步兵不给硬打，并且他的部下同情革命，故将萨拉齐城弃守，炮队由北山把两门炮丢到水洞沟内，被老乡缴给阎锡山的军队。他们纷纷退回归绥。谭涌发这才亲自指挥。以我们陆军第二营为主力，与福坦的守备队和萨拉齐退下的残兵败卒去察素齐以西防阻阎锡山的军队继续向东推进，以保卫归绥新旧城。

陆军二营是腊月初三从归绥出发，出发以前，从“学艺所”（劳改单位）把被押的三个射击技术精良的头目放出，并许那个胆大的外号“韩昌”的速吉圪图担任了二连的司务长，以示鼓励士气。队伍临走时，每人给发了一两银子的津贴。我们当天在毕克齐宿营，初四住到把什儿附近的古城，初五到刀什儿以东二十里停止前进，队伍在好几个村庄驻扎。陆军二营驻了忽拉格气、妥妥岱、黑舍图和祝拉庆四个村庄。福坦的“守备队”三百多人驻到马群、太阳和云社堡。谭涌发的骑兵和李德功的步兵、新城满族的步炮兵则驻在达尔计一带。因为指挥官们不敢冒险轻进，我们在忽拉格气一共呆了三天，初七黄昏时才接到命令，全集中在刀什儿村内布防。

陆军第二营因初次上火线作战，不象打野操时那样整齐，进了刀什儿村非常混乱，安排好以后已经半夜。除了军官和班长们

和衣而卧，士兵尽脱了衣裳睡觉。当我们进了刀什儿的时候，阎锡山的军队也到了刀什儿西南的讨思浩村，可是我们没有提高警惕，想不到他们会在次日拂晓发起攻击，如果不是阴历腊月初八，我们可能全部被包围解决。

土默特旗各村农民都有在腊月初八黎明吃“腊八粥”的习俗，讲究在日出以前就要把粥吃完，所以老乡们很早就起来做饭。当我们全部睡熟，哨兵打盹的时候，起来担水的老乡发现村南尽是移动的黑影并且踩着雪地吱吱发响，便把我们叫醒才知道敌人已经摸来，好多士兵行入阵地时，都是赤着脚伏倒射击。打了一个多钟头，战况稍微稳定才替换着回去穿鞋袜。

阎锡山的军队都是从萨县放出的犯人，由胖挠子（以后升为晋军师长的张永胜）指挥，攻击得相当勇猛。亏了我们用的是德国造步枪，否则会全被突入阵地。打了半前晌，阎的指挥官王统带见打不下刀什儿村，便骑着一匹黑马上来督战，他被我们以乱枪击毙以后，战况才缓和下来。但是以后还发动了好几次攻击，不过劲头不如先前猛烈。这时我们第四连还出了一个岔子，就是有几个兵鼓动号兵斗楞（水磨沟人）吹上刺刀号和冲锋号，二三十名士兵一听到号音便跳出阵地，被发义官带骂了一顿，随后从阎锡山的死兵手中摸了几枝破枪跑回村内。

我们陆军二营由拂晓支持到晌午，除了谭涌发在达儿架观望，驻在云社堡福坦带的部队也不出来支援，因为福坦和法义闹意见，守卫队怕陆军二营打了胜仗，握着手枪不许士兵出击，因为“守卫队”士兵中有父子弟兄在二营当兵，后来都不听他的命令向刀什儿前进。晌午过了，阎锡山的部队倾向东开枪，我们的压力才逐渐减轻。接着谭涌发经满族官兵几次请求由下达赖朝着阎锡山的军队射了两炮，阎军于太阳落山时朝西南退走。

陆军第二营在这次战斗中共阵亡士兵二人，一个是城东北森盖营子的多寿，一个是克连村的良保，他们两个都是独生子。战

斗停止以后，我们忙于吃饭，没顾上出去清扫战场，只吃了半顿即接到命令，连夜行军，于天黑以后回到忽拉格气一带，第二天退回察素齐。可见谭涌发非常害怕阎锡山的军队，所以没有跟踪追击。

三、开驻托县萨县的见闻

我们在察素齐驻了两天，当地商会和地主们宰猪杀羊慰劳。两个阵亡的士兵用最好的棺木装殓，停在关帝庙的戏台上举行了隆重的悼念。发义抱着棺材大哭一顿。第二天得阎锡山部已在我们撤离刀什儿那天，由陶思号向托县方向撤退。谭涌发到了这个时候，才下令叫我们出发追击。我们由察素齐向西进发，下午进入达尔计附近，谭涌发派出的便衣说是前边发现了敌人，同时跟在我们后边的李德功的队伍哗变，朝我们射出毛瑟枪子弹。我们因为摸不清情况，被谣言枪声弄得晕头转向，以为陷入腹背受敌的包围之中。望见谭带的满族兵向北山乱跑，李德功、胡泰才的骑兵朝西南走，于是我们全营在达尔计附近野滩上大哗，官长叫谁谁也不听，蒙古兵和满族兵混在一起爬山，我在慌乱中拾起一支令箭，足见当时如何混乱。满州的步兵嫌子弹累赘，炮兵把大炮扔掉还指着口袋说，“我这里装着炮栓”由于群龙无首，只好往归绥乱跑，路过察素齐时，黑了大街，快到毕克齐时，有些兵到喇嘛洞躲藏起来。我两天跑了二百多里路，一直跑回归绥。要不是第一镇从东边开了过来，归绥的秩序，也要被我们这些三三两两从达尔计跑回的溃军搞成一塌糊涂。

停了四五天以后，各部分在归绥集合起来。陆军二营又奉到命令向托县开拔，第一镇不敢冒进，叫我们担任前锋。头一天宿营到“三两儿村”，第二天到了五十家子村，在五十家村捉住阎锡山的一个兵，他本来拉了老百姓的一头毛驴已算走运，可是嫌毛

驴不快又返回来拉马，被我们抓住枪决。我们在五十家子打听见阎锡山要回山西才进入托县。当然要清查户口，镇压一下地方。从一个破鞋家里搜出一个“革命党”，这破鞋的丈夫叫四小子，以窝藏匪类的罪名被我们连那个“革命党”一齐在郊外砍头。第一镇开到托县，我们出发经过毛岱又去“收复”萨县。进了萨县，在西门外枪毙了一个革命党，这个人姓郝。

我在萨县驻防期间，还听过儿童们描绘革命党的一段歌谣，说的是“长毛子眼目宽，五台搬了个阎锡山，走大路，他不敢，走了沿河一道湾。走神池，过五寨，莫要叫们（我音）五台受了害。”长毛子官名刘继汉，原来是萨县土合气村人，流落包头搞赌博，被大同的李德懋吸收到同盟会里，王鸿文、郭鸿林死后，他在阎锡山进包头时曾组织起一帮游民。阎锡山给编了一个连长并和萨县的赌博汉胖挠子参加过“刀什儿”战役，在地方上比较出头露面，所以老百姓认为阎锡山是长毛子搬来的，这当然是一种肤浅看法，不过“走大路，他不敢……”等语却道破了阎锡山的心理状态。

过了一九一二年春节，就进入民国元年。这时，我们仍在萨县城里驻防，听说宣统皇帝已经退位，五区善岱村的安祥就把剪发队带进旧城。街道上都站着安祥的人，碰见行人当时就把辫子剪掉，弄得路断人行，广大群众反对。因为萨县有些蒙人进城被剪了辫子，跑到我们部队里边向亲人们哭诉，兵们便出去干涉，陆军第二营几乎和剪发队发生冲突。

我们当时没有接到剪辫命令，思想上不想剪掉，除了剃成光头象和尚一样难看，主要是民国还没有站稳，害怕满清皇帝再次登基，看见秃脑袋以“革命党”治罪，一般老百姓更有顾虑。所以直到1925年前后，土默特旗的不少蒙人汉人，虽然剪了辫子并没剃掉头发，在后脑勺上还留着各种名叫油巴盖的长毛。以备必要时接假辫子，还有一些顽固老汉剪了长辫又留下小辫，作为

留恋清朝的标志。

我们陆军第二营在1923年夏天“滂江战役”结束后，才剪了辫子留下半截头发的很多，因此兵们给编出一段顺口溜说是“人家剃头他也爱，怕死留下个油巴盖”。安祥在萨县剪辫子不只汉族人骂他，蒙古人更把他恨之人骨，说是蒙人自古就留有长辫，汉人是降了清朝才留起。他本来要借重陆军第二营推行工作，可是受到陆军二营士兵的干涉，后来决定蒙人可以木剪，汉人非剪不行。因为很难和汉人分辨，所以又想出一个区别的办法，就是秘密告诉蒙人，把皮袄上的扣子去掉，一律换成带子，凡是碰上皮袄上有带子的就不剪，不料被一回民识破，也给去掉扣子系上带子。这时归绥开来“红坎肩兵”，由于在小西街看戏和回民中的青年打架，于是和归绥的“清真民团”发生了巷战。陆军二营接到十万火急的命令调回去弹压地面，离开萨县以后，不知安祥的剪辫工作怎样结束。

四、所谓“打滂江”

一九一三年秋，外蒙军队南下的时候，新任绥远将军张绍曾对于土默特新军很不放心，所以没有把陆军二营开赴狼山百灵庙和滂江前线，而是归他指挥着的孟统领（效曾）指挥。孟统领除了指挥土默特的一营步兵，还指挥着由满清外八旗巡防队改编的一营步兵。该营营长就是辛亥年樊恩庆在包头商务会马号院杀害革命党人的那个哨官谢若霖。我们步兵在城里布防，谢营的骑兵都在城外。其实滂江离陶林很远，但那时的陶林已成了兵临城下的样子，人心非常恐慌，由归绥城郊各村抓来的民车，车信大部份扔下牲畜逃跑，所以又从陶林街上捉了些河北逃荒来的农民赶车。他们因为没有饭吃并且想跟上军队去发洋财，所以忘了害怕。谢营负责保护陶林经过四道沟前往滂江的补给路线。他们的

纪律非常糟糕，特别是进入草地以后把内蒙牧民也视为敌人，随便拆毁帐幕，宰杀牛羊，引起蒙汉人民的普遍反对。我在陶林街上，曾见骑兵从外归来拿着许多牧民的东西偷卖给贪便宜的老乡。这是陶林城外的情况。

我们陆军二营的士兵，因为有城墙可以据守，军心比较稳定，可是当官的因受各参领的鼓动却表现出两面派的做法。陆军二营军官完全听土旗12个参领的。我们开拔时，参领还派了“时政讲习所”的几个人和我们相随在一起做“监军”工作。我的班里有城东古楼村的一个当兵的名叫阿勒滕，跟参领森额同在土旗“启运书院”念过书，通晓蒙文蒙语，写出的字好象刀刻一样整齐，因为嗜酒如命，喝醉以后就跟人打架，所以没有升上一官半职。

开到陶林以后，突然被二连的司务长，那个外号“韩昌”的速吉圪图叫走，再没回到班里。据兵们悄悄传说，速吉圪图当了“共和国大臣”（土旗代表）叫阿拉滕去任师爷。另外还有巴什儿村的纳木凯、城西章盖村的黑徒以及城南的一个兵共五个人跟外蒙军队“讲和”。他们走时都穿着清朝武官的官服。黄马褂上镶着黑大绒边，紫大绒圆心，缝有黑大绒字，是由归绥定做而来。不料由陶林秘密出去，经过平地泉就被谢若霖的骑兵碰见打死，尸体一直没有找见。当年秋天，我们被张绍曾解决了，二连连长崇庆和我回到辛辛板村。隔了很长时间，我对此事非常怀疑。我问他，速吉圪图为什么被谢若霖营打死了，崇庆对我说：“韩昌平日不为人，他们一走咱们里边就有人报告了孟统领，孟叫谢若霖派兵等在路口上把他们打死。”所以我们从陶林开回归绥被张绍曾解决，与此事有重大关系。

陆军第二营在“洮江战役”期间，只是第四连的第三排在陶林东边四道沟的孤山地方打过一次仗。孟统领怕外蒙军队迂回到背后切断补给线，叫我们派一排步兵押送子弹、军饷、给养。本来

轮上我们第二排担任此项勤务，我们排长万年子是参领的儿子，他恐怕途中和敌人遭遇，所以推辞不去，连长吉雅图也没有办法，只好派连祥的第三班前去。他们在路上拖拖沓沓走了三天，第四天被一夥喇嘛兵打了个狼狼大败，一天就跑回陶林县城。第三排除过被打死桃花板村的一个三小和森盖营子的一个兵，还有外号“二韩昌”的福虎（萨县水洞沟人）和圪连圪台的二毛被俘虏。福虎身躯魁伟，并且能说蒙语，所以没有象同时被俘的骑兵以及车工遭到惨杀，二毛也沾了光。这些喇嘛兵，说他们心里不太干净，叫他们把衣裳脱光洗澡，念完经文拢火，让他们从火上跳过，才供给饮食，派去喂马，这些宗教仪式当然笼络不住土默特旗的蒙古士兵，跟上转了几天，看出空隙都跑回陶林。

据三排跑回的兵们和我说，他们从陶林出发是步兵押车，骑兵哨探，第四天由四道沟出发走到孤山附近，听见骑兵在前边打开，没等骑兵退下，就听见了对面山上的枪声，看见好些穿红色皮袍袒露一条左臂的人提着枪朝他们冲来。他们开枪射击，因为心慌手抖，一个也没有射倒，以为这些喇嘛兵有佛爷保佑，都抖成一团，叫车工扭回车撤退。因为抓来的河北省难民不会赶车，把车翻倒，经过退下的骑兵一冲，越发不可收拾。陆军二营的兵因为陶林天寒，出发时都换上棉衣，笨的不能快步奔跑，想叫本地人赶的车停住，他们好坐在车上脱离险境。后车把前车扔下的一箱子饷银碾乱顾不得往起捡。当兵的想乘车，车工不肯停，让当兵的开枪打死很多。三排被打死的两个兵和被俘的两个兵，都是在脱棉裤的时候，被敌击毙捕捉。由于人忙无智，解了裤带，不解腿带，不能很快脱下，可见当时慌乱到如何地步。他们连夜逃回陶林，尽把枪支丢掉，谈起这些喇嘛兵如同从天降下。因为这支外蒙军是扰袭，如果摸清城里风声鹤唳的情况，继续追击，可以毫不费力地拿下陶林城。我们看见这般情况，都无心掘守，只要孟统领说一句话，会马上放弃陶林。

后来归绥大召里设的“营务执法处”派出执法官张云年，据说就是后来任察哈尔都统的张之江，他到了陶林把骑兵营长谢若霖枪毙，军心才稍有稳定。在四连三排退下的那天夜晚，三连的司务长贵安（乳名小根顺，毕克齐附近沟子板人）看见陶林不保，带上饷银开了小差。后来孟统领叫我们开在归绥陶林中甸驻防，营部设于大滩，五连驻拐角铺，我们连驻旗下营。这时前方已经缓和，贵安从归绥回到部队，在我们那里吃了一顿饭，从我们那里去了拐角铺，被连长根旺扣捕。他平日跟根旺关系不太好，根旺便把他捆到大滩交给发义处理，说他临阵携款潜逃，请求依法治罪。发义不得不按军律枪决于大滩。

五、“陆军二营”遣散经过

“陆军二营”被北洋军阀遣散，主要受“骑兵营”（守备队）投奔外蒙的影响。玉禄所以率部响应哲布尊丹巴倡导的蒙古独立号召，据我当时听人们传说，还有一个不得不出走的原因。玉禄的军队那时在大青山后边的岔岔驻防，岔岔位于归绥往新疆古城子的驼运要道，部队除了防备土匪，还负责稽查商旅。清末民初时绥远禁种鸦片，可是新疆甘肃仍然种植，西土（鸦片）都私藏骆驼身上往内地运输，玉禄的兵有一次从驼鞍中查出大量烟土未缴上级，私作处理，也未孝敬营长福坦。福坦怀恨在心，向驻在归化城里太平召前的朱司令（按：即阻防外蒙军进犯的朱辟藻）作了报告并给玉禄说了不少坏话，朱司令要扣捕玉禄，玉禄感到在绥远不好存留，便拉所部到了外蒙。玉禄拉部队的举动对我们没有大的波动，只是认为他太冒险。我们士兵不愿离开家乡，对哲布尊丹巴并不拥护，对袁世凯也不仇恨，只是听候大局决定以后动向。可是绥远城将军张绍曾不这样想，他过高地估计了土默特陆军第二营，认为有五百多蒙古兵驻在旧城是他的心腹之

患，因此决心除掉。

张绍曾事先用旧枪换新枪的借口从我们手中把武器弄走。遣散的时间在1913年秋天×日三点以后。在营盘中吃过午饭，说是到小教场去听讲话。我们整队徒手站到演武厅前，有一个将军衙门的军官，还带着几个拉马的护兵，站在那里，叫我们跪下以后，他宣布了遣散命令。宣读命令完毕，上马朝东跪跑。我们纷纷站起，一看四周都伏下八十团端着枪上刺刀的兵。我们只好三三两两的离开教场。这时营盘也被八十团占了。我们连行李也不敢去取，本地无家的就住了小店。军官们为了避嫌，不敢照料我们。旧社会当过兵的都不愿种地。二连连长和我都是城附近辛辛板人，他从前和号目朱英（后成为归绥市的士绅）学过吹号。他赋闲生活无着。后来将军衙门改成都统署成立起一个混成营（卫队）他去当了一个阶段的号兵。之后，召河的银海喇嘛组织起保商团，朱英给保商团当了军需主任，从庆也给保商团担任了连长。我们的营长发义，曾经安祥介绍在萨县水洞沟门李雨山成立的守备队中干过一个阶段的闲散差事。李雨山、安祥、满泰在蔡成勋任都统时发动过一次起义。起义失败后，发义再未出世。一连连长富春和他的弟弟四连连长吉雅图，因家中有钱便在归化城当了寓公。三连连长根旺，从老一团下来又参加了百灵庙蒙政会的保安队，他未跟云继先起义。傅作义攻打百灵庙时，他突围退到大庙，不知因何缘故被日本人杀害。一般士兵因一片诚心为北洋军阀服务，却遭到如此无情对待，憋着一股怨气，除了部分投奔玉禄（从外蒙归来了）而外，不少都当了独立队。另一部分人象朱老大等给归绥县汉族地主在茂林太组织了自卫团队。我回家后，他们捎话叫我参加自卫团队，使我不能安心种田，终于参加了土旗煤厘局的马巡队，又扛起枪杆。

马巡队和蔡成勋的马德润营部都在萨县的德全店驻扎，那时安祥任萨县善岱第五区区长，1917（民国六年）卢占魁的主力去

了陕西以后，没有跟他去的留在土默川。马德润的骑兵由于安祥的骑兵协助，土匪便不敢在前山活动，有的去了后山或过了河西，马德润和安祥私人交处很好，有的说他们还是磕头拜。以后从山西来了一个乔子和，（续桐溪派来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他联合安祥、水涧沟门的李雨山、土默特旗的满泰在萨县打起反对北洋军阀的旗号。他们被马德润的骑兵包围在万家沟里，满泰跑脱了，李雨山阵亡了，最后安祥被围在一间房里，坚决不交枪，马德润在外边跪下保证绝不杀害，他也不肯投降，最后便点火烧死。我们没看到安祥和李雨山的尸体，却在察素齐一家商号中看见被俘虏的乔子和。乔子和很有煽动力，他来绥远不久，便燃起反对北洋军阀的烈火。我和马德润的兵们很惯熟，由于敬佩这个神秘人物，由他们领进去看了一眼。此人说话是太原口音，留着很长的胡子，和一九二八年（民国17年）被奉军都统汲金春枪毙的刘会文差不多。马德润对他很客气，没有用麻绳捆绑，给他披了一件棉大氅，在地上来回走动，允许他看书写信，他的表情有满不在乎的样子。真是一条英雄好汉。我从察素齐回到萨县不久，听说他在察素齐被处决了。

我在地方军队里干了这些年，看见这么多弟兄被枪杀的事，心中很不是滋味，觉得扛枪杆子不是好营生，不久便决心脱下军衣回家务农，以后便死心塌地地扛起锄头。现在我已七十三岁，和我过去一块扛枪的活到我这个年令的已经很少有了。我经过的动乱很多很多，今天能看到兴旺繁荣、国泰民安的新中国感慨是很多的，只有受过苦的才懂得甜是什么味道，我从心底里爱这个新的社会。

1964年整理

群众文化工作的点滴忆述

荣世杰

一九五二年，我从部队转业后，经过学习，派赴土默特旗文化馆工作。

当时的土默特旗文化馆（先称人民文化馆，一九五五年改称文化馆）在呼市文庙街，馆址是三间旧药铺，人员只有四个人，设备只有三百多册书，三五份报纸杂志，一架幻灯机和一盘象棋，条件很不好。活动单调而且也少，每天开馆只有几个老人和课间的一些土小的学生来馆看看报纸，下下象棋。主要业务是抽出一名馆员，辅导“扫盲”教员开展夜间业余识字班，每天晚上倒也热热闹闹。可是，对一个刚从部队到地方工作的我来说，一切都很生疏，工作无从着手，办事力不从心，和部队相比，只感觉这地方清闲舒适。

经过学习和馆长的指导以及工作实践，才渐渐懂得文化馆的工作，并不是那么简单，那么清闲，而是十分重要的工作。那时党中央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革命的经验，认为，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定会出现一个文化高潮。因此，中央文化部门指示各级文化部门，必须做好迎接这一高潮的思想和工作准备。并明确规定了文化馆的四项工作任务，一、时事政策的宣传；二、科学普及；三、辅导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四、开展识字运动。完成这四项工作任务，主要是利用各种形式的文艺、美术以及各种宣传工具，同时还强调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必须做到

“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如何认识和贯彻执行党对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馆长领导我们一边学习研究讨论，大家出主意，想办法，提措施，一边积极开展工作，摸索经验。

可巧，当年冬天下来两大任务，一是要各旗县文化馆，组织大型文艺宣传队，配合土改复查运动。一是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开展中苏友好月的宣传活动。因为当时中苏友好协会设在文化馆，所以文化馆必须承担这个任务。对于这两大特殊任务的开展和完成，文化馆的四个大忙了个不可开交。

宣传队的组训，因为别的馆员业务不太熟悉，是由孙明亮馆长一人组训的。全队十五个人，在十多天的时间，排练出《翻身就要先翻心》、《二娃与改花》等五、六个小节目。经过短期的学习，组织训练和剧务排练为开展宣传做了充分准备。第二年春天，由孙馆长亲自带领这个宣传队，背着简单的服装、幕布、道具、乐器和行李，步行到村里演出。这一次先后走了十多个村镇，演出了三十多场，每到一地都受到群众欢迎，也得到了区、村领导的极大赞誉。下乡巡回演出后，回旗里作了汇报演出，受到旗党政领导的表扬。这里值得回味的是：一是这些宣传队员不挣工资，四个多月只领了一套棉衣，下乡吃派饭，还得用每月几元钱的津贴费付给饭钱。二是宣传队每到一地，都要和当地业余剧团进行座谈，借此机会除了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提高活动质量外，更重要的是向他们深入宣传贯彻“业余、自愿、小型多样，为生产服务，为政治服务”的群众文化活动方针任务，这对农村业余文化活动，起了推动和一定的示范辅导作用。

开展中苏友好月活动，是在旗委宣传部指导下进行的。活动形式，一是举行大型或小型报告会，请旗委宣传部长旗委书记和上级中苏友协赴苏参团领导，对旗属城厢区各阶层群众及干部进行宣传，二是馆员带上幻灯机、图片深入学校、城厢区及附近农村，配合各单位进行图片展览和幻灯放映。幻灯在当时电影还

未普及的情况下，是一种很好的宣传工具。我们曾把他叫作“土电影”，很吸引人。每到一地放映时，村里的男女老少围一大群来看，为了看的真听的清，有的人就早早到场占好座位，特别是老人孩子多数围在幻灯机旁。看的人虽然很多但秩序很好，谁都不起哄不捣乱，看得十分认真。因此，幻灯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图片也是这样，形简意深，每次展出群众都很喜欢看。我们充分利用这两种当时仅有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了宣传。

为了及时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就自己制作图片、幻灯片。搞不起水彩的就搞黑白的。馆长精于美术，自然是首当其冲，全力以赴，昼夜绘制。其他馆员也乐于打“下手”帮助馆长去做，能裱糊的裱糊，善裁剪的裁剪，需沾贴的沾贴，总之大家都干，各显其能，人手不闲。这既省钱又及时更能结合当地实际。另一个来源是向市文化馆、内蒙中苏友协借用。内蒙中苏友协因土默特旗文化馆虽然人员少，工作搞得还不错，对我们印象很好，虽没有什么奖励，但在工作上给予很大的支持和帮助。记得最后一次综合大型活动，是在舍力图召举行的，活动形式和内容都很丰富，有多套图片展览，文艺、秧歌活动和各召喇嘛用跳曲木舞、吹大号等歌颂中苏友好，世界和平。这次活动，所有旗领导都参加了，书记和旗长还亲自作了报告，尽管这天气候特别寒冷，从领导到群众，各族人民还是在这红旗招展、锣鼓号声的热烈气氛中，活动了整整一个上午。

一九五三年，我们经过工作实践并总结了经验，认为农村是群众文化工作的重要阵地，必须深入农村进行辅导，才能更好地贯彻党的方针任务，较健康地开展群众文化活动，让社会主义文化占领农村阵地，真正地使文艺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于是馆里派出两个馆员，背上幻灯机和图片，由呼和浩特出发，向东经西古楼板申、集贤村，抵达东黄合少村，进行农村文化活动的组织、辅导“试点”工作。

一路上，所到之处，我们两人的工作除了展出图片、放映幻灯以宣传政策、普及科学（当时主要是互助合作和农牧业病虫害防治等）外，还调查了业余剧团的活动情况，进行了方针任务的宣讲。此外，还帮助集贤村剧团整理了他们自己创作的小歌剧《火烧中井儿沟》。

东黄合少村，距呼市八十多里，是有名的吉斯楞互助组所在地，又是前宣传队文艺骨干较多的地方，我们辅导他们，是为了起到示范作用。在那里我们白天和互助组组员一起劳动，了解情况，进行宣传，晚上进行图片展览，幻灯放映和排练文艺节目。所有这些活动，我们都是辅导他们自己干，着重培养他们独立活动的的能力。经过一段辅导帮助，他们的组织活动能力都有了一定的提高。后来他们自己主动在晚间去邻近小村演剧、放幻灯，向群众进行宣传。演出活动前，他们还要给村子里一部份老乡担水扫院，演出完后，背上东西回村，分文不取。他们把这些活动当作光荣的任务，大家虽累而高兴。

在这时期，文化馆还协助旗文教科组建了土默特旗第一个职业剧团（和平剧社）。在组织上由班主制改为团长、委员制，在业务上由大秧歌、二人台混合班改为二人台，并协助老艺人改革剧目。通过改革，取消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健康的台词和动作，移植了《罗汉钱》等新剧目。从政治上、业务上引导剧团走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个剧团当时很“走红”，逐步得到发展，后来成为呼市歌剧二团。

一九五四年，全国第一次普查，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在广大群众拥护下，对清乾隆初年遗留下来的蒙汉分治劣迹，得到合理解决。土默特与归绥县合并，结束了旗县并存的局面。文化馆也随之合并，原土默特旗文化馆从呼市迁并到毕克齐镇原归绥县文化馆。一九五八年，土默特旗又与萨拉齐县合并，文化馆主要以萨拉齐为主统一活动，但仍保留了毕克齐镇借阅图书

的业务活动。

经过两次合并后，文化馆人员多了，设备也较好了，图书储存从第一次合并时六千多册，增至一万两千多册，还添置了一些演出布景、道具、戏剧服装、乐器、娱乐用品等。可谓人多家产多“鸟枪换炮”了。第一次两馆合并后人员有十多人，第二次合并后，人员多至十九人。工作年代较长的有馆长孙明亮、李华，馆员刁力亚、王永常、荣世杰、袁生贵、荣佩文、黄春贵、李萍及后来陆续到文化馆工作的云兴、云瑞祥、邢海滨、王吉厚、李春荣、高原、姚素兰等同志。人员多了，分工也具体了，工作逐步走上轨道。为充分发挥人员、设备的作用，无论阵地活动还是下乡辅导，都按计划进行，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总的是这么几个方面。

一、继续贯彻党对群众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加强农村文化宣传活动

在一九五八年土、萨合并时，光土旗就有业余剧团一百二十多个，这些业余剧团大多数是好的，他们的组织健全，方向正确、活动经常，是一支活跃农村文化的重要力量。但也有少部份业余剧团存在一些问题，根据这一情况，如何全面辅导呢？当时的主要办法是：

(1) 根据上级部署，利用开展春节文艺活动的机会，召开乡文教助理员、业余剧团团长会议。这样的会议主要任务是，一方面继续学习贯彻业余文艺活动的方针任务，一方面批判那些禁演节目，如《三娘教子》、《五雷阵》、《金沙滩》及二人台《吃醋》、《听房》、《扇子计》等节目的封建、迷信、淫秽、妨碍民族团结等的 unhealthy 内容，在表演方法上也要求改变过

去丑化劳动人民和曝头主义，力求“推陈出新”，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在活动方式上，严禁胡乱摊派、演大戏、跑外台赚钱等。记得第一次座谈会时，铁帽剧团介绍了他们自制乐器，借服装、道具，利用碾沿种麻子解决剧团经费等勤俭办文艺的经验。古城村高原同志介绍了贺龙元帅办文艺及军队文艺活动的鼓动作用，都受到全体与会人员的赞扬。

会议结束后，春节一过，文化馆馆员在正月初五前，即背上行囊徒步下乡，对各种文艺活动一面进行辅导，一面和区、乡干部深入检查禁止一些不健康的活动。记得孙明亮馆长还搞了一个《业余剧团组织活动条例》，经过批准，发到各区、乡及业余剧团，对村剧团的健康发展起到一定作用。这样的会议，差不多每年都要举行一次。

(2) 举办文艺会演。这种形式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规模大小不等。有全旗性集中搞的，也有分片、分乡搞的。目的是为了对业余剧团的剧目内容、戏剧形式、表演水平等进行比较和鉴别。奖励好的，抑制坏的，从而推动全旗农村文艺按着党的方针发展。不论哪一类形式，文化馆员必须下乡，协助当地组织安排，进行业务辅导，深入讲解方针任务，鼓励创作，鼓励革新。最后评奖时，也是按照上述的原则办。所有这些会演，都是“以会养会”，不要国家一分钱补贴。记得在北什轴举办的一次会演，围子布都是用的各村剧团的幕布，一张票五分钱，收、售票的是各剧团团长，每天两场，观众不下一千人。红岱剧团的《白兔计》和发源节目《豆腐换妻》，铁帽剧团的《杜十娘》、勾子板剧团的蒙古曲和二人台等剧目及北园子的优秀演员索板板等都受到观众的好评。售票收入除演出开支、发奖外，余款都分给各剧团作为活动经费。

土、蒙合并后的第一次会演，规模和声势很大，地址在萨拉齐镇，有十大几个参加演出的单位，二百多演员的阵容。参加演

出的剧种有歌剧、二人台、晋剧，剧目有自编的，也有传统的，有历史剧目也有现代剧目。可算是“百花齐放”。演员多数是农村业余剧团培养出来的年轻人，但也有艺术上有成就、表演精湛的老艺人。这次大型的会演是在旗委宣传部的领导下，由文化馆具体组织的，时间延续了十多天，从开始到结束都很紧张，但是从上至下也都很重视，大家的热情和积极性都很高，所以这次会演是成功的。通过这次会演是对农村业余剧团的一次全面检阅，同时锻炼了一批文艺活动骨干。所有节目的演出，尽管在表演技术上水平不同，而形式和内容方面基本是健康的，没有出大的政治问题。但是由于审查节目有漏洞，因此，在会演中也演出了个别低级趣味不健康的节目。如大城西剧团由金宝子主演的二人台《水刮西包头》未经认真的修改，就按旧的台词演出，发现后当场制止并批评了有关人员。会演结束后，曾留下桃花社、陶思浩社、大岱社的部分精彩节目，如《送公粮》、《红旗舞》等自编节目及二人台《牧牛》、《打金钱》，晋剧《空城计》等优秀传统节目，在萨拉齐镇公演后赴阿刀亥煤矿慰问演出，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每场演出观众都是满满的，有的工人买票多给钱，说是给演员买糖果吃。有的演员生了病，煤矿的领导还亲自慰问。工农联盟的情谊，永远互相铭记不忘。

(3) 分片包干，加强对农村文化活动的辅导。当时也按毛主席倡导的工作方法，要求“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包片的馆员按“一专多能”的要求，下乡以后，对一片内的宣传、文艺、图书、围片流动及组织创作等都管起来，各方面的情况掌握后，回旗统一研究。

一九五六年，曾经出现了一股歪风，那就是办戏箱，跑台口到处演出赚钱，有的流动艺人为迷信服务，比如，茂林太区的青年艺人郭排仁，被某村请去唱戏祈雨，包片人员闻讯赶到该村，在一个瓜房子里找见郭排仁叫回区里。当叫上郭走时，村里

一些落后群众出面，非但不让叫郭走，还要打这个包片馆员，经过解释党的文化工作方针政策，群众才让开路。郭排仁回区后，经区文卫助理员和包片馆员的说服教育，她再没干这样的事。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配合区、乡干部深入下去做工作，对问题严重的村列为重点加以辅导，阻止一些不良现象。因此，有些人骂我们是“文艺警察”。

二、阵地活动

主要是利用图书、报刊杂志、新闻图片来教育群众、影响群众，辅之以乒乓球、象棋等，供一些老年人、青年人娱乐。在重大节日时，我们在馆内简陋的“大厅”里举办几次舞会。舞会的伴奏乐器只有几把胡琴、一架风琴和几件锣鼓。伴奏人员都是文化馆馆员或“馆员之友”。尽管这样简朴，参加跳舞的青年们却非常踊跃，而且都很文明礼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图书借阅，既不收押金，也不用押品，借阅者只按规定登记一下，即都能按期归还，还回的图书如少有结褶，我们即行修整好继续借阅。馆内有一位带病坚持工作的刘玉珍同志，为了方便读者她积极主动地破例开辟了中午、晚间开馆借阅工作。在多数馆员下乡的时候，她一人坚持开展阵地活动。除了白天进行图书借阅、图片展览外，每天晚间还要组织“小馆员”放幻灯。在最困难的一九六二年，她的工作也始终如初，坚持不懈，令人敬慕。

当时最兴提倡配合中心工作。那个时候运动多，中心工作突出，不但上级文化主管部门要求积极配合，旗、乡（社）的领导也有这样的要求。文化馆配合中心工作的形式一是搞图片展览，二是印发配合中心工作的有关剧本和演唱材料。图片一是没钱买，二是即使买得起，往往是不符合当地实际情况，所以，绝大部分图片是自己绘制，虽然不太精致，但能结合当地的实际，花钱又

少又及时。负责美术工作的同志，夜以继日地把主要精力用在绘制图片上。从画展的主体构思，收集资料到绘制成片一气呵成，及时配合中心工作，开展宣传。记得一九五九年在桃花板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试点时，文化馆派出云兴、柴世杰二人参加工作组，云兴同志根据所了解到的情况，专门绘制了桃花板村史和贫苦群众翻身史等六十余幅图片。就地展出起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有力地配合了中心工作。

一九六三年开展学雷锋活动时，柴佩文同志一人绘制了一百多张图片，在察素齐展出时，每天参观者不下五百人次。展览期间，留言簿上的歌颂雷锋诗就择出三十余首，还出了一个油印小册子。

在印发演唱材料方面，考虑了多数业余剧团的条件和承受能力，始终坚持了剧目短小精悍，内容健康有益，形式多样，做到尽量满足群众的娱乐要求，又体现为政治和生产服务。因此，这些材料主要从刊物、群众作品及自己创作几个方面选择编印或翻印。每次印发的数量都很多，广泛散发，满足群众演唱的需要。那时没有打字机，铅印既不方便又没钱，只好自己用蜡板刻，刻的最多最经常的是刁力亚、柴世杰同志，刻完自己印。就这样一批一批的剧本演唱材料发到下面。为了提高演唱质量，增强宣传效果，对有的剧本演唱材料作重点配曲，并进行排练辅导。这项工作既配合了中心工作宣传，又推动了群众文艺活动的普及，还培养了文艺人才，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三、筹建“俱乐部”

这是一九五六年文化部的决定。其目的是利用群众的积极性，开展农村多样形式的文艺活动，用社会主义文艺占领农村阵地，以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俱乐部”分中心俱乐部和一般俱乐部两种。中心俱乐部建在区所在地或条件和基础好一些的大行政村，其任务和作用除了自身活动外，对周围村的一般俱乐部进行业务辅导。我们按照上级要求进行筹建俱乐部的工作。筹建的办法，首先是办训练班培训骨干和积极分子。当时经费困难不能集中培训，我们就分片深入各区开展训练。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组训、辅导，全旗各区都先后建立了中心俱乐部和少数一般俱乐部。活动较好的是七区的铁帽、红岱两个中心俱乐部。如铁帽俱乐部有宣传组、文艺组、图书室等。宣传组做到黑板报经常换，幻灯隔日放映，图片展览不但在本村展出，还到一般俱乐部巡回展览。为了形成制度有计划地开展展览，由包片干部袁生贵负责建立了定期接送图片巡回展览的具体路线。图书室管理人员、村团支部书记刘体俊同志，不仅用自己家的房办了图书室，还组织团员利用业余时间到渠畔上种了麻子，收入的款全部作为俱乐部活动经费。红岱中心俱乐部主任刘旺旺，虽中年半老残躯，但非常热心群众文化工作，他不但在本村积极开展各种活动，还无偿深入各村进行宣传工作，使图片巡回展览、幻灯放映和文艺活动都能健康发展。他组织老艺人整理的传统秧歌剧《豆腐换妻》演出后，获得广大群众赞赏。他领导下的俱乐部人员，多数是旗文艺宣传队的主要骨干。

四、开办训练班、组织宣传队

这是从土改复查文艺宣传队经验得出的工作措施之一。这种训练班先后办过多期，较大型的有导演、表演训练班，创作训练班和美术训练班。其中有几次是导、表、创综合训练班，故事员训练班等。每次训练班都取得较好效果。创作训练班收获更大，前后几期编创了《柳木车轴》、《钉鞋》等剧本，不仅受到上级奖励，还予以出版。这些剧本主要是歌颂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建设社

会主义的冲天干劲和合作精神。特别是业余创作爱好者，刘家营的李俊英同志，他不但在参加训练班学习期间善于钻研，勇于创作，而且回村后，也积极创作各种文艺作品。三四年时间，大约创作百十个作品，对为生产服务起了很大作用。一九五九年曾被评为“文教英雄”，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英雄模范大会。在他的影响下，全旗业余群众创作有较大的发展。为当时几乎普及的农村文艺宣传活动，提供了一部份演唱材料。

美术训练班，办过两三期，第一次训练班创作举办了全区美术展览，共展出作品几百件。对鼓舞和促进群众美术创作起了积极作用。另两次是为培养提高美术人才而举办的。经过培训，有的学员回村后成为美化环境、美化黑板报、墙报的骨干，有些学的更好的学员曾是文化馆举办展览的得力助手。如一九六〇年美化察素齐镇时，十多幅大型壁画，多数是美术班学员画的。

故事员训练班先后办了两期。两期都是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贯彻了为政治服务和为生产服务的方针以及敢于创新的精神。故事题材，大多数从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故事会》专辑上选择。有的把董存瑞、邱少云、王杰等英雄人物的故事，摘出部分节要演讲。这种形式灵活方便，故事员可以利用开会前的机会演讲，也可以在炕头、地头开展活动，在不少场合以故事代替了不健康的说逗和闲谈瞎扯。一次笔者在刘家营村亲眼见在文艺演出中，穿插了故事员用当地好人好事编讲的故事，深受群众欢迎。又如参加第一期学习的故事员郭柱小，学习后回到村里，不间断地给群众讲故事，既服务于社会又锻炼了自己，后来成为以讲故事起家逐步从事业余文艺创作的业余作者。

文艺（包括创作）训练班共办过三期，有一期是为配合合作化运动而举办的。训练班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一边学理论，一边排节目。排出了小歌剧《锁不住的人》和二人台小戏。并把这些节目作为训练班的成果，组织了巡回演出，在演出

- 2、孛端察儿蒙合黑（蒙兀人奉为始祖者，其母为秃马敦也即土默特人，名曰阿兰豁阿）
- 3、合必赤阿把秃儿（九世祖）
- 4、蔑年土敦（八世祖）
- 5、合赤曲鲁克（此为成吉思汗七世祖）
- 6、海都（此为成吉思汗之六世祖）
- 7、察刺合领忽（其兄伯升豁儿多黑升是成吉思汗的五世祖）
- 8、屯必乃薛禅（此为成吉思汗四世祖）
- 9、合不勒可汗（此为成吉思汗三世祖）
- 10、俺巴孩可汗（此为成吉思汗二世祖）
- 11、忽图刺可汗——把儿坛把可秃儿（此为成吉思汗之祖父）
- 12、也速该把阿秃儿（此为成吉思汗之父）

通过上述这几段历史资料，就可以看出土默特部族与蒙古部成吉思汗家族即孛儿只斤氏（亦叫作博尔济锦氏）有着姻亲的关系。再通俗一点说，土默特部（即秃马敦部）也就是成吉思汗的第十世祖——孛端察儿蒙合黑（也奉为始祖）的外祖母（即姥姥）家了。

第四节 分化为东土默特和西土默特

对分为东路土默特和西路土默特的问题，还应当从达延汗之后说起。因为达延汗死后，他的子孙几乎都分据了蒙古的全境，当时共分了大大小小的四十多个领地，而且绝大多数都成为独立或半独立的局面。对达延汗的其余子先不去谈，就说他的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他又继其长兄乌鲁斯博罗特的职位统帅了右翼，称之为济农。当巴尔斯博罗特死后，其长子衮必里克墨尔根继承了济农的职位，仍以鄂尔多斯为根据点。而他诸子的情况则是：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土默特文史资料第五辑

作者 =

页数 = 2 5 7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